

责任编辑 甄仕优
版式设计 杨 柳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ZIZHOU LISHI
[第一卷]



三秦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三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三秦书院藏书馆



定价：48.00 元

ZHONGGUO GONGCHANDANG ZIZHOU LISHI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

[第一卷]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

ZHONGGUO GONGCHANDANG ZIZHOU LISHI

[第一卷] (1923.6-1949.9)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

【第一卷】

(1923.6 ~ 1949.9)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 第一卷 / 子洲县史志办编著
—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7-5518-1503-1

I. ①中… II. ①子…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子洲县 IV. ①D235.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0804号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一卷）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成品尺寸 140mm×210mm
印 张 8.5
字 数 175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503-1
定 价 48.00元

网 址 <http://www.sqchs.cn>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一卷）

编纂委员会

2012年

主任	雒凤翔	王 华			
副主任	吴浪廷	王明智	王道山	常彦林	
委员	文永先	杜芳印	常庆磊	刘培瑞	王海平
	王建录	加春雄	李俊忠	高 平	尚建洲
	杨锦成	苗志平	石国玉	董万寄	张俊谊

2016年

主任	方虎城	叶庆隆			
副主任	韩金华	雷江声	郭 彬	李万昌	
委员	张小锐	赵亚龙	常庆磊	刘培瑞	姬存波
	姜 伟	蔡 瑞	郑永明	加春雄	白雪峰
	苏仲米	苗志平	石国玉	董万寄	张俊谊

编辑部

主 编	董万寄				
副主编	冯腾飞	梁 瑞			
编 辑	张俊谊				
助理编辑	武 菊	汪彩霞			
资料员	董 惠	李福东	张 忠	钟 桃	贺 博
校 对	张俊谊	董万寄	王锡治	安 琴	栾世宏
摄 影	王生才	冯腾飞	拓 毅	栾世宏	



子洲境内第一个中共支部——苗家坪高小党支部旧址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南丰寨会议旧址



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张家岔会议旧址



西北野战兵团马蹄沟会议旧址

紀念革命元老李登瀛同志

綏西改爲子洲縣



李子洲同志革命事略

李子洲同志，字子通，陝西綏德人。陝甘各處革命聯合會西北革命元老李登瀛同志之次子。早年參加北京大學，曾參加北京大學學生會，並參加北京大學學生會。...

（本報專一）據分區人民紀念西北革命元老李登瀛同志，李登瀛同志字子通，陝西綏德人。早年參加北京大學，曾參加北京大學學生會，並參加北京大學學生會。...

1944年2月7日《解放日報》刊登《綏西改爲子洲縣》



子洲縣第一屆參議會合影



中共中央西北局水浇湾旧址



陕甘宁边区政府马蹄沟旧址



李子洲烈士



子洲境内第一位共产党员
李临铭



子洲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书记
田庆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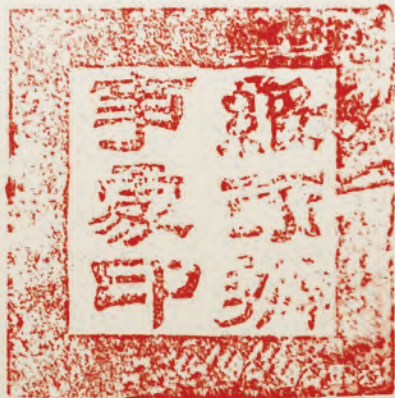
首任中共西川县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 马义（白炳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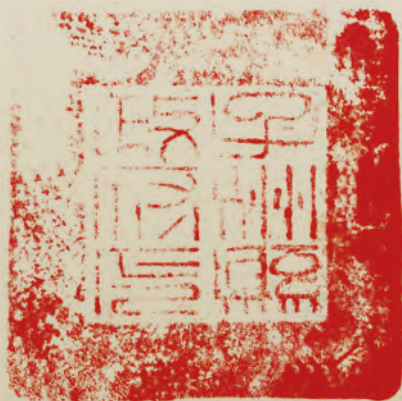
首任中共子洲
县委书记 白清江



首任子洲县县长
谢怀德



绥西办事处印



子洲县政府印



子洲建县分属四县简图



子洲建县时行政区划简图

序

子洲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不少有志青年，在李子洲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事迹感人。1928年4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陕北共产党人在南丰寨召开了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陕北革命活动揭开新的一页。在土地革命的岁月里，子洲的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精神可嘉。1940年3月，绥德、米脂、清涧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1942年9月，西川（绥西）办事处成立，1944年1月，正式成立子洲县。子洲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子洲人民，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主席，前仆后继，无私奉献，青史永垂。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子洲史志办组织人员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一卷），功德无量，可喜可贺！

这是中国共产党子洲县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真实记录，编者用丰富详实的资料，写出了子洲人民跟着共产党的奋斗、奉献历程。她是一本进行延安精神教育的极好教材，也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极好教材。

我是子洲县双湖峪镇人，是饮大理河水长大的。我在长兄安子文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在绥德分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工作；后来到了北京。工作地点多次变动，职务也多次变化，但我始终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不管我走到哪里，干什么工作，我都没有忘记家乡，心中装着家乡的父老乡亲。2001年，我曾回到家乡，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热情接待，也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我为家乡的变化而高兴！

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要赞美子洲人民，也要热爱子洲人民。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回顾历史，可以对子洲的建设有所助益，也可以启迪未来。子洲的历史还要延续下去，子洲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谱写了更加壮丽辉煌的历史。我盼望子洲县史志工作者，再接再厉，写出《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二卷、第三卷。

红色子洲，希望绿洲。英烈无悔，流血牺牲中国梦；后昆有爱，举旗奉献大风歌。我因年龄的原因，不能再回家乡。但我这里遥祝家乡父老乡亲，万事如意，阖家幸福！也盼望子洲追赶超越，日新月异！

是为序。

安志文

2017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大革命时期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西川、南川的影响及早期传播·····	3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西川、南川的社会状况 ·····	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西川、南川的早期传播 ·····	8
第二章 中共在西川、南川的早期组织及活动·····	13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一章 西川、南川初期的土地革命斗争·····	21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西川、南川的政治形势 ·····	21
第二节 南丰寨会议 ·····	23
第三节 张家岔会议 ·····	26
第四节 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 ·····	28
第二章 武装斗争·····	32

第一节	创建红军 开展武装斗争	32
第二节	开辟米西	36
第三节	米西县苏维埃政权	37
第四节	秀延县苏维埃政权	43
第五节	“围剿”和反“围剿”斗争	44

第三编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第一章	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的活动	57
第一节	抗敌后援会	57
第二节	西川、南川的解放	59
第三节	西川、南川解放初的工作	64
第四节	设立子洲县	68
第二章	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	72
第一节	党的建设	72
第二节	政权建设	73
第三章	各项工作	81
第一节	清剿土匪 巩固政权	81
第二节	减租减息	85
第三节	大生产运动	95
第四节	整风运动	115

第五节	文化教育	119
第六节	统一战线	132
第七节	自卫·支前·拥军	133
第八节	司法工作	137
第九节	勤政廉政	139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章	争取和平 防备内战	143
第一节	和平建设	143
第二节	积极备战	150
第二章	土地改革	152
第一节	征购土地	152
第二节	诉苦、清算	154
第三节	土地改革	159
第三章	自卫战争	171
第一节	北线战争	171
第二节	保卫边区	173
第三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在子洲	176
第四节	周恩来副主席途经子洲	178

第五节 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 习仲勋、林伯渠在子洲	182
第六节 支援前线	187
第四章 党的建设和区划变动	190
第一节 党的建设	190
第二节 区划变动	192
第五章 恢复生产 医治战争创伤	194
第一节 生产救灾	194
第二节 恢复生产	195

附 录

中共子洲历史大事记	205
子洲县早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录	232
图表	254
主要参考资料	260
编后记	263

第一编 大革命时期

(1923.6 ~ 1927.7)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 在西川、南川的影响及早期传播

子洲县是以革命先烈李子洲的名字命名的。县域在陕西省北部,榆林市南缘,地处北纬 $37^{\circ} 15' 21'' \sim 37^{\circ} 48' 10''$,东经 $109^{\circ} 29' \sim 110^{\circ} 07' 21''$ 。北接米脂,东连绥德,南同清涧、子长接壤,西与横山毗邻。总面积2042平方千米。东西长度56.3千米,南北长度60.7千米,平均海拔1095米。县城双湖峪镇。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西川、南川的社会状况

子洲县成立前,原属绥德、米脂、清涧、横山四县管辖。境内有大理河川和淮宁河川,大理河川在绥德的西部,故称之为西川,“西川者,米脂、绥德、宁夏犬牙之地,产盐……”(清·费密《荒书》)西川即大理河川。大理河是无定河的一条支流,从靖边老虎脑山发源,流经靖边青阳岔,横山石湾、魏家楼,子洲马家沟岔、周家崓、三眼泉、马蹄沟、双湖峪、苗家坪,绥德石家湾、张家砭等地,到绥德城入无定河,全长170千米。大理河川之地明时大部分归米脂、绥德管辖,而大理河川位于绥德之西,米脂之西南。绥德、米脂的人习惯上把大理河川呼之曰西川。这种说法,在《米脂县志》《绥德直隶州志》上均有

记载。大理河川从明朝开始，或属米脂，或属绥德，犬牙交错，管理不便，直到民国年间仍是如此。南川，即淮宁河川，因位于绥德之南，故称之。子洲18个乡镇（办事处），归属西川的有14个乡镇（办事处），面积1466平方千米。西川，原属绥德、米脂、横山。而归属南川的乡镇有4个，面积576平方千米。南川，原属清涧。西川、南川位于陕北高原之腹地。民国初，西川、南川人口大约8万。

西川、南川皆是同治年间回民军驻扎和争战之地，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不少村庄十室九空，再加上光绪三年（1877）的旱灾，经济凋敝，人口减少，直到民国初年仍未恢复元气。

民国初年，西川和南川有如下几个特点：

西川、南川土地较肥沃，主要种植谷子、糜子、高粱、黑豆、玉米、麦子等作物，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米境东乡及大理河一带土壤较腴，农耕适宜，租佃各户，无田可耕者，类仰给于县内各富户。如杨家沟马氏、高庙山常英与三川口霍姓等，均各拥有广大的土田，岁租各收一两千石以上，俨然成为陕北的大地主”。（曹颖僧《延绥揽胜》）

土地有川地、山地之分。山地又有塌地、湾地、沟条地之分，川地有旱地、水地之分。南川、西川有少量水地，大部分是旱地。广种薄收，跟垧打石（亩产100多斤），即是好收成。贫苦农民没有土地种，靠租地、伙种、按庄稼或打短工、当长工等谋生，或外流，最多的是走南路——即到延安一带谋生，或去东路——到山西谋生。人口较陕北其他处稠密。“一切可耕地都被利用……全境几无荒地可言。”（柴树藩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饲养的牛少，畜力主要是毛驴。“耕地少，粮缺；牧地少，猪少，羊少，牛

也不多；一切全用人力。能养起毛驴，毛驴耕地，即是中农以上了。穷人两三家养不到一头毛驴。”（赵通儒：《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

精耕细作。和三边、神府比较起来，这里土地相对要少，而耕作精细。尤其是地锄三遍。

人均口粮不足三百斤，有“糠菜半年粮”的说法。山村人多住土窑，穿的更缺，十多岁的女孩子尚无裤子穿。

生活俭朴。即使地主富农也不奢华。赵通儒回忆：绥德，中农、富农、地主，不论动产或不动产，都比陕北各县富足得多，但都有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作风和传统。

西川较南川富裕。西川川道比南川宽，相对来说土地也较肥沃，兼有盐和炭两大矿产。

西川地处陕北腹地，产盐，此盐全靠井中汲水而晒制，历史悠久，至少金代就有生产。盐工大都贫无立锥之地，从四面八方而来，替盐主井中汲水而晒盐，头顶烈日，汗流浹背，劳动强度极大，生活极为艰辛，受剥削压迫极深，因之斗争性极强。

西川也产炭。三川口、马蹄沟、槐树岔等地均有煤矿，出产的煤炭可供周边县的群众生活使用。

西川是由太原到绥德州再到宁夏必经之大道。除大理河两岸窄窄的不过数百米宽之川道地区外，皆为山区，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十年九旱，平时亩产不过几十斤，歉年常常颗粒无收，因之群众生活极贫。此地之居民或是屯垦戍边之武卒后裔，或是山西等地迁来不久之移民，土著居民不多。此地“民勤稼穡，俗尚鬼神”（《方輿胜览》），地薄土瘠，生计艰难。寺庙不少，民间信仰多神，道教占很大的优势。

西川群众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皆起义于西川。崇祯三年（1630）夏，李自成不堪米脂艾同知侮辱，投米脂西川义军。是年，张献忠、罗汝才据吴家山、党家坪、薛家崖等一十八寨一千九百余饥民起义，张献忠自立一军，号西营八大王。是年秋，不沾泥张存孟出延南，发动米脂、绥德、清涧三地饥民继续起义。是时，西川“窑寨绝险，六十有四”都是义军占据之地，延绥义军，“则西川为最”。一人起义，全家相从；一村起义，“各村附和”。几乎无民，尽是义军。

清初有著名的周四（即周世民）在周家砦起事。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周四组织西川农民于周家砦起事，攻克郭家寨，与清定边副将朱龙会合，攻绥德，下安定，上米脂，围榆林，克神木，渡黄河，占据山西保德州，陕晋震动。第二年遭清将毕力克图镇压而失败。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初五（11.28），境内驼耳巷沟、砖庙沟、大小堡沟等地农民二三百人，到米脂城抗“烟卤捐”。因米脂知县潘松巧立名目，征收“烟卤捐”，每个烟卤年收制钱360文，时小米每斗值钱100多文，增此重负，家家叫苦连天，所以起而抗争。潘松诱捕景堂奎、高鹏飞、马夏官、苗庆元四人。十二月初五（12.27），西川农民公推李生荣、景兆桂、马国风等为首领，每家出一人，带上铺盖、口粮、棍棒，闯进米脂城，直冲县监狱，救出景堂奎、高鹏飞、马夏官，苗庆元因伤重未救出。宣统元年（1909）春，绥德知州张铭坤用欺骗手段逮捕李生荣、景堂奎、马良胜、陈兆铭四人。春夏之交，景兆桂又组织西川千数农民，到绥德州监狱，救出李生荣等四人。同时，又组织人到米脂城救出苗

庆元。是年，陕西巡抚恩寿派新上任的榆林知府贾振镛查明抗“烟囪捐”的实情，潘松被革职，张铭坤被降职，抗“烟囪捐”取得成功。

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哥老会会众、十里盐湾盐工、周家崓镇街民共400余人，在三皇崩月台寺聚齐，由钟毓秀、栾茂升带领，身穿白衣，手执大刀，到绥德南关。2日，知州谢世瑄表面答应交出大印，但暗地调动兵力乘机反扑，钟毓秀被害，栾茂升从城中水洞爬出，逃回。

匪患严重。

西川、南川距离县城较远，疏于管理，加之民国初年，地方不安宁，土匪为非作恶，人民不能安居。这些匪有惯匪，也有从军队中哗变而来的。1916年，三月六日（4.8）陕西陆建章部陈树藩、旅七营警备军统领郭坚率“护国讨袁（世凯）逐陆（建章）”部队300余人，由绥德沿大理川而上，抵经境内。七日（4.9）郭坚军队攻克冯家渠墩儿山寨子。张精一有诗咏之：“三月七日郭坚来，墩儿山下炮声开，郭坚来了及时去，本土多人去掳财，或拿衣物或拿布，更比郭坚十分灾。”郭坚部队沿大理河川向靖边、定边走去。民国《米脂县志辑余》载，郭坚“闻陆在三边购存烟土数十万，欲得之”。故直奔安边堡。郭坚的部队几乎是土匪。1922年七月十六日（9.7）芹园李占魁率散兵、土匪200多人，围攻马家沟岔南寨子，四十余人遭残杀。

当时，各县政府均在地方设立民团、招募团丁、购置枪支，在地方催要捐税、横行霸道，因此有民歌：“团丁来到谁家里，婆姨女子怕成鬼。擀杂面来又杀鸡，大盒子洋烟圪堆起。

鞋脚钱，早准备，害祸离门免是非。”

因为地方土匪出没，乡间豪绅多组织民团修筑寨堡，使贫苦农民频添负担。吴家山“长胜寨”即是民国五年（1916）修建的一著名山寨。

清末民初，西川、南川的商业有了较大发展。双湖峪、周家崓、三皇崩、老君殿、苗家坪都为著名集市。民国初年，周家崓有字号 40 余家。其中有巨元成、复泰昌、复兴泰、五合源、源盛永等。其他集镇的商业贸易也较活跃。

富裕家庭渴望子弟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兴办了不少学校。其中周家崓、马家沟岔、冯家渠、双湖峪、苗家坪、驼耳巷、裴家湾、怀宁湾、老君殿都办起学校。民国七年（1918）前后，米脂县知事华钟毓来西川禁烟，用禁烟款兴办不少学校。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西川、南川的早期传播

西川、南川的马克思主义，是李子洲传播的。李子洲，名登瀛，是绥德城内人，出身于一个银匠家庭，幼年家贫，靠借贷求学，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李子洲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也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火烧赵家楼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6月下旬，他带领北大学生参加了包围新华门总统府向徐世昌请愿的斗争。1920年，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秦钟》月刊，李子洲负责发行工作。1921年，北京大学陕西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联合在京的陕西学生，把停办的《秦钟》更名为《共进》，改出半月刊，李子洲仍

搞发行工作。12月，李子洲加入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是较早加入的会员，并且是一位活跃分子。1923年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李子洲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子洲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多次回家乡宣传五四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使科学、民主的思潮传到西川和南川。

1924年春，李子洲应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学执教，并担任训育主任，使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有利的传播机会。同时应聘的还有进步知识分子呼延震东、王森然。春夏，王森然提议创办了榆林平民学校，为普及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好的作用。周家峕镇董家圪塆村铁佛寺的刘景向就担任过平民学校的负责人。夏天，李子洲被任命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绥德师范）的校长，他大胆改革，聘用进步教师，用民主、科学思想教育学生，也宣传马克思主义，向学生讲授《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主义浅说》，推荐《向导》《新青年》《政治生活》《共进》等进步刊物，组织进步团体，出版《陕北青年》。他建立了共进社绥德分社，先后吸收本境的栾本朴、冯文江等学生加入共进社。

西川、南川的不少青年在榆林中学和省立第四师范求学，这些学生大都积极上进，受到李子洲的熏陶和教育，接受民主、科学进步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机会，也利用和亲戚朋友的书信往来，宣传进步思想，使西川、南川有了新鲜空气，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广为传播。这些学生的家庭大部分是西川、南川的富裕家庭，或为地主，或为商人，多为头面人物，因此受到影响，积极兴办学校、

热心公益事业，风气为之一新。

境内第一个共产党员是李临铭。李临铭，1903年生于双湖峪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民国十年（1921），他就到山西汾阳铭义中学上学。这个学校是教会学校，共产党有活动。1924年春，他由一个姓刘的教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说自己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转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

1924年12月上旬，在李子洲的指示下，共产党员王懋廷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发展了一批团员。其中，有大理河川四旗里的徐步墀等。

冬天，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绥德小组在四师秘密成立。成员有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田伯英任党小组长。第二年，发展为党支部，李子洲为书记。

1924年12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在李子洲领导下，12月12日，绥德成立了陕北国民会议促进会，四师党小组派学生分赴各地发表政治演说，扩大影响，本境周家崮也有学生宣传，并成立分会。

同时，榆林中学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本境在榆林上学的青年学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研究会。

1925年，绥德师范成立了陕北学生联合会，又在各学校成立“青年社”，出版杂志《塞声》，宣传马列主义，抨击时弊，给有志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活动平台。

1925年6月，中共绥德特支通过四师学生会、青年社领导脚户和农民，在绥德平民学校成立脚户自保大会，到会的脚户有30多人，农民群众和四师学生500多人，成立了脚户自保会（后改为脚夫工会），会长马瑞昌，副会长杜嗣尧，

委员石泰清、罗百福、李明轩、张礼庭、赵通儒、姬世道、刘斌章、邓重庆、刘三、郝林瑞、严念祖等，姬世道即是西川周家崓镇车家沟村人。

西川、南川的青年学生或在绥德师范，或在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参加革命。这些学生有：周发源、冯文江、景仰山、栾本植、张逊谦、周梦熊、苗仰实、田庆丰、贺维新、拓克宽、艾捷三、曹秀清（女）、徐步墀、李棠安、李秉乾、高炎、姬世道、王祖模、师俊伟、刘景向、安子文、王俊让、李策铭、刘正平、马逢瑞、冯启明等数十人。在这些学生中，张逊谦和冯文江被党组织派遣上了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有的上了北京等地的大学深造。

参加了党团组织后，这些学生更加朝气蓬勃，经常参加各项活动，并且是骨干分子。比如，榆林中学党支部书记就是周梦熊，周发源任宣传委员。后来，刘景向也任过榆林中学的支部书记。他们也利用机会到西川、南川进行革命宣传。

1925年6月，为声援“五卅运动”，绥德各界人士联合救国办事处委派本境学生姬世道、高炎、李秉乾、栾本纯等8人，来西川筹划救国事宜。他们发动周家崓、双庙湾、楼砭、水地湾、车家沟的学校学生和周家崓群众集会，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援“五卅运动”，间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绥德又委派李棠安、王国治、叶玉荣、赵仰普、刘澜涛、贾拓夫等青年学生到西川宣传马克思主义。苗家坪高小的学生下乡宣传成立农民协会。

受当时形势的影响，槐树岔十垧坪的杜聿昌和冯家渠的冯鼎臣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1924年，春夏之交，粮价飞涨，盐价大跌。而盐局的

盐税有增无减，盐工和盐局的矛盾日益尖锐。一天，从东路来了个驮盐老乡，来时带点红枣，因未施贿赂于盐局，被盐局抓住，吊起毒打，并架枪威吓围观群众，激起盐工强烈愤慨。三皇峁盐工杜四、杜五组织盐工起来反抗，相约以姜家崖月台寺老钟为号。起事这天，钟声一响，马蹄沟、三皇峁十里盐湾的盐工数百人，手持火枪、铁锨等工具，冲到三皇峁盐局，要求减轻税收，盐局的官员见其来势凶猛，只好夺路逃跑。盐工紧追不舍，盐吏将银圆撒在路上，趁盐工捡拾之机逃脱。事后，盐局官吏去榆林向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报告说，绥德西川三皇峁杜、柴两姓造反，砸了盐局。井岳秀想派兵镇压，后来经杜斌丞周旋，井岳秀才决定责成绥德县长刘树荣查办。杜斌丞又反复劝说刘县长，结果以先发布告后捉人的形式达成协议，杜四、杜五闻讯后外出避难，此事也不了了之。

1925年，在榆林中学党支部的领导下，老君殿群众捣毁了天主教堂。1926年冬天，共产党员周梦熊在周家崓高小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反对基督教”“抵制英日货”等口号。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西川、南川的传播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境内绥师、榆中进步学生利用假期回乡宣传，点燃了革命的点点星火；二是西川、南川在距离上与陕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绥德四师较近，老百姓往来频繁，进步思想有条件被广泛认知、认可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西川、南川的传播，唤醒了境内人民的思想，也激发了更多有识之士踏上革命的道路，对境内早期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西川、南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中共在西川、南川的早期组织及活动

1926年6月，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归北方局领导，他们派遣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的学生到各地积极开展活动，筹划建立党的组织。

1926年7月，家居苗家坪镇的绥德四师学生党员苗仰实，回到苗家坪高级小学任教。他领导学生宣传新文化，抵制旧风俗，宣传进步思想，同时，在进步学生中传阅《马克思主义浅说》《中国社会进化史》《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等进步书刊，还秘密地创建了“青年社”，为建立党团组织打下了基础。不久，绥德四师的学生党员田庆丰、贺维新回到西川苗家坪高级小学任教，与苗仰实一起，经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本境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书记田庆丰，组织委员苗仰实，宣传委员贺维新。苗家坪高小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在本校和周围发展党团员，扩大组织，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苗家坪高小党支部属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李子洲曾经到该校视察指导工作。

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进步学生加入组织，先后接收郭步荣（后名郭子清）、景兴治、苗兴昌、田庆昌、郭步岳、王秉文、郭步斗、薛泽武、薛继福、贺鸿儒等进步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并于1927年3月组建了共青团

苗家坪高小支部，书记田庆昌，组织委员郭步岳，宣传委员景步哲。党团支部在苗家坪高小后山的土窑洞里秘密地举办了党团员训练班，让党团员学习进步书刊，了解革命形势，提高思想觉悟，掌握斗争方法，并培训出一批骨干鼓动员（宣传员），组织了几个宣传队，分别到南丰寨、钟家崮、景家沟等村庄进行宣讲。鼓动和帮助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他们有声有色地宣传道：“老乡们，这年头愁死人。我们受苦人一年起得早，睡得晚，吃不饱，穿不暖，饿起肚子没人管。说起来我农人为什么受此涂炭？莫不是我农民没有团结？今后要不受这罪，快快参加农民协会。”

学生在宣传和组织农会的过程中，受到当地基督教徒的干扰，他们设法破坏学生的宣传活动。学生宣传破除迷信，反对地主豪绅剥削迫害人民，他们反宣传说，人是靠上帝保佑，造反会送命，干不得，要农民安分守己。一次，学生贴出的标语被基督教徒撕掉，激怒了年轻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基督教！”“反对外国文化的侵略！”等口号，迫使基督教神甫王杰厚在苗家坪高小全校师生大会上认错、道歉。这样，学生的革命宣传更加深入人心，南丰寨、钟家崮、景家沟等十几个村子的农民协会很快就成立了，党组织也在不断壮大。

周家崮的党的活动也非常活跃。学校的教师韩士杰、马象英、刘景向都是共产党员。1926年10月，共产党员师俊伟介绍年仅14岁的马文瑞参加了共青团，马文瑞入团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发展团员，筹建团组织。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他介绍刘精一、赵拱璧、高学孔、马文德、徐登奎等进步青

年入团，建立了周家崓学校团支部，他担任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他还在校登台演说，开展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活动，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还担任学生演讲会主席，成了学校颇有号召力的学生。

南川老君殿清涧第四高小（在老君殿黑泉沟），也在共产党员李宗白（教师）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清涧第四高小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封营书、封营荣（封克涵）、李丕成等共产党员，他们在三官庙开会，参加者有张宏忠、战红、封营书、封营秀、李丕成等人，布置如何向群众宣传，壮大党团组织等革命工作。

1927年2月8日，绥德县总农民协会在县城九贞观成立，接着委派四师学生团员王学善到西川帮助组织农民协会。马文瑞和团支部其他团员积极宣传，动员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马文瑞利用周家崓集日演讲：“农民弟兄们，你们想过吗？为什么我们种地的、揽工的一年受死受活干到头，打下的粮食多半进了地主老财的仓窖？为什么我们种一亩大烟，要交十亩甚至几十亩的烟款？为什么地主老财不劳动倒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而我们自己连糠菜糊糊也喝不饱？都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作怪。”接着，他和农民一起呼口号：“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冯家渠、周家崓周围村庄成立了农民协会。他们对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西川、南川偏远落后的农村生根发芽，为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马文瑞还领导冯家渠农会向西区区长斗争，要求清算账目。

1927年农历四月初八，殿寺利用庙会成立了农民协会。周围的村庄皆有农民协会，活动也十分活跃。

1927年5月底，绥德成立区农民协会7个，村农民协会151个，会员3409人，其中西川占了很大的比例。

1927年春，共产党员李明轩（绥德教育视察员）、马瑞昌（绥德教育局局长）借检查学校之机宣传革命，他们到过西川的苗家坪、双湖峪、马蹄沟、周家砦等学校。7月初，在绥德县文庙院子召开了小学教师讲习会，培训教师骨干。讲习会有110余名教师参加，聘请共产党员蔡楠轩、常汉三、马利川等为教员，教学课程有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政治生活、资本论、十月革命以及党团员守则。县教育局长马瑞昌讲话，他说，小学教师是学生的榜样，要言行谨慎，既要革命，也要遵守纪律；小学教师是农村的基层骨干，要了解农民的疾苦，负起领导农民的责任，处处为农民的利益着想，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就是小学教师出身，要以其为榜样，干一番事业；小学教师不是只教书，还要深入农村，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小学教师要宣传主义，要做组织工作，领导农民做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教师中有不少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其中有西川周家砦小学教师马维卿、三皇峁小学教师刘子兴、双湖峪小学教师马明甫。

西川、南川的学生党员，还受组织派遣到陕北和宁夏宣传革命思想，建立党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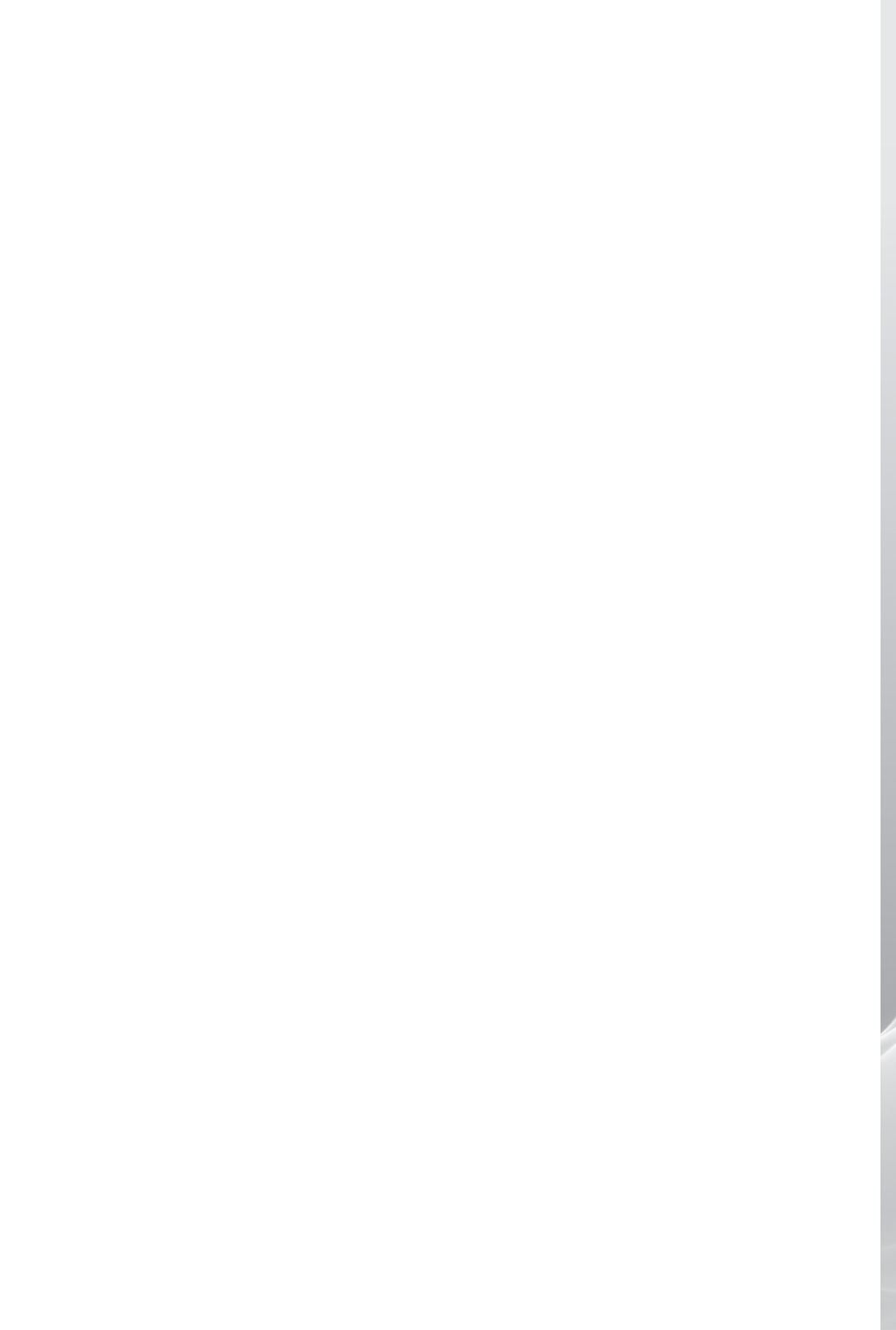
1926年2月，在榆林中学闹学潮被开除的周家砦镇的学生党员周梦熊、周发源到定边高小任教，按照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组建了定边县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定边支部，周梦熊任书记，汤中甫、周发源任干事。6月，定边支部改为定边特别支部，周发源任书记。

4月，清涧第二高级小学特别支部成立，苗家坪镇的景

仰山为负责人之一。

1926年，共产党员李策铭、周梦熊、冯启明等人，到横山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宣传马列主义。

1926年秋，冯玉祥在兰州创办国民军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北方区委委派钱清泉去开展工作，途径绥德时，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选派了李临铭等30多名青年以读书的名义去兰州。途经银川，党组织决定将共产党员李临铭、贺维新、陶振亚、王兆卿等6人留在银川开展工作。9月，他们在银川市鼓楼建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特支书记。同时协助建立宁夏国民党党部，李临铭任常务主任。



第二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 ~ 1937.7)

第一章 西川、南川初期的 土地革命斗争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西川、南川的政治形势

在大革命时期，井岳秀追随冯玉祥倾向广州革命政权，支持北伐，所以，榆林、绥德、清涧、米脂等地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西川、南川的苗家坪、周家崓、双湖峪、老君殿等地的革命活动十分活跃。1927年6月，冯玉祥致电于右任、邓宝珊在陕西实行“清党”，并颁布三条反共办法：一、不准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二、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加以严密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8月，井岳秀开始在陕北“清党”反共，白色恐怖甚嚣尘上，陕北各地党团组织随即转入地下，西川、南川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斗争时期。

1927年8月4日，井岳秀派其部旅长刘润民，武装查封绥德第四师范。他们把教师、学生集中起来，逐个搜查，押送出校，迫使马文瑞等西川、南川的进步学生离开绥德四师。

这时，绥德县的党团组织瘫痪了，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也被迫解散，西川、南川的革命活动由公开转入地

下。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为减少与下级组织的接触，省委分派六路特派员赴各地指导工作。1927年8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魏野畴持李子洲介绍信到达绥德，在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找到地下共产党员冯文江，经过秘密筹备，恢复了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组织委员李明轩，宣传委员柳长青，农运委员李波涛，妇女委员李波涛（兼）。魏野畴在会上讲了四点：一要意志坚定，不能叛党；二要继续革命，永不退却；三是能打入国民党内的尽量打入国民党内；四是被破坏的组织要重新登记党员，进行整顿恢复。

绥德县委恢复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印发了一批文件，派人分别向各地传达，并着手恢复各地党团组织。书记冯文江到西川和米脂巡视，恢复组织。12月，中共米脂县委成立了，清涧县的共产党活动也得以开展，而苗家坪的党组织不但未遭到破坏，而且有所发展壮大。1927年8月，经中共绥德县委批准，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和共青团苗家坪高小支部，分别扩建为中共苗家坪区委和共青团苗家坪区委。中共苗家坪区委主要活动在西川一带，其中心任务是联络各地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发展壮大党团组织。1927年秋，中共周家崓高小支部和共青团周家崓支部成立，分别归中共苗家坪区委和共青团苗家坪区委领导。

1928年1月，中共绥德县委调高光祖到苗家坪高小任教，他在西川双湖峪、三皇峁、周家崓一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在他们的活动下，西川双湖峪、三皇峁、姜家崖、双庙湾、师家坪、冯家渠等大一点村庄都秘密建立起党团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在白色恐怖下，西川、南川的共产党革命

活动没有停止。驼耳巷沟的裴仰山、裴仰斗就是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将驼耳巷沟的革命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群众中流传这么一句话：“穷苦人，要出头，投奔仰山和仰斗。”

第二节 南丰寨会议

1927年11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联合发出《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其中计划在陕南、陕北两地设立党团特委。28日，共青团陕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共青团陕北特别区委，任命焦维炽为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1928年1月4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陕北特委，并派杜衡到陕北筹建特委。会后，杜衡先到绥德与冯文江、赵通儒联系，布置了工作任务后，到米脂、榆林、神木、清涧等地巡视、检查工作，帮助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并决定在西川南丰寨古庙里召开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选择在西川南丰寨召开，有其历史的偶然，但偶然的的历史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

其一，苗家坪地处绥（德）、米（脂）、清（涧）三县交界之处，是三不管地域，国民党的统治相对薄弱，不易暴露；其二，南丰寨是明代就有的古庙，地势险要，且处于三条河流之间，容易隐蔽，遇到紧急情况，也容易疏散；其三，大理河川革命斗争活跃，群众基础较好，苗家坪区委是大革命时期就建立的支部，坚强可靠，苗仰实、田庆丰、贺维新等都是入党较早、思想觉悟高、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又熟

悉当地情况，便于保密，也便于食宿安排及后勤保障；其四，绥德县委书记冯文江是西川人，直接领导苗家坪区委，便于会议的组织领导，易于开展工作。

4月，各地代表秘密化装来到苗家坪，然后集中到南丰寨古庙会窑开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榆林代表李文芳，神木代表张蜀卿，府谷代表柴培桂，绥德代表赵通儒，清涧代表师应三，米脂代表景仰山，苗家坪区委书记苗仰实等十多人。延长、延安代表因路远未到。特邀代表白明善、马瑞生、张鸿锡也因故未到。（据赵通儒回忆，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幼康、窦增荣、李蓉鉴、王兆卿、蒋尚英、李登霄、苏维祥、崔怀珠、周发源等）会议首先召开了预备会，然后召开正式会议。与会者十多人盘坐在土炕上，开了三天三夜。会议由杜衡主持，大会首先由杜衡作政治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和陕北政治、军事形势，指出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有其薄弱环节，只要通过发动群众，革命胜利一定会实现，并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焦维炽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与会成员又讨论陕北政治、军事形势，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任务，通过了组织、宣传、军事和农、青、妇运等工作的原则决议。会议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三次会议决定和共青团陕西省委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陕北党、团特委。选举产生中共陕北特委和共青团陕北特委的组成人员，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杜衡，组织兼农运委员冯文江，军事委员杨国栋，宣传委员马瑞生（未到职），青年委员兼团特委书记焦维炽，候补委员白明善和赵通儒。中共陕北特委领导榆

林、神木、府谷、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延长 8 个县委，安定、保安、镇川 3 个直属区委，1 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团员 800 余人。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油画） 刘丰

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陕北党组织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共陕北特委的建立，统一了陕北党、团组织的领导，加快了陕北党、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使陕北的革命力量从敌人严重破坏下迅速发展起来，有力地推进了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为后来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参加南丰寨会议的西川共产党员就有三四名，占到四分之一。而中共苗家坪区委进行后勤保障和保卫、保密工作，

安排周到、细心，使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1928年10月，白明善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组织委员周发源，宣传委员赵通儒。马文瑞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组织委员周自岐，宣传委员马文德。这六名负责人，有四名是西川人，周自岐是周发源之侄。

第三节 张家岔会议

南丰寨会议后，在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绥德县委的领导下，西川、南川的革命活动蓬勃发展。1928年4月，中共封家坪支部成立，王希勃、封营书先后任书记；夏，中共双庙湾支部成立，刘长华任书记；7月，中共园子坪支部成立，马兴图任书记。1928年9月28日，适逢中秋节，中共陕北特委准备在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特委负责人缺乏警惕、麻痹大意，被敌人察觉，特委负责人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遭逮捕，会议未能举行。10月初，特委委员杨国栋、冯文江、赵通儒等在西川苗家坪小学（中共苗家坪区委驻地）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共商善后事宜。会议决定杨国栋代理陕北特委书记，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工作。还决定将苗家坪区委改称为中共绥德西区委，下辖10个党支部。会后，特委机关迁到清涧县折家坪。不久，由于折家坪村子小，人员不易隐蔽，机关又搬迁到南川老君殿。10月，白明善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组织委员周发源，宣传委员赵通儒。绥德县委也搬迁到西川一带活动。这样，南川和西川都成为陕北特委工作的重点区域。

10月初，中共绥德县委负责人白明善、呼永华、马文瑞

寄居李银家沟（周发源、呼永华的家乡），并创办平民学校，借教书之名，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平民学校设在呼永华家的一孔窑洞内，窑内有一暗窑，口子上挂一块黑板，若外面有情况，教员与学生就藏进暗窑。白明善是平民学校的主要教员，他白天给学生上课，宣传革命道理。晚上常常伏案疾书，直到深夜才休息。他还编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其中有：一年做到头，一天做到晚，汗珠满身流，实在太可怜；饿了没饭吃，冷了没衣穿；粮草天天要，差事日不断，又要苛捐税，又要白地款；兵役拿鞭打，衙役拿绳拴……，你有什么法，能避这灾难？

白明善还以陕北民歌的形式宣传革命，其中有：

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穷人能沾光，她才是真革命党，她才是真革命党。

只有我们工农兵，才是世界的主人翁，从今之后才能强盛，从今之后才能强盛。

他还用春联隐喻革命：春风吹散三冬白，曙光普照四野红。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西川张家岔柳迎培的柳家小店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出席大会的有：杜衡、杨国栋、冯文江、刘澜涛、贾拓夫、赵通儒、白明善、常立德、谢子长、窦增荣（米脂代表）、周发源（绥德代表）、杜守智（延安代表）、孙兰馥（安定代表）等20多人，马文瑞、周自岐列席会议。杜衡由西安返回陕北传达了中共六大和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大会遵循中共六大决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形势暂时还处于低潮，陕北还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

党的目前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好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批评了杨国栋独断专行的错误，并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决定他仍担任特委书记。谢子长在大会上检讨了清涧、渭华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根据近年来搞武装斗争的经验，谢子长总结了三条：一、一定要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的武装力量；二、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力量才能存在和发展；三、一定要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革命根据地，走井冈山的道路。会议确定了“深入群众，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的工作方针。随后，大会增选白明善、霍世杰为特委正式委员、常委，选举谢子长为特委军事委员。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陕北特委张家岔会议后，特委决定改组中共绥德县委。原县委书记白明善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周发源担任书记，冯启明、胡永华等为常委，马文瑞为常委兼团县委书记。这四个人都是西川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也在西川。

1929年春，中共景家沟支部成立，书记郭步荣。

第四节 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

民国十七年（1928），陕西亢旱，绥德、清涧、米脂、横山一带，旱灾尤为严重。1929年，旱象持续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本境群众饿毙于道，惨不忍睹，不少贫苦农民卖儿鬻女，逃荒山西。据记载，仅米脂西北即死

亡五百人以上。绥德、米脂皆组织“饥民自救团”，西川、南川的贫苦农民也到处“吃大户”。

绥德党团组织根据旱情严重、饥民嗷嗷待哺的现状，组织“饥民自救团”，开展“吃大户”等群众运动，迫使当局赈济灾民。

一、打蛋厂

一位回民资本家在绥德开办鸡蛋厂，廉价收购鲜蛋，焙制蛋粉，运往京、津等地倒卖，牟取暴利。因下雨影响蛋粉生产，蛋厂老板经常烧香叩头，祈祷上苍不要下雨。这就引起渴望下雨的广大农民的强烈义愤，“天不下雨，系蛋厂所致”的传说越来越盛。于是，中共绥德县委因势利导，组织全县农民发动了一场打蛋厂斗争，具体分工是：由马文瑞（当时任团县委书记）、胡永华（系县委常委）负责写传单，以鸡毛信的方式，逐家传送，动员四乡农民进城；在组织部署方面，由马文瑞负责城内指挥，马明方、崔田夫分别负责北区与南区的领导工作。1929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绥德城逢大集，经过充分动员的数千名农民，从四面八方拥向县城。县长宋祖铎闻讯，急令当地驻军紧关四面城门，严加防守，不准农民进城，并鸣枪恫吓。濒临绝境的广大灾民，早将生命置之度外，汇成不可阻挡的群众洪流，冲破层层警戒线，强行进城。在蛋厂门口，杨向枝营长亲自出马阻挡群众，被群众就势扯倒，狠狠地打了一顿。接着，群众大军冲进蛋厂，砸蛋具、撒蛋粉，瞬时将蛋厂摧毁殆尽。

为了将这次斗争引向深入，中共绥德县委及时在城南二郎山召集部分农民代表开会，决定趁热打铁，要求县政府赈

济灾民。于是，农民大军随即又向县衙门涌去。县长宋祖铎闻风逃匿，不敢露面。杨向枝营长与众绅士商议，决定开仓救饥，给每个农民发了一块银洋，给小孩发了零碎钱，这次群众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的直接领导者马文瑞、呼永华，皆是西川人，西川群众也有参与者。

二、三皇峁盐工打盐局斗争

民国十八年(1929)夏天，三皇峁十里盐湾有盐工近千人，均靠生产小盐为生。国民党绥德县政府在此设立盐局，收取盐税。盐工既受盐主的剥削，又受盐局两道税的盘剥。旱灾造成饥民四出，盐价暴跌，但盐税不减，盐工家无升合之粮，生活痛苦不堪，难以维持。盐工恳求盐局改征一道税，盐局局长不但不答应，还不准盐工呈状上告。中共地下党组织抓住时机，组织忍无可忍的盐工，进行了打盐局的斗争。

在共产党员李景林等人的领导下，盐工张建才、张宗贤带头，率领数百名盐工，手持铁锹、火枪，鸣锣击鼓冲进三皇峁盐局。盐局官兵闭门不出。盐工中有人抱来干柴，准备放火烧盐局门窗，其他盐工把盐局包围得水泄不通，大喊大叫，口口声声要局长出来说话。盐局局长只好出来，怕得要死，跪地求饶，答应给盐工一些银圆。张宗贤带头喊叫：“不要银圆，要减税哩！”众盐工一齐呐喊助威。后经地方绅士栾茂青调解，盐局答应马上呈文减税，盐工才渐渐散去。

三、南川群众抗粮抗税斗争

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在地下共产党员马华援的支

持下，高树林和贺清平等人组织苏帖一里、苏帖二里的群众到清涧县抗捐拒税。近千名农民，每人背三升小米，在清涧县乐堂堡大佛寺聚齐，浩浩荡荡开赴清涧城下。县官不敢出城，派了爪牙在城墙上问：“谁是头？为何这样搞？”高树林答道：“都是头，没有尾，只因粮税逼得危。”县长传令让群众选代表谈判。高树林挺身而出与县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县长讥笑地问：“人们为什么叫你老麻？”树林笑着答：“因我辈大个低，所以我那些小孙们叫我老麻。”当即回敬了县长对他的人格侮辱，在商谈中他据理力争，县长被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当着群众答应每斗粮减收银圆一元，群众得胜而归。

本境民间艺人拓开科据此编成练子嘴《闹官》在淮宁河川说唱。

大旱之后，必有瘟疫。1930年至1932年，西川、南川先后三次流行线性鼠疫（俗称新症浪），波及现在的17个乡镇（仅瓜园则湾乡未出现）139个村庄，发病人数2370人，死亡约2120人，以石灰峪、郭家畔、钟家崓最为严重，村庄人口死亡半数以上。群众生活更加困难，要求革命的愿望更加迫切。党不失时机地在民众中开展各项活动，宣传革命主张，壮大组织，不仅推动了西川、南川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检验了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为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第二章 武装斗争

1930年底，中共府谷县委书记景仰山被捕，被押送榆林后取保释放；1931年2月，中共绥德县委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书记周发源脱党经商，白明善被捕（翌年1月21日遇害），西川、南川的不少支部停止活动，革命处于低潮。陕北特委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活动。西川、南川的共产党员积极响应特委的号召，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武装斗争，创建红军。

第一节 创建红军 开展武装斗争

一、晋西游击队

1931年5月上旬，晋西游击队在山西隰县辛庄（今属交口县）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缀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队旗，指战员个个颈系红领带（表示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名“牺牲带”）。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公布了经山西特委批准的领导人员名单：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党总支书记杨重远。大队下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由阎红彦兼任，第二中队长白锡林。杨重远在会上率领全体队员举手宣誓：“吕

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晋西游击队中，大队长拓克宽是西川佟家坬人，张逊谦是马家沟岔人，师俊才是师家坪人，冯祖光是冯家渠人。这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吕梁山



马文瑞壮大晋西游击队 袁鹏飞

区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他们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抗粮、抗款和斗争地主豪绅等革命活动，并在孝义县西宋庄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不断发展革命力量，播下革命火种，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后因敌人调遣强大兵力围攻，游击队按照省委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

9月2日，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达陕北，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给予大力支持，他动员安定附近的青年参加晋西游击队。他们曾途经南川，到达南沟岔、涧峪岔一带开展活动。

二、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1932年3月12日，共产党员刘善忠、高朗亭、高文清一行三人，趁南川怀宁湾雷珠湾寨子民团头子邱树凯不在之机，化装后进入寨子，智缴步枪六支、银圆百块，烧毁账簿等文契。次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经济员刘益三。

4月18日，游击队袭击延川县永坪镇民团，活捉团总刘广汉，在永坪召开群众大会，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7月，西北先锋队接受中共陕北特委领导。10月，中共陕北特委将西北先锋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明确要求游击队要以“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劳苦群众，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并创建陕北苏区”为主要政治任务。九支队主要活动在安定、清涧、绥德一带。1933年4月，陕北特委将九支队改编为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

三、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

1934年10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成立于安定苏区，队长高步仁，政治指导员拓嘉祯。高步仁是槐树岔人，拓嘉祯是横山魏家楼人。这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槐树岔和高家坪一带。由于有了自己的武装，大理河南部的槐树岔、高家坪、砖庙、驼耳巷等地逐渐发展为苏区和游击队活动区，一些曾经停止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又恢复活动。

1935年2月，在开辟米西苏区的斗争中，拓嘉祯壮烈牺牲，红一支队和十支队整编为一总队，队长高步仁，政委刘明山，继续在米西活动。

四、陕西省特务队（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

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陕甘宁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砦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书记。

1935年初，西北军委书记刘志丹批准共产党员刘振华（米脂人）的要求，在安定县的黄家峁村组建了10多人的陕西省特务队，牛刚任队长，刘振华任政委，队员有杜炳德、朱永山、刘振亚、郭海亮等，有步枪10余支。3月，由十支队和一支队整编而成的一总队，游击队员100余人，进入米西，开辟苏区。省特务队和一总队活动在花石崖、白草坬、土窑峁、磨石沟、瓜园则湾、李孝河、卧虎湾等地。主要任务是筹款，同时还肩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拉豪绅、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8月13日，西北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陕西省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三支队，队长牛刚，政委刘振华，下辖两个班（一班班长刘士元，二班长李丹如，队员有郭殿强、吴瑞旺、武志升等30多人，22支枪），配合一总队活动在米西地区。

五、陕北游击师

1935年10月，活动在米横地区的游击队扩编为米横独立营，不足300人，同时活动在米西、赤源两县的红一总队、二十三支队、红三总队在子长南沟岔整编为陕北游击师，师长柴福俊，政委魏国良（后叛变）。游击师下设四个连，其

中二十三支队编为二连，连长尚银武。1936年2月，游击师改编为红二十八军二团（有500余人，也称左路军），后东渡黄河。

1936年6月，原军分区司令员牛刚调走，由杨凤岐接任。在米西主力部队走后，军政合一，杨凤岐将其余游击队改编为独立七营，由县委书记惠子俊兼任政委。

第二节 开辟米西

米西主要包括今子洲县的大理河以北的三川口、瓜园则湾、李孝河、电市、水地湾等乡镇，横山县的石窑沟、韩岔、响水、武镇、殿市，米脂县的郭兴庄、郭家砭、龙镇、城郊、杜家石沟等地，还有马家沟岔、周家崓、马蹄沟的部分地区。陕北红军第一总队和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主要活动在这一地区。刘志丹同志带领部队两次打横山和国民党艾捷三部队战斗时，也曾在这一带活动。

这一地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井岳秀也积极清党反共，中共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

中共陕北特委建立后，米西地区的党团组织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又逐步发展壮大，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3年7月，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高起家坵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陕北全面开展武装斗争，创建巩固革命根据地，并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开展土地革命。米西地区的党团组织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组织群众开展抗粮、抗税斗争，发展壮大党团组织，筹建党的地方武装，

踊跃支援活动在米西的陕北红军和游击队，为武装开辟米西创造条件。

1935年，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北特委决定武装开辟米西。陕北红军总指挥刘志丹把任务交给红一总队和在米西地区活动的陕西省特务队。1935年3月，拓嘉祯带领红军十支队，穿过大理河到米脂西部（今瓜园则湾乡、三川口镇、李孝家河乡、横山石窑沟乡等地），武装开辟米西。1935年夏初，中共西北工委和刘明山、牛刚带领的陕北红军一总队和陕西省特务队30多人二次来到米西地区，在大王山、栾崮、卧虎湾一带活动，6月29日到庄果山下居住，因坏人告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刘明山、牛刚带领战士奋力突围，返回到安定。7月初，刘明山、牛刚又带领红一总队和陕西省特务队来到米西磨石沟一带，惩办反革命分子，建立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开辟红区100余村。

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夕，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派的驻西北代表朱理智等到达西北苏区，他们以“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中共西北工委的工作，致使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泛滥，在米西苏区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一部分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惨遭关押和杀害，损失惨重。

第三节 米西县苏维埃政权

1935年8月，陕北特委派遣杨彩霖带工作队来到米西，着手组建米西县委和米西县苏维埃政府。米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成立革命委员会；第二阶段，宣布米西县委和米西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杨彩霖同志来米西

后，发展组织，培养干部，发动群众，创造条件，秘密进行筹备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1935.9.24）晚，工作队在今横山县石窑沟乡折家山村召开会议，会上杨彩霖代表陕北特委宣布米西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杨彩霖、王文随、刘建业、蔡淑德、牛刚、张明德、李文真、李维新、朱维金、韩纪恩等十儿人，杨彩霖任米西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文随、刘建业任副主任，组织委员刘建业（兼），行政委员王文随（兼），宣传委员蔡淑德，军事委员牛刚，土地委员李福元，粮食委员李文真，经济委员白云腾，肃反委员韩纪恩，教育委员高树玉，赤少委员邢汉池。

米西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切活动都公开进行，打土豪，斗地主，组织贫农团、赤卫军、妇女会，朝气蓬勃。10月，革委会在李家崖召开了数千群众参加的村民大会，会上批斗了一些反动分子，杀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坏蛋。此后，米西各地农村开始把地主的粮食财物分配给贫苦群众，并着手组建区乡政府。到1935年11月底，米西革命形势发展到了高潮，在牛肋肢湾（今横山县石窑沟乡）召开大会，宣布中共米西县委和米西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参加大会的有县、区、乡干部十余人，中共米西县委书记杨彩霖，米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随，副主席刘建业、李文真、白云汉，军事部长牛刚，财政部长白云腾，土地部长李福元，劳动部长刘光汉，粮食部长李文真（兼），教育部长高树玉，内务部长赵生仁，裁判部长朱维金，保卫局长王德英。米西县工会、贫农会也同时成立，工会主席高树生，贫农会主席刘培章。米西县苏维埃政府下辖11个区，其中7个区建立了政权，其余4个区是

游击区。涉及今子洲境内的有4个区。一区以拓家畔为中心，包括水地湾、姬家塬、毛芦界、高庄则、韩老庄、粉刺疙瘩和白台一带；二区在赵寨子、庙坪、张洞、磨石沟、吴家园子一带；三区在瓜园则湾、纱帽湾、蔡老庄、吴山、麻地沟、西塬、万家塬、曹家岭一带；四区在牛肋肢湾、红花梁、李孝家河、中山岭、祖师山、李新窑、石窑沟、常岭塬、白草瓜一带。各区设乡，乡辖村，村政权是贫农会，有权决定农村的重大问题。

米西县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陕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中共陕北特委1934年8月28日寺塬里会议通过的《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精神，开展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肃清反革命，巩固苏区，扩红，优红，支援前线，游击战争，发展文化教育，破除迷信，宣传执行婚姻法，实行统一战线等工作。

一、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首先是划定阶级成分，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少分别定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连续揽工三年以上的定为雇农。土改政策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财物，富农的土地和多余的粮食、财物也被没收。土地按阶级、劳动、人口分配。男女一样分地，儿童分得成人的一半。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富裕中农欢迎自动献出多余的土地，中农的地不动，不够种的补足，贫雇农分好地，红军家属优待，不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在分配土地的同时，烧毁地主地契，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群众。土地改革的进行，使米西苏区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经济上获得利益，更加拥护共产党和新政权。

二、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了扩大武

装力量，政府动员了数千名青年农民参军，充实到红军正规部队和地方游击队中去，当时，扩红成绩很大，在三区，只有五六天时间，就有一百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有的一家弟兄几人争着去。政府还组织青年为红军家属代耕、代收，动员妇女做军鞋。米西第一任妇女部长何兰芳、三区的刘桂兰都是很突出的拥军先进工作者。当时流传一首民谣：“天下梧桐九条根，天下革命一娘生，虽然不是亲兄弟，一个看见一个亲。”刘志丹第二次打横山时，向米西县政府下达60头骡子、1200副担架、120副棺材的后勤援军任务，虽然困难很大，但都按时如数完成了。同时，妇女会组织妇女担任护士，粮食部抽调干部搞供给，天下了大雪，部队没炭烧，政府在石窑沟借了马家弟兄的两窑柏木料子和群众换炭，解决了缺炭之急。快过春节时，为了让部队吃上豆腐，政府动员所有干部和老百姓做豆腐，一直供部队吃到第二年东征时。

三、扩大、巩固苏区，发展党团组织。在敌我交界的地区，游击队一边采取化整为零、突然袭击的战术，给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一边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到1935年12月，米西县党员发展到700多名，党支部也建立起31个。

四、领导群众搞好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米西县苏维埃政府明文规定，“人人动手，劳动自救”。反对讨吃要饭，同时还要求注意做好财政收入，征收田粮税，保证军政人员的衣食供应。

五、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办列宁小学，建立识字组，组织宣传队，出版壁报和黑板报，改编陕北民歌成革命民歌。

六、肃清反革命分子，积极做好反“围剿”工作，严查严办坏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冬天，毛泽东在瓦窑堡接见了米西县的15名乡长，肯定了米西县的工作成绩。

米西县委和各区区委都设有军事部，各区成立游击小组（队）。1935年8月，米西地方游击队扩编为独立五营，有战士300余人，主要任务是打通通往神府的路线。9月，独立五营抽出80余人组成基干游击队，主要任务是护送干部去神府。时任神府特委书记张秀山，红三团负责人刘明山、刘万祥等人都是由他们护送过去的。

米西县苏区建立前后，进行过几次有影响的战斗。

栾砦战斗。1935年8月30日，刘明山、牛刚在栾砦一带开展工作，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配合民团企图“围剿”他们，由于有群众送情报，红军做了充分准备，敌人遭到沉重打击。

元庄窠战斗。此次战斗是消灭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的战斗。这些反动家伙经常四处骚扰，杀害区乡干部，破坏红色政权，群众既恨又怕。当时决定一总队和地方游击队消灭这股敌人。部队经过侦查，决定发挥我军善于打夜战的特长，于10月10日晚开始行动，于拂晓前进攻据点，直捣敌人老巢。敌人在睡梦中被红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红枪会头子贺二掌柜刚出村边，当即被枪毙。200多名“红枪会”成员大部分被歼灭。这次战斗缴获枪支300余，彻底清除了这一反动势力。

侯家高山战斗。侯家高山（今三川口镇侯家高山），地势险要，国民党军队利用这个有利地形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驻守两个连。这股部队经常在米西苏区，掳掠抢劫，对开展革命工作威胁很大。当时红军攻坚能力较差，很难拔掉这个

反革命据点，为了减少伤亡，决定诱歼这股敌人。1935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由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在山下放炮佯攻，守敌见红军人少，果然出击，红军边打边撤。敌人追了一会儿，就感到可能中计，掉头退撤，红军乘机反击，敌人逃回老窝，此次战斗虽未达到全歼敌人目的，但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人龟缩在据点，不敢妄动。

米西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大震动。1936年初夏开始，国民党开始了疯狂“围剿”，近30个团的国民党军队对整个陕甘苏区发动了进攻，在米西县周围就有横山、响水、波罗、镇川、米脂、绥德、双湖峪、三皇峁、周家崓、石湾等堡垒和三个团的兵力。国民党除利用水地湾、武家坡、侯高山旧有的碉堡外，又在石窑沟、韩岔、吴家园子、高家沟等地新建了一批碉堡。加之我军主力先后撤离米西，敌我力量悬殊，米西根据地逐渐缩小，直至后来完全丧失。1936年7月，接中共陕甘晋省委指示，撤销米西苏维埃政权，米西划为游击区，原县委和县政府改组为游击司令部。至此，建立近一年的米西苏维埃政权被迫解散，米西县的党政干部有的派往党校学习，少数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36年11月，由蔡淑德同志组织的米西工委在靖边县青阳岔成立，继续开展游击战斗，时隔不久，中共米西工委于1937年初并入中共横山县委。

米西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在米西地区的影响很大。米西人民经受了考验，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对新生活有了渴望。尤其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提高了群众觉悟，锻炼了干部，积蓄了力量，并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培养输送了一批干部，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第四节 秀延县苏维埃政权

民国二十四年（1935）初，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新解放的安定县东北部和米西南部地区建立中共秀延县委。2月6日，中共秀延县委和秀延县苏维埃政权在安定县玉家湾镇柳树沟村成立。秀延县委下设组织、宣传、统战、军事等部。县委书记李子厚，政府主席薛兰斌，副主席康润民、强晓初。本境大理河南的槐树岔、驼耳巷、砖庙、高家坪、淮宁湾、裴家湾、老君殿、何家集、杜家湾、苗家坪（山区）等地归其管辖。秀延县下设区委14个，涉及本境的有4个区：老君殿为十一区，驼耳巷为十二区，砖庙、高家坪为十三区，进士沟为十四区。

秀延县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打土豪，斗地主的革命斗争，把他们的土地、粮食、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当时流传在这一带的陕北民歌：“穷人家一条心，翻身闹革命，斗地主，打恶霸，什么也不怕。”充分反映了贫苦农民翻身闹革命的喜悦心情。

1936年7月，国民党部队对秀延苏区进行疯狂“围剿”，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秀延县大部分地域被国民党占据，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中共秀延县委和秀延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中共秀延县工作委员会。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共秀延县委恢复，但没有再建立政权。1937年9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秀延县委撤销，辖区并入中共安定县委。

秀延县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培养锻炼了大批干部，送去不

少青年参加红军，何家集的曹鸿都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2月，曹鸿都参加了秀延县保卫队，后调到中央保卫局特务队任战士，曾任博古、林彪的警卫员。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副主席、张云逸副总参谋长等乘车南下同蒋介石谈判，由曹鸿都等十几名警卫战士护送。当行进到甘泉湫沿山时，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他临危不惧，机智勇敢，保护周恩来副主席顺利脱险。

1935年1月，裴仰山和郭步岳得到红军一总队负责人刘明山的正确指导和有力支持，于2月创建了以驼耳巷为中心的秀延县十二区，将革命斗争公开化，不到几个月，扩展到250个村庄。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斗争，秀延县委决定把十二区划为三个新区。裴仰山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十二区区委书记等职。

第五节 “围剿”和反“围剿”斗争

面对西川、南川的革命斗争和日益“赤化”的形势，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他们在思想上予以奴化，行动上予以限制，军事上予以“围剿”，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制造白色恐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中央政府为强化统治，在全国推行保甲制度。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保，保有保长，合各保为联保，联保有联保主任，联保主任直接隶属于县。本境有18个联保，各联保设主任1人，佐理员1人，联保下设保、甲，订立保甲规约。1935年9月，国民党绥德专署编印了《保

甲要义》小册子，由绥德专署专员杭毅作序，对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词，开头即有“我们要铲除欺骗民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灭绝伦常、出卖祖国的赤匪”，而建立保甲，“正为消灭匪共的工具”。要求清查户口，清查枪支，发现奸宄（实指红军），以此对付革命势力。因境内共产党势力日渐强大，国民党又以联保为单位组织“铲共义勇队”，强迫18—45岁的男子当壮丁，围剿红军。将地主武装和地方枪支集中起来，成立保卫团（又称民团），并且在各军事要地修复山寨，建筑碉堡，驻扎军队，移民并村，强迫群众上寨子。马蹄沟栾本儒修新民寨，用蔦柳棒毒打不愿上寨子的薛双熬，因此有民谣：“修起新民寨，人人都上寨，薛双熬不上寨，蔦柳棒直打坏。”

1935年，国民党为镇压红军在老君殿、双湖峪、马蹄沟、三皇峁、周家崓、殿寺等地建起山寨，驻扎了大量军队。1935年在本境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有：

高双成八十六师（1935—1937）：左协中（四九九团）团部、张建南营驻周家崓镇；高凌云连驻马家坪；魏某连驻张家瓜（今高家坪乡张家瓜）；李某营驻三眼泉（后留周耀林连）；杨生福营驻水地湾（1936年调往殿寺）；刘世礼营驻三皇峁；刘正兰（代理连长）连驻马家沟岔（后留张锦岗排）。

高桂滋八十四师（1934—1937）：艾捷三团（五〇二团，团长艾捷三，双湖峪人）团部、郭子封营驻双湖峪镇；许凤治连驻周家崓镇；关宝琦营驻苗家坪；任芝雄团驻周家崓镇；张云衢炮兵营驻周家崓镇；魏某连驻槐树岔；折克达（便衣队）驻老君殿；史老么营驻三川口。

八十九师：李光荣营驻老君殿镇（从清涧调来）；张廷芝骑兵营驻老君殿苗家沟。

1935年3月，国民党在苗家坪设立“肃反办事处”，双湖峪等镇设立“肃反小组”。不久，国民党“肃反委员会西川工作队”在周家崓镇设立。张叔佩队的部属分驻西川各要镇。“工作队”和当地国民党政府驻军联合，在周家崓、纸房、冯家渠等6个联保建立“铲共义勇队”。到处打门窗、烧柴草、抢牲畜、掳衣物、毒打良民，强迫共产党员自首，杀害进步人士，仅小理河一带就杀掉30多人。槐树岔沟的地主于12月初，搬来八十四师一个连，连长姓魏，驻扎在芹园。第二年3月，不少地主搬到芹园寨子居住。这时魏连长奉调走了，他们为了保卫寨子的安全，防备红军，就由10个地主、富农集资在国民党五〇二团团团长艾捷三处购买了十支长枪。又和南某（带枪四支）在黄柏沟扣了红军某支队的大队长与刘登车二人。最后，由周文化调解，出了二百银圆才放掉这两个红军，又买来两支短枪。这样，他们共有十六支枪，有十户参加，组成了铲共义勇队，号称“十大反共组织”，人数只有十几个。他们铲除红军、共产党不遗余力。先后掳粮九次。第三次是1935年4月在仓窑沟，抢来四百只羊，二十多头牛，还有粮食和其他东西，同时烧了许多门窗。可以想象到，这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官土匪”。在另一次抢劫中，捉住两个老百姓，一个叫师维斌，另一个叫阎四，并把他们枪毙了。

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军事“围剿”下，中共党员、秀延县赤卫队长、何家集镇蛇沟村的高彦喜，陕北游击队第二十三支队队员、三川口镇楼坪村的杜良荣，陕北红军兵

运员、周家砦镇双庙湾村的刘占保，中共党员、陕北红军粮食委员、电市镇温家沟村的马宏恩先后惨遭国民党军队杀害。

1936年夏，肃反工作队由周家砦迁往瓦窑堡。

1934年12月21—22日（农历十一月十五至十六日）国民党军队在今槐树岔乡芹园村、黄柏沟村，以“围剿”红军为名，逮捕数名群众，皆被杀害。

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米西、秀延苏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帮助陕北红军反“围剿”。

1934年春，共产党员李维军、张效良、吴猛旺、郭殿强和马凌云在三皇峁合资办起“五合馆”，将其作为秘密联络点，用来从事地下活动。10月底，因叛徒告密“五合馆”遭破坏。

1934年9月，陕北红军先后两次攻打老君殿镇圉圉山寨子，未克。

国民党第一次“围剿”陕北苏区失败后，又纠集了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准备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令高桂滋八十四师于1934年秋末由山西西渡黄河进驻绥德地区，西川、南川也驻扎了高桂滋部下，其中五〇二团团部就驻扎在双湖峪。

为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特委于1935年2月5日在安定周家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两根据地的领导和红军的指挥。同时，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到陕北，重点打击高桂滋部。

1935年4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缺红一团）从南梁

出发，于4月22日到达寺儿畔，歼国民党八十四师五〇一团一个连，首战告捷。于5月1日进到安定县的白庙岔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合，成立了两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

1935年5月至6月底，西北红军在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指挥下，转战800里，消灭敌人2000余人，连续解放6座县城。7月10日，刘志丹率红军主力部队解放靖边后，向盘踞在三皇峁的国民党四九九团一营（刘世礼部）发起攻击，守敌凭借山寨碉堡顽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12日上午，红军已攻占山寨柳树圪塔高地，击毙、击伤敌连长各一名，歼敌两个连，红军战士斗志倍增，加强火力，猛攻山寨，这时敌援兵——张廷芝骑兵营从何家集赶到，袭击红军后侧，为了减少牺牲，红军于13日撤出阵地，转移到蛇沟待命。此次战斗虽未攻克山寨，但给予国民党军队有力打击。

三皇峁战斗后，刘志丹率红军主力结集在蛇沟，伺机消灭敌人。不久，国民党高桂滋部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三营和张廷芝的骑兵营从老君殿出发到高家塌抢粮。刘志丹当即决定伏击敌人，红军八十四师、四十二师分别占领高家塌南北山。刘志丹作了简要动员讲话并亲自指挥，他说：“我们在三皇峁吃到嘴边的肉被张廷芝捣乱没有吃成，今天艾捷三送上门来，一定要给他迎头痛击！”当国民党军进入伏击圈时，红军战士居高临下，南北夹击，敌人乱作一团，争相逃命，战斗顺利结束，共歼敌四个连。团长艾捷三负伤后，率残部逃往老君殿圪塔山寨，至此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以失败告终。苏区群众当即编唱了陕北民歌《刘志丹打艾团长》四处传唱：

六月里来热难当，
双湖峪闪出个艾团长。
艾团长来领大兵，
一心要想打红军。
一路放火往前行，
掳些牲口好骑乘。
赶黑到了张家坪，
张家坪的坏种笑盈盈。
守卫放哨老操心，
把他艾团长当老人。
鸡叫三声天大亮，
拔营收哨快起身。
走狗坏种头前行，
艾团长后面排大营。
只顾走，不顾看，
二郎山上碰见刘志丹。
刘志丹，名声大，
艾团长听见害了怕。
艾团长领兵往后退，
小蛇沟里出来一纵队。
一纵队，仗火硬，
打得艾团长撑不定。
艾团长上了寺儿畔，
山里下来个老三团。
老三团，挂子端，
快枪机枪手榴弹。

红军军号吹了个欢，
艾团长跑上圈圉山。
西庄里落下个灶马星，
东庄里跑了个小张营。
幸亏太阳落得早，
若不然，艾团长脑袋提尿罐。
不是艾团长跑得欢，
早把艾团长筋打断。

1935年冬，刘志丹率红军队伍打横山后返回石窑沟，这天得到情报，国民党四九九团团团长左协中的太太前往蒲城省亲后返回周家崓。刘志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决定在三眼泉一带伏击。第二天一早，刘志丹登上三眼泉小河西庙梁山等到上午11时许，国民党约一个连的兵力从周家崓出发来抢粮食，刘志丹立即命令战士埋伏隐蔽。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刘志丹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敌人稍作抵抗后，发觉是红军主力，便夺路而逃，上了双庙湾寨子。这次战斗毙4名敌军，伤6名敌军，俘虏12名敌军，国民党十二连连长杨德成也被打伤。

1935年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师到磨石沟、沙坪、李家瓜等地驻扎。驻扎在周家崓的左协中、三皇崓的刘世礼、三川口的史老么等国民党驻军获得情报后，相互串联，分三路向游击师进攻，企图围歼。由于夜间作战，刘世礼部和史老么部误打起来，游击师乘机撤退，直到天亮，敌人调号才发现互相误打。游击师撤退时，三连指导员刘振华（米脂人）带几名战士断后掩护。他作战十分勇敢，给追击而来的敌人迎头痛击，

后受伤被敌人杀害，敌人割下他的头挂在三皇岭街上示众。刘振华深受当地群众爱戴，群众唱道：“对面山上一朵红花，刘振华闹革命人人爱他，咱们红军千千万，只你国民党坏蛋杀不完。”

1936年4月26日，由九支队改编的独立营在高家塌遭敌袭击，独立二营营长封九应、政委陈克功率战士顽强抗击，使正面进攻之敌——张廷芝骑兵营受挫。正当僵持时，史老么从黑林沟后面抄上来，独立营腹背受敌，经奋力抵抗，营长封九应和少数战士突围，多数战士遇难。

米西县和秀延县的游击队、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除了直接配合作战外，还侦察、传送情报。保证敌人每一个行动，红军能够准确地掌握，使红军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人民群众为红军带路，运粮运草，送饭送水，抢救和转送伤员。那时的红军没有后勤人员，后勤保障工作全由贫苦农民担当。驼耳巷的农民马女，在红军打三皇岭时给红军送饭，返回途中被张廷芝的骑兵抓去，枪杀在三皇岭。

从以下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军的厉害以及西川、南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决和勇敢。

驼耳巷家人硬茬，
上崖窑把口子把，
胶土疙瘩就把白军打，
打得白军家没办法，
祷告叫千大。

队伍逃转岔，

又挨老百姓打，
做下些鸡肉没吃它，
吆上些毛驴快跑吧，
跑到了乔家岔。

跑到了乔家岔，
老百姓不害怕，
后山上红旗绕着你怕不怕！
和下白面又没吃它，
咱们赶快再跑吧！

白军家跑得欢，
跑到了高崖畔，
高崖畔翻过山，
营盘扎西川，
老百姓遭了难。

家什都打完，
粮食都驮完，
门扇、窗子烧了个稀巴烂，
害的百姓走后山，
赶快调咱红三团。

调来了红三团，
西川扎了个满。
前后山包围严，

捉住坏种砸肉馅，
好人你别胆寒。

身背秃角牛，
要打马蹄沟，
打开了马蹄沟先杀联保主，
怕得些坏种直磕头，
看咱们红军牛不牛？

三四年腊月二十八，
打开了南沟岔，
老百姓，欢迎他，
磨麦子把猪杀，
苏区扩展大。

豪绅拉光了，
土地均分了，
高利贷钱儿不要了，
救出穷人了。

红旗大发展，
来到小理河川。
穷人个个当红军，
暗地里都闹红。

国民党八十四师在陕北镇压革命，“围剿”红军，接连失败，不得人心，师长高桂滋处境十分困难。高桂滋是定边人，

他在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产生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念头，也同意不再“围剿”红军。

为了顾全大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红军积极争取与八十四师和平共处。1935年12月24日，高桂滋派其中校秘书马文生，与中共代表赵仰甫在苗家坪南丰寨会谈。经过磋商，达成协议：彼此表面对立，暗中互不侵犯，允许小冲突，以障外人耳目；红军进攻其他国民党部队，八十四师不予支援；红军急需物资，八十四师尽可能暗中支援；彼此约定密电及以后暗中联系方式。之后不几天，高桂滋急电北平办事处，给赵仰甫配了一副近视镜，并给买了纸张、笔墨等物。之后，八十四师和红军未发生摩擦，并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川、南川人民在陕北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开辟苏区、壮大革命力量、开展武装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也在艰难困苦的形势下紧紧依靠党，坚定跟党走，最终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编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

(1937.7 ~ 1945.8)

第一章 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的活动

第一节 抗敌后援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接着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是为“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其中有东北抗联、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局部抗战。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制日寇的新进攻”。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于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隔黄河炮击吴堡宋家川，企图渡黄河侵略陕北，进而进攻大西北，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抗击日军，保卫河防，国共双方协商在黄河沿线分段设防，由八路军设立绥德警备区司令部，率部驻防。负责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县河防保卫任务。但5个县的行政事务仍由国民党派员管辖。

为了统一领导各级党的工作，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更有效地组织动员各界民众抗日，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组建绥德特区委员会。11月，中共绥德特委在绥德警备区民运科内秘密建立，书记郭洪涛，驻地绥德城内仓房疙瘩，对外以“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民运科”的名义活动。特委派员恢复和建立县、区、乡各级党组织，同时在各县皆建立抗敌后援会，以此进行公开活动。西川、南川陆续成立了7个区级抗敌后援会，分属绥德、清涧、米脂3个县的抗敌后援会领导。

这7个区的抗敌后援会属绥德县的3个：双湖峪联保抗敌后援会、三皇峁联保抗敌后援会、周家崓联保抗敌后援会；属米脂县的3个：苗家坪联保抗敌后援会、驼耳巷联保抗敌后援会、瓜园则湾联保抗敌后援会；属清涧县的1个：老君殿联保抗敌后援会。

抗敌后援会的主要工作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争取各联保的领导权，或者引导各联保的主任倾向共产党。

国民党也加紧了自己的统治，他们把各联保的统治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想方设法限制抗敌后援会的活动。

这一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皆派军事组织和部队进驻西川、南川，国民党还在西川、南川组建了不少保安中队，名义上是维护地方治安，实际上是防止共产党活动。西川和南川有数个保安中队，其中有张道源的保安二中队，驻周家砦；蔡致中的保安八中队，也驻周家砦；在南川组建了张宏有、邱树凯的两个保安中队，皆驻老君殿。

抗敌后援会和各区联保貌合神离，有联合，也有摩擦。

西川、南川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争取、分化、瓦解国民党保安部队、联保，对国民党政府制造的摩擦，针锋相对地开展反摩擦斗争。

1939年5月7日（农历三月十八日），十里盐湾的盐工在地下党员张文直（葭县人）、杨继洲的领导下，趁庙会之机，开展了第三次对盐局的斗争。约定以三皇峁寨子圪塔庙内打钟为号，钟声一响，数百名盐工一齐涌向盐局，有的盐工把盐局脑畔的花栏墙也砸烂了。盐局的人员连刚做好的白面也没顾上吃，就逃跑了。

1939年夏天，共产党在南川裴家湾首建农会，半公开活动。

第二节 西川、南川的解放

西川、南川的解放是中共绥德特委和警备区反摩擦斗争的成果。

绥德为北方重镇，战略要地，明代九边之一的延绥镇起初就设在绥德，素有“天下名州”和“四省通衢”之称。抗日战争时期，绥德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是陕甘宁边区与华

北抗日前线之间的咽喉要地。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商定，将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等5县的抗日防务，交由八路军留守部队接防，但行政机构和地方部队仍是国民党的，在绥德城内设有国民党陕西省第二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国民党绥德专员是何绍南。何绍南是北京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军长和中将参议，且老谋深算，深为蒋介石赏识和器重。1936年3月，何绍南以国民政府特派赈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来绥德，1937年4月接任绥德专员。此人对蒋介石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摩擦专家和顽固分子。他任绥德专员后网罗了几十个保安中队，名曰保护治安，实则大搞摩擦，制造各种事端。他组织学联会，在绥德公开张贴标语，煽动学生向八路军绥德警备区司令部请愿，要求八路军撤出绥德。还杀害了八路军七一八团三营的副营长尹万生、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正富，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和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高步元等人，让其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损害八路军的声誉。

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开始，共产党对何绍南采取克制态度，对其晓以大义，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摩擦，一致抗日。何绍南却认为共产党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活动。对此，毛泽东和彭德怀曾分别在延安和西安对他的倒行逆施进行过严厉的指责和警告，斥责他是“摩擦专家”“秘密的汪精卫”。但何绍南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煽动保安队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先后打死打伤八路军留守兵团机枪连连长和哨兵多人，不择手段，明火执仗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白银案”“烟土案”“赌博案”“土匪案”

等一系列案件，诋毁八路军的声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绥德特委和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原则，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是在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后，斗争更加激烈。

中共中央军委于1939年8月7日电令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为巩固边区和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件，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调动”。1939年10月，王震奉命率部从抗日前线恒山地区长途跋涉，返回绥德。三五九旅司令部驻扎在绥德城东山仓梁圪塔上。

王震率部进驻绥德后，何绍南造谣说，三五九旅在前方吃了败仗，才退回绥德。他还鼓动喽啰、走卒扯着破烂旗子，在街上歇斯底里地狂喊：“欢送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王震刚接河防事务，就在吴堡的宋家川、岔上打了几个胜仗，使日寇不敢轻举妄动。进驻绥德后，王震率领三五九旅战士在绥德城进行了一次武装游行。战士们扛着从日寇手里缴来的枪，着装整齐，容光焕发，威风凛凛地走上绥德街头，展现了八路军的飒爽英姿。

三五九旅还举办了抗日战果展览。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摆在绥德群众面前。三五九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杀伤了不少敌人。在事实面前，绥德群众对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交口称赞，热烈欢迎八路军进驻绥德。

但何绍南四处散布谣言，污蔑三五九旅是“溃军”，暗杀八路军零星外出人员，冒充八路军骚扰群众，破坏八路军的声誉，限制群众卖粮给八路军，不准群众借房给八路军，张贴反动标语，唆使学生到八路军绥德警备区司令部“请愿”，

企图迫使八路军撤离绥德。尤其是他利用自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和保安团团团长之职的方便，唆使他的保安团公开地、秘密地和三五九旅较量。

面对何绍南的挑衅，三五九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震公布了何绍南的“十大罪状”：一、破坏抗战。八路军积极抗战，战果辉煌，何绍南一伙到处诋毁、污蔑八路军不打日本，专打国民党军队。指使特务勾引八路军战士开小差，千方百计分化、瓦解八路军部队。二、暗杀中共党政人员和八路军战士。三、成立土匪别动队，扰乱社会治安。四、破坏警备区土地政策。五、借禁赌为名，贪污巨额罚款。六、借禁烟为名，搜查、没收烟土，却将大部分罚金和烟土私吞，转手贩卖，获取巨利。七、破坏公路工程，贪污工人工资。何绍南一伙勾结整修咸榆公路工程处，扣押工人工资白银数万元，并责令停工，使数百名工人生活陷于困境。八、以禁用银圆为名，两次罚没了十余个店铺的十五六万银圆，中饱私囊。而罚没最多的是西川李银家沟周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脱党的周发源又返回绥德，从事商业。周家是富户，在周家崆办有三个商号（同泰恒、同裕恒、同和恒），在绥德办有两个商号（同裕成、同庆成）。周发源与其侄周自岐在绥德经营有方，资本猛增，1938年，其资本即为10多万银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以禁用银圆为名，在1938年9月，罚没同裕成银圆4万余元，1939年4月，罚没同庆成银圆4.9万余元。周发源和周自岐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和何绍南进行了斗争。九、组织反革命的黑军和黑军政府，大干坏事，反而嫁祸于人。十、大搞特务活动。

警备区政治部把何绍南的“十大罪状”编成小册子，广为散发。

王震把在吴堡、绥德、义合一带为非作歹的保安队的枪械缴了。清涧县保安队如惊弓之鸟，逃到瓦窑堡去了。

1940年2月3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和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边区已忍让三年。”“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义之尽也。”程潜只得回电，表示同意边区各县之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

1940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九），以警备区政治部的警备剧团为主，组成武装宣传队，由演员化妆成各类人物，将何绍南的“十大罪状”具体事实，在绥德城内外大张旗鼓地进行表演。群众纷纷控告何绍南，要求八路军为他们做主。在一片责骂声中，何绍南只好向蒋鼎文递了辞呈。

何绍南见阴谋败露，无法在绥德立足，于是率绥德专署和保安司令部、保安团队千余人盘踞在绥德二郎山上，企图和八路军较量。王震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战士严阵以待。

2月29日晚，四面楚歌的何绍南令人将弹药、物资、文件、档案等全部烧毁，偷偷地跑了。

王震任命李仲英为司令员、何叶平为副司令员、张秀山为政治委员，组成截击队，堵截和追击何绍南。

何绍南从二郎山西南下山绕七里铺到西川南丰寨沟口逃

窟，穿过大理河向榆林、横山方向逃跑。

3月1日晨，截击队和何绍南的溃兵在西川的高家砭接了火。何绍南的残兵败将风声鹤唳，如惊弓之鸟。八路军全歼保安七中队，截回绥德专署二科科长申体康等100余人。

何绍南侥幸逃跑。但何绍南的保安八中队和二中队仍驻扎在周家砭，正月十五日，周家砭前街是共产党的秧歌队，后街是国民党的秧歌队，十五一过，国民党保安队就盘踞到马家沟岔阳寨子。3月7日（正月二十九日），八路军某部攻打马家沟岔阳寨子。何绍南保安二中队、八中队顽抗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逃奔横山郑家寨子。至此，境内西川、南川全境解放，西川、南川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何绍南逃跑到榆林。国民党在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的骨干分子也纷纷外逃。武家坡就有米脂县的国民党县党部，而绥德国民党县党部则逃到石湾。就连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也分为两部分，国民党在横山响水办起绥德师范，在镇川办起米脂中学。

第三节 西川、南川解放初的工作

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设置绥德分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团的协助下，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专署驻地绥德城内九贞观，由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任专员。绥德分区召开了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抗日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和地方驻军选举产生。县、区的抗敌后援会被撤销。随即，绥德分区所属的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

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西川、南川的共产党活动逐渐公开，组织领导本境群众开展民主建政工作。1940年3月，清涧县国民党县政府被推翻后，中共清涧县老君殿区委公开，同时，增设了中共清涧县裴家湾区委和中共清涧县淮宁湾区委。1940年5月，中共绥德县委对解放后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撤销了中共绥德西区委，公开成立了中共绥德县双湖峪区委和周家砦区委。1941年4月，米脂县民运股股长公开称县委书记后，派驻各联保的民运干事也公开称区委书记。境内有中共苗家坪区委和中共驼耳巷区委。

二、民主建政

1940年4月，境内整理保甲，原保甲长重新改选。同时，登记私枪，各保甲组织自卫军，维护地方治安。1941年10月，绥德分区决定废除保甲制度，地方政权改为区、乡、行政村三级。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五一施政纲领》，各级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男女平等。5至6月，绥德、清涧、米脂等县进行选举，各阶层群众踊跃参加，采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民给自己认为称职的人的碗内投豆子。以双湖峪联保为例，居民11026人，选民6708人，够选举年龄的有15人因精神病而无选举权。实际参加选举的选民4607人，占选民总数的69%，这次选出的代表称心如意。选民唱道：“青青的天，白白的云，选举不分

各阶层，男女穷富齐平等，自己管自己事，不许任何人，欺压老百姓。”

与此同时，各行政村主任及自然村村长都予以改选。

8月，清涧县举行第一届参议会；10月，绥德、米脂召开第一届参议会，西川、南川的一些开明绅士被选为参议员，有安志铭、拓生荣、刘万和等。

11月6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本境苗生枝、安志铭、冯文江、苗仰秀、裴仰斗等为参议员，出席了会议。

三、基层群众组织的建立

1940年春，在党的领导下十里盐湾成立盐工工会。盐工工会成立后，组织盐工积极生产，并和盐主协商，7月12日，在三皇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盐工和盐主的对半分成改为六四分成，盐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1940年冬，西川、南川各地皆建立农会。

暑假期间，绥德师范组织学生到延安参观学习。毛泽东接见了学生代表，给马蹄沟袁家砭的学生霍仰山题词：“艰苦奋斗。”

四、清剿土匪

1940年秋，八路军在绥德、清涧、安定边界击溃薛应九、拓怀兴等土匪400余名。是年始，国民党顽固派经常在本境派遣特务、政治土匪，制造麻烦，搞摩擦。1942年1月，马蹄沟周围发现土匪，发生抢案，当地驻军，全力清剿，十数天消灭土匪20余名。

五、高岗和张闻天来本境调查

陕甘宁边区时期，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组织了不少调查团到各地进行调查。当时第一个大型调查研究组织是由西北局书记高岗担任团长的考察团，由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边区研究室的30多人组成，调查的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1942年1月西北局调查团到周家砦、双湖峪等地调查研究土地问题，后来写成了《双湖峪调查》《绥德双湖峪九乡二行政村调查》《双湖峪土地纠纷事件》《双湖峪调查变动中的艾绳义》《双湖峪家庭调查》等调查报告。他们还到米脂、绥德的其他地方调查研究，后来由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写成《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受到中央和西北局的高度关注，为后来土地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2年12月10日至194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来本境调查，“搜集有双湖峪市镇乡各花户经济状况及公粮材料，未整理好（附带调查有张家寨子户地材料、马蹄沟盐滩材料、徐家沟炭窑材料及西川各区地主材料，均未整理）”。张闻天对双湖峪镇张家寨的丁田制很感兴趣。张家寨张姓共有18石老粮的土地（即出18石田赋的地，约有数千亩，具体数字不详），其土地为张姓户族公有，凡年满16岁的男子可上丁分得一份土地，直到死后才将丁地退出，女子无此权利。为了分得均匀，川地一年分一次，山地五年分一次。分地时根据地的远近、好坏，切割成不同的地块，然后抓阄决定由谁耕种。族人只有耕种权，没有所有权，不允许出售给他人。这种制度实行多年，即使迁移在外地的族

人，仍享有耕种权。

六、军民协作，发展生产

1940年，本境成立合作社4个。

1941年3月，三五八旅与当地政府在徐家沟合建的煤矿，于次年3月投产，有职工240名。

第四节 设立子洲县

绥米清安边（界）办事处和西川划县

1940年2月29日，八路军三五九旅驱逐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本境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子洲县未成立前，本境“为各县边界插花地区，在行政领导各事业建设上多为不便……这块地区在政治上形成三个不管的严重现象……人民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土匪四出抢劫，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为了进一步建设西川，改善群众的生活”（均引自谢怀德1944年9月1日《二年来的行政工作报告》），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1941年8月，绥德警备区在双湖峪镇设立绥米清安边（界）办事处，拟在西川筹建一个新县。

1942年6月，绥米清安边（界）办事处有干部30人，通讯员5人，杂务人员7人，着手西川划县工作。

办事处经过讨论，拟把米脂的瓜园乡（等于区）、复兴乡、驼耳乡、苗家坪半个乡，绥德的双湖峪、周家崓两个区，清涧的淮宁湾、老君殿、裴家湾三个区，安定的南沟岔、涧峪岔两区，约60个乡，八百村庄，一万八千户，八万至

八万五千人口，定名为绥米清安边界行政区办事处。专署派武装科科长曹华山，教育科科员郭凤鸣参加，以曹华山为主任组织筹备委员会，由党政军及地方公正人士参加组织。

8月1日，中共西北局决议，成立中共西川县委。县委书记为马义。

同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办事处拨开办费5万元。

西川办事处于八月召开划界会议，专署、米脂、清涧、绥德代表及区长共十人参会，当即划定境界如下：

面积——东至沙滩坪区高家砭乡，西至复兴乡教场坪，共计宽105里，南至清涧淮宁湾区淮宁河，北至米脂瓜园乡黑山则计长140里。

乡数54个，决定划分为下列8区——苗家坪区、双湖峪区、马蹄沟区、周复区、驼耳区、瓜园区、老君殿区、裴家湾区。人口88800名。

无论绥德、米脂、清涧居民对这次划县，皆甚欢迎。区乡干部一致赞成。没有被划入的靠近地区还有向办事处馈送酒肉、托人说情要求划入者。绥德沙滩坪区，有这类事情发生，因县治地点适中，公私来往都较旧县治更为便利。

绥西（西川）办事处

9月18日，西川办事处正式成立，下设老君殿、裴家湾、驼耳巷、苗家坪、双湖峪、马蹄沟、周复（即周家崓、复兴乡）、瓜园则湾8个区，49个乡。办事处主任马义，副主任曹华山。办事处驻地双湖峪。

1942年10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一、西川办事处应更名为绥西办事处；二、任命马义同

志为绥西办事处主任；三、安定属南沟岔、涧峪岔二区划归办事处，并指示：该办事处原驻双湖峪似不适中，建议绥德专署在马蹄沟或周家砦自行抉择一地为宜。

1942年12月22日，绥西办事处启印。是时，办事处下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司法处，有人口91170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另两项决议——安定属南沟岔、涧峪岔二区划归办事处；该办事处原驻双湖峪似不适中，建议绥德专署在马蹄沟或周家砦自行抉择一地为宜。没有执行。

1942年11月，中共绥德地委决定白清江任绥西县委书记，次年2月莅任。

1943年3月，新开辟的原米脂石窑沟区划归绥西办事处。绥西办事处成了9个区56个乡。

子洲县

1943年11月28日，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签署发出《关于呈请米脂、葭县县务委员会改名为县政府及绥西办事处改名为西川县的呈文》：“……关于绥西办事处，各区民众呈请将绥西办事处改名为西川县，并选举县议会，与反汉奸特务工作取得联系，做到真正巩固西川。查自成立绥西办事处及今，一般人均称西川县，不呼办事处。为便利工作起见，应将绥西办事处改名为西川县，谢怀德为西川县长。同时于明年一月进行选举，和反奸斗争取得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1943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由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合签署的《关于米、葭、西三县正式成立县政府的命令》（战字第799号）：

兹决定自明年元旦日起，我原有之米、葭两县政务委员会，正式改为米脂县政府、葭县县政府，并委任马继棠为米脂县县长，贺秉章为副县长；马义为葭县县长。

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自明年元旦日起，亦正式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子洲同志，命名该县为子洲县，并委任谢怀德为子洲县县长。

1944年1月10日，子洲县成立大会在双湖峪举行。会议主席团由李政委、黄大队长、白清江、谢怀德、蔡自举、鲍亮声、王思成、王生源、郭富财、李子周、王□才、王主任、刘副团长、辛汉民等十多人组成。并聘请毛泽东、朱德、高岗、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袁任远、徐司令员、王震、何副校长为名誉主席。会议议程：升旗，奏乐开会；向革命领袖致敬；向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默哀；推选主席团，献旗献词；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县长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县长讲话；劳动英雄代表讲话；报告，政府报告工作及讨论；讨论提案办公事；自由讨论；县长致闭幕词；献旗；呼口号等。

2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消息：《纪念革命元老李登瀛同志 绥西改为子洲县》。

子洲县成立后为9个区57个乡（石窑沟区增加1个乡）。

子洲县的设立，对于西川、南川的建设是一个新的起点，对巩固陕甘宁边区，支援抗日战争，也有重大意义。

第二章 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

第一节 党的建设

1942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批准设立西川县委，1942年12月，西川县委改为绥西县委，书记马义。县委隶属中共绥德地委领导，未设工作机构，只有吴亮明一人负责组织工作。

1943年3月，绥西县委设立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工作机构。书记白清江。并配备了4名县委常委和7名委员。各区皆设立区委，有区委书记1名，各乡有指导员1名，党的活动虽然公开，但党员仍对外保密。当时，有裴家湾、老君殿、驼耳巷、苗家坪、双湖峪、马蹄沟、周复区、瓜园则湾8个区委，1943年增设中共石窑沟区委。截至1944年底，全县有9个区委、57个党支部，有1292名共产党员。裴家湾区委辖裴家湾乡、淮宁湾乡、郑家崓乡、进士沟乡、邱家坪乡等6个乡党支部，首任书记高福昌（兼区长）；老君殿区委辖张家坪乡、红柳湾乡、曹家沟乡、苗家沟乡、何家集乡、老庄乡等6个乡党支部，首任书记李子洲，区长黄巨金；驼耳巷区委辖王家岔乡、驼耳巷乡、黄峁河乡、崖窑峁乡、高家园则乡、砖庙乡等6个党支部，首任书记辛汉民，区长郭多珍；苗家坪区委辖曹崓乡、焦渠乡、苗家坪乡、艾家圪崂乡、艾家河乡等5个乡党支部，首任书记李永盛，

区长曹耀桂；双湖峪区委辖姚家砭乡、袁家砭乡、田家沟乡、王崖乡、阳湾乡、双湖峪乡等6个乡党支部，首任书记刘书亭，区长康雄世；马蹄沟区委辖三皇岭乡、吉利坪乡、马蹄沟乡、四旗里乡、三眼泉乡、巡检司乡等6个乡党支部，首任书记高树玉，区长王思成；周家砭区委辖双庙湾乡、周家砭乡、冯家渠乡、马家沟岔乡、槐树岔乡、张石畔乡、马家坪乡、惠家砭乡等8个乡党支部，首任书记田绍锡，区长冯祖烈；瓜园则湾区委辖楼坪乡、王家塬乡、瓜园则湾乡、朱家阳湾乡、侯兴庄乡、钟山岭乡等6个党支部，首任书记李虎岗，区长常生和；石窑沟区委辖米家塬乡、毛楼界乡、罗圪台乡、石窑沟乡、棉盆坬乡、安家老庄乡、高庄则乡、瓦高庄乡等8个党支部，首任书记高树玉，区长康雄世。

第二节 政权建设

1942年9月，西川办事处成立，10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其更名为绥西办事处，12月22日启用印章，主任为马义。办事处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司法处。其职责和人员配备如下：

1. 秘书室：政务秘书一人，事务秘书一人，文书兼收发一人。掌理拟缮文件，印信档案，收发庶务及不属各科之事项。

2. 第一科：正副科长各一人，科员三人，掌理选举、抗战动员、干部管理、土地、婚姻、救济、优抚、租佃、保育、保健、卫生、户籍、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等民政及文化教育事项。

3. 第二科：正副科长各一人，科员三人，掌理财政收支、地方税收、公户收支、农牧、工矿水利、植棉植树、交通运输、合作社、社会经济调查、领导人民生产、粮食收支、仓库管理等财政经济建设、粮食管理事项。

4. 第三科：正副科长各一人，文书一人，科员二人，掌理下列事项：

(1) 关于汉奸敌探，奸细盗匪以及危害分子之侦察，拘捕、预审看守等事项。

(2) 关于社会调查及各种嫌疑分子之清查、检查、登记、统计等事项。

(3) 关于违禁物之查禁事项。

(4) 关于社会治安之布置与其他事项。

(5) 关于哨站和检查之布置和管理事项。

(6) 关于人民锄奸保卫组织，教育和指导事项。

(7) 关于布置警戒、警卫会场，保卫机关，以及交通维护，通缉军政在逃人犯，镇压武装汉奸，协助军队剿匪事项。

(8) 关于侦察情报组织之事项。

(9) 关于其他有关政治保卫工作事项。

(10) 保障政府各种政策法规之实现，不使敌人破坏。

5. 司法处：处长由主任兼，另设裁判员、书记各一人。管理本县民刑案件之第一审。

还有税务局，后来增设了自卫军大队部。

办事处下辖裴家湾、老君殿、驼耳巷、苗家坪、双湖峪、马蹄沟、周复（即周家壩、复兴乡）、瓜园则湾 8 个区，49 个乡。1943 年 3 月，增加了石窑沟区，共有 9 个区 56 个乡。区公署设区长 1 人，行政助理员、保安助理员、

秘书、自卫军营长各1人。乡政府有委员6—8人，乡长1人，锄奸委员1人，文书1人，还有兼职的优抗救济委员、经济建设委员、文化卫生运动委员。各行政村有主任1人，各自然村设村长1人。

据1944年4月1日统计，子洲各级行政干部，共有178名。其中县级26名（男24名，女2名），区级39名，乡级105名，附属机关8名。这些干部的文化程度是大学3名，中学19名，小学43名，粗识字82名，文盲31名；党派是共产党员103名，国民党员15名，无党派人士60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2名，富农家庭的12名，中农家庭的49名，贫农家庭的106名，雇农家庭的9名。

1942年绥西办事处组织各乡民主选举。这次选举10月初开始，11月初全部结束，全县8区49个乡全部民主改选。这次乡选经过，大多是先集中县区干部试办一个乡，再进行普选，调查登记宣传解释配合进行，投票用点算法，有的区拿各种豆子代表各个候选人。征求提案时用个别谈话方式，然后代人民写出。居民小组的划分，使议员和人民关系更为密切，妇女也便于参政。例如，某小组妇女们互相讨论：“他大叔比他大哥哥还强，选他大叔好了。”同时各小组地区集中，领导也较方便，使人民对民主的认识大大提高，乡选时许多公正人士冒雨参加，大家敢于批评政府工作。例如，双湖峪区五乡人民批评乡长把储蓄奖券奖金领回后做了一次买卖。苗家坪镇人民批评草站太马虎，霉坏公草达一万斤左右。批评政府解决诉讼太慢。驼耳巷区一乡长王某账目不清，对于代耕工作也不切实检查，人民不要他当乡长。由于去年的经验，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更重视了，如马蹄沟区某村，过去

议员中大多为富农，在参议会上讨论人民的负担时很不公平，这次选举时大家就注意到议员的成分问题。过去一些不称职的干部，在这次选举中均落选，乡长中有 20 位是新选出来的。但也有个别干部把当选看作负担，暗中活动不当选，如双湖峪区四乡吴某对选民说：“不要选我，不然把你们负担加重些！”

马蹄沟区所属 5 个乡乡长均已去旧换新，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该区乡选能如此迅速完成，除广大人民对乡选有了认识和经验，及划分居民小组带来的方便外，还为区级干部的得力和抓紧时间的效果。本区划分 5 个乡，盐炭工人约占全区人口四分之一，其中三、四乡盐工最多，二乡炭工约有四百人，其余各乡均为贫农占多数。阶级成分的条件，也推动了乡选能顺利进行。如第三乡选举乡长时，镇上的破坏分子，都在暗中活动坏人当选，但由于水浇湾的盐工参议员多，结果选出了好人上台。三乡旧乡长杨某，对工作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故意拖延给予他的任务，如去年的公粮，今年的公盐代金、修桥款，他都没有如数完成，实行抗上瞒下的办法，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为人品性很坏，对人滑头滑脑、嫖破鞋等，所以在群众中除少数坏分子外，杨某毫无威信。新乡长栾正才，虽年轻工作经验少，但能积极工作，愿为本乡人民服务，群众就选上了他。其余各乡旧任乡长，都对乡长的职责产生疲劳消极怠工的现象，人民因此也感不满，所以这次在极迅速的时间里，认真地重选了好人上台。

双湖峪区第四乡有 1630 人，人民在这次乡选中，对民主政治有正确认识，情绪很好，他们说：“即使误工也要去选举，选了好人可以替咱们办一年事。”他们觉得选乡参议

员很重要，选了好参议员，才能选出好政府委员和乡长，所以不能马虎。乡选委员苏逢桂老先生，他是边区参议员，对乡选工作最积极，他向群众鼓吹民主政治的好处，下雨天他还挨门挨户地进行居民登记，又努力号召妇女参加选举，他说：“今天男女平等了，女人家同样有权选别人，别人也可以选女人。”经苏老的号召，四乡妇女参选的特别多。

在开参议会时，议员们代表人民的意见，提了以下几个提案：（一）请政府调查租佃关系，过去本乡对政府的减租法令没有认真执行，今后要严格实现合理的租佃关系。（二）请政府具体调查本乡灾情，做到今年的负担要公平。因本乡上半个乡有拐沟，川面窄，多山地，大水时没受灾，而下半个乡因川面宽，多川地和园地、盐地，大水时都被冲毁。（三）炭工议员提，现在盐价涨了（每驮七十元），公家买炭，不能照旧价二十元一驮（旧价私人买一驮三十五元）。（四）乡政府要设立办公处。（五）本乡今年要办两个冬学。（六）区上设立一个保管会，专门负责军队借物借粮的事，因过去区上工作人员经常调动，军队向老百姓借的东西无人管理归还或保管，以至老百姓受到损失。

1944年秋，再次进行乡政选举。以乡为单位划分选区，各行政村也召开了村民大会，甚至有的自然村也召开村民会议。由行政村主任向村民大会报告工作，群众在会上当即选举乡参议员和自然村村长。

57个乡都召开了参议会，选举参议员。各乡都做了工作报告，报告内容有行政状况、民事调解、各种账项、各种动员数字等，有的由乡长报告，也有的由乡长、指导员、文书分别做报告。还有人民自动给议会送礼物的。马蹄沟区还召

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双湖峪区市镇乡的议会经过：

召集5个乡政府委员，5个村行政主任，参议员（实有29名，到会20名）开了参议会。县上有黑科长，区上有田书记、王区长，乡上有运输队长、基于自卫军连长（即农会主任）、合作社主任等列席。乡长和指导员分工报告，账项由指导员报告，乡长报告行政工作。在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1. 乡上的机关生产未作模范；2. 未有详细检查，深入群众不够，解决问题不迅速。田书记还宣布参议员可以重新选举，不称职的可以不要。乡参议员是重新选举出来的，有3个落选，换了另3个。乡长没有选举。

大家还提了一些意见，其中有：1. 政府过去借的东西太多，还有不还现象，以后借东西要打条据，并保证归还。2. 队伍借的房子太多，把街面开了磨坊，不合适。3. 从2月起，共动员了800多个人工，150多个畜工，动员人畜力实在太多。4. 要求大车队走街外，以利打扫卫生。5. 要求多成立冬学。批评乡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太迟缓了。

大家对这次会议很满意，建议以后多开这样的会议。

县上召开县委会和区委书记区长联席会议，专门布置第一届参议会，讨论决定参议员、参议长、副参议长人选，扩大宣传，收集各种意见和提案，收集有关原来各县的议员名单。除石窑沟区是新选的外，其他区皆是从原各县参议员中选择的。

1944年9月1日至8日，召开了子洲县首届参议会。应到正式代表174名（其中聘请45名），候补代表6名；实到正式代表137名（其中聘请44名），候补代表6名，其中

共产党员 48 名，国民党员 15 名，其他非党人士 80 名。参议员资格审查委员吴亮明、冯文江、马彦华、黑长荣、姬野黎，提案审查委员冯启明、王都、高树林、裴仰斗、张书翰、白清江、姬野黎、续甫昌、董玉华。

会议主要议题：听取县长谢怀德作的《二年来的行政工作报告》；讨论通过自力更生大生产、减租、减息、保卫边区、支援前线等方面工作的决议，并解答议员提出的 72 件提案，共计经济建设类提案 28 件，其中有继续改良农作法、三年内兴修水利 3000 亩、植棉 6 万亩、四五年内推广种蓝 1000 亩、每年植树 10400 株、提倡种甜高粱自制白糖、统一度量衡以利发展商业、各村挖修水井、开掘炭窑、大量储藏青草、购买轧花机、设立瓷窑、多种苜蓿、发展市镇乡村窑房建设、说服盐主补充工具以利盐业生产等。文化教育类提案 13 件，其中有扫除文盲、推广民办学校、开展冬学运动、禁止妇女缠足、破除迷信、开展医卫工作等。民政司法治安类提案 23 件，有彻底执行减租交租、加强民主作风、加强拥军优属、实行公粮累进税、改进司法工作、加强自卫军训练等。大会讨论了裴家湾区一乡经济建设计划及双湖峪区市镇乡文化建设计划，通过了政府工作决议、民国三十四年（1945）概算决议、推广文化教育建设的决议、关于裴家湾区一乡经济建设计划的决议及致毛主席暨中共中央电、致朱总司令暨八路军、新四军电、致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电、致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电、致全国电、致榆林邓（宝珊）总司令、高（双成）军长电。并发出大会宣言，指出今后的方向是：进一步加紧生产，做到全面自给，提高文化，扫除文盲，发动拥军运动，建立抗属家务，整训自卫军，肃清政治土匪，发展合作事业，巩固

民主建设，为完成战胜敌人、解放民族的任务而奋斗到底。选举产生县参议会常驻议员白清江、拓生荣、刘万和、张书翰、张道源、蔡自举、曹天昌、霍仲奇、续甫昌 9 名（其中共产党员 3 名），参议长白清江，副参议长拓生荣（清末秀才），秘书长向叔保、副秘书长黑长荣；政府委员谢怀德、裴仰斗、黑长荣、鲍亮声、冯文江、马彦华、赵加珍、高树林、霍云台、刘清选、王鸿宇、蔡秉章（其中共产党员 4 名），谢怀德为县长。参议会正副议长、常驻参议员、县长、政府委员分别宣读了誓词。其中县长的誓词是：本人承选为子洲县县长，荷负重托，自当本新民主主义之精神，彻底实现参议会所议之各项，为发展人民生产，提高人民文化，巩固新社会秩序，以期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而努力，唯念才力不足，恐负重托，深愿我全体人民及参议会诸参议员，时加督策，俾有进益，此誓！

第三章 各项工作

第一节 清剿土匪 巩固政权

子洲县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也是绥德警备区的前线之一。西有石湾、麒麟沟，北有吴家园子、张家圪、油房头、水地湾，西北有响水、永丰山、韩岔、武家坡，国民党顽固派在此建立了不少据点，日谋夜算企图袭击绥德警备区和新建的子洲县，经常派遣部队到周复区、石窑沟、瓜园则湾区等地袭击、骚扰、抢劫。建县两年来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当地驻防生产自卫队 30 余次，掠夺老百姓财物折价 1000 万法币以上。并威胁老百姓送柴驮水，送菜摊粮，勒索群众。就以石窑沟区计，抢去法币 298480 元，银圆两块，银人（老百姓娃娃的玩具）1 个，米 40 石 8 斗，麦子 10 石 5 斗，荞麦 14 石 5 斗，白面 442 斤，杂面 1 斗，挂面 30 斤，豆面 8 升，料 9 斗，糜子 2 斗，瓜子 1 斗，洋芋 4240 斤，白菜 2281 斤，瓜 21 个，干瓜 1 大串，豆腐 70 斤，干红豆角 1 斤，鞋 15 双，鞋底 18 双，丝 2 斤半，麻 2 斤，绒毡两块，褥子两条，袍子两件，手帕 1 块，袄子两件，裙子 1 件，袜子两双，布衫两件，裤子 1 条，被子 4 块，黑市布 2 丈 2 尺，细软面子 1 块，瓷瓮 3 条，布袋 1 条，席子两块，铁锨两把，锅两口，水烟两封，纸烟 3 条，旱烟 1 斗，羊肉 13 斤，羊油 5 斤半，羊 5 只，猪 5 头，鸡蛋 88 个，油 4 斤，年馍馍两驮，酱 1 斤，草 90 斤。

顽固分子骚扰该区有 54 次，袭击边界生产驻防部队 10 次以上，拉走驴 20 余头，拉去韩岗保、常正国等 57 人，打了吕崇泰等 8 人，其中把吕崇泰拉到永丰山寨子，吊打得死去活来，还奸淫 13 岁的幼女。同时，在经济上予以封锁，不让 1 斤毛带到边区来。子洲的老百姓到横山、石湾办一点东西，一经查出，人被扣留，东西被没收，轻则被罚钱，重则被治罪。两年内就发动了两次大的进攻，子洲县人民政府组织自卫队还击粉碎了两次进攻。

除在军事上经常骚扰袭击以外，还派遣特务破坏设施或策动部队哗变，造谣生事，唯恐子洲不乱。1942 年秋冬，国民党特务唆使、组织马蹄沟管理处一班人哗变，还组织当地驻军一排人哗变，后被发现，被予以制止。还用“收复二区”的谣言，欺骗人民，恐吓老百姓，有 100 余名百姓外流。煽动老百姓不要种棉花，造谣不要迁移到南路，如果到南路，就被八路军抓去当了兵。

还组织政治土匪，到子洲境内抢劫扰乱。以 1942 年 5 至 12 月最烈。发现土匪活动 76 件，主要是李全兴、李生珍、高明先、鲁寿增、薛应九、薛明珠、折福随、慕如德、阎锡身、韩忠杰、朱永山、白玉山、刘海振、朱老二、高奔子、南士雄、侯应口、黑老高等为匪首十八股土匪，约有 200 余名。主要有两股，即所谓的“十三支队与十四支队”，这些土匪持有枪支 40 余支，都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直接受国民党特务的指挥，四处抢劫，除抢财物外，还威吓、拷打群众。周复区在 1944 年 7 月即被抢 9 次，群众惧怕土匪报复，不敢向政府和驻军报告。

这些政治土匪中，以籍贯是马蹄沟的朱老二和朱永山为

最。他们除了在子洲边境骚扰，还在边区其他地方活动。新编《清涧县志·大事记》记载，1942年9至12月，匪首朱永山和朱老二等持枪百支，在店则沟、定仙塬一带进行政治性抢劫。薛明九、高明山等也活动在这一带。阎锡年、聂振中、李全信等及其匪部活动于涧峪岔、南沟岔、老君殿、马蹄沟、冯家塬、龙耳岩、瓜园则湾等地。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和土匪的骚扰，三五九旅于1942年4月，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

1942年12月13日及28日，独一旅旅长王尚荣，两次颁布剿匪命令。在召开边区高干会议期间，独一旅又专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进一步剿匪部署。以军事围剿与地方清乡互相配合，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积极发动群众，剿抚兼施，军民协力，肃清土匪。新生子的子洲县人民政府协同当地驻军，对土匪进行了坚决的自卫还击和清剿，对窝藏土匪的窝主进行处罚。

独一旅击毙匪首及惯匪14名，降匪18名，俘匪30余名。其中朱老二被我政府擒获，予以镇压。剿灭钟常文等12名土匪，用政治攻势，使其分化互相打死的有薛明珠、折福随、鲁寿增、高奔子等，俘获朱永山、李生珍等26人，缴获长枪13支，手枪2支，子弹546发，通过政治教育争取张步英等6人投降，缴获长短枪4支，擒获土匪侦探17人，破获窝主24名。

1944年1月21日《解放日报》载：

《绥西自卫军捕获惯匪》（本报绥西讯）边区惯匪朱永山及其匪帮在反动势力指使下，对我绥西人民不断进行烧杀抢掠，先后抢掠边区人民资财无数，残害人命多案，人民莫不恨之入骨。去年12月25日，朱永山又带领土匪多名，到

我周复区边境抢掠，当地自卫军即自动将该匪包围，并当场将朱永山及其匪伙一名捕获，送往政府法办。政府因该地自卫军忠勇可嘉，将予以奖励。（杜映）

朱永山被我人民政府抓获后，恰好鲁艺的文艺工作者到子洲采风，贺敬之采访了他，写出歌剧《惯匪周子山》。子洲县拟判其死刑，报绥德公安处，处长布鲁认为此人可以利用，把他释放了。

1943年2月下旬至3月底，绥西办事处还组织开展了清乡工作，成立7人清乡委员会，由顿星云（驻绥西部队团长）任主任，马义任副主任（办事处主任），曾祥煌（驻绥西部队政委）、白清江（县委书记）、曹华山、裴仰斗、吴亮明任委员。除双湖峪区未进行外，各区都进行了这项工作。清乡有三大任务：其一，整理民兵；其二，清查户口；其三，建立基于自卫军。查出暗杀队6人，哥老会367人，厉勤队153人，情报组13人，铲共队1人，国民党员214人，土匪30人，窝主24人，二流子139人，抽大烟的352人，卖大烟的19人，破鞋46人，还建立了群众性的锄奸组织，各乡有锄奸主任和锄奸小组，各区建立哨站，查处逃兵和嫌疑人员400余名。

人民政府和驻军采取有力措施，清剿土匪，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有所收敛，但时有骚扰。1945年3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的《顽军“保安”十一团一部侵入子洲县境抢劫》就是一个例子：驻杨凤山村之顽军“保安”十一团，于一月八日派出二十余人，侵入子洲石窑区七乡长毛塬，抢劫人民，行同土匪，在该村吃白面二十余斤，强索麦子三升、荞麦三斗、南瓜三十个，捉去了

老百姓的鸡，抢去许多羊毛线子，临走还要八百斤菜，四石牲口料。又在四乡高庙梁村，抢走许多东西，打伤村民曹子高，使其至今不能起床。该区老百姓对这种残民以迫、抢劫毒打的行为，倍感愤恨。

第二节 减租减息

子洲大部分地区在土地革命中没有进行土地分配，个别村子搞过土地分配，也没有坚持下去，大都被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回去。

子洲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地主、富农拥有大部分土地，贫苦农民占有土地很少。1942年2月，西川双湖峪九乡占有土地如下表：

双湖峪九乡土地占有情况表
(1942年2月)

成分	地主	富农	富裕中农	中农	贫农	雇工	其他	总计
户数	7	1	11	49	108	32	12	220
%	3.2	0.5	5	22.2	49.1	14.5	5.5	100
土地 (垧)	872	58	298	772	563	42	32	2637
%	33	2.2	11.3	29.3	21.4	1.6	1.2	100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垧)	125	58	27	16	5	1	3	12

(摘自《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36页)

占总户数 3.7% 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量的 35.2%；占总户数 27% 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占有土地总量的 40.6%；占总户数 63.6% 的贫农、雇农占有土地总量 23%。地主平均每户占有土地 125 垧，富农每户 58 垧，贫农每户仅有 5 垧，雇农每户只有 1 垧。

南川老君殿区四乡祁家山、佛堂崖、温家梁、兰家山等 28 个村子，共 261 户，其中地主 4 户，占有土地 1400 垧，占全部土地的 22.4%；富农 5 户，占有土地 725 垧，占全部土地的 11.6%；中农 36 户，占有土地 2196 垧，占全部土地的 35.1%；贫农 136 户，占有土地 2025 垧，占全部土地的 32.4%；佃农 80 户，没有土地。9 户地主富农，就占有了全部土地三分之一弱，同时中农 36 户，占有全部土地三分之一强，贫农、佃农 216 户，只占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生活穷苦是很明显的。据调查，二分之一以上的佃农的生活，是极其困难的，除了 80 家佃农之外。136 户贫农当中，很多也都租种地主的土地。

贫农、雇农要维持生活，就必须向地主租种土地，或给地主扛长工为生。

子洲流行的土地租佃形式有三种，即租种、伙种、安庄稼。

租种，是本境的主要租佃方式。佃户向地主议定租种某段土地，按垧（或亩）议定租子（一般以粮食计算，也有用钱缴纳的），取得土地使用权，不管年头丰歉，佃户都应当缴纳租子。平均每垧大约出租粗粮 2 斗多。上地多为 3 斗，中地多为 2 斗半，下地多为 2 斗。陕北跟垧打石，即每垧产粮 1 石，就是好年头，也就是租子占收获的 20—30%，歉收年头，租子要占到 40—50%。租地的议定多在秋收之后，立春之前。

有“打春不论地”之谚语。粮食或谷豆对搭，或高粱、谷子、豆子三色缴纳，秋收交租。地主可以随时倒换租户，不受限制。

伙种，是一方有土地，另一方有劳力，双方议定共同种植某块土地。一方出地，一方出力，双方平分收获。有时，地主出牲畜，农户要给予一定草料；有的由地主出一半或全部籽种，秋收时农户予以归还；谁上粪，谁收柴草。双方均不上粪，柴草平分。伙种一般在中农和贫农之间进行。

安庄稼，地主不但租给农民土地，而且要供给牲畜、肥料、工具等，借给农民粮食、籽种、窑洞等，议定秋收后互相分配的成数。一般是粮食对半分，柴草归地主。伙子要给地主帮工，即做不少无偿劳动，比如，担水、扫院、喂猪、打狗、种瓜、种菜、请客等。据双湖峪西庄沟一伙子王仲谦调查，各种帮工每月大约有5个工。俗云，伙子不偷，庄稼不收。地主必须随时监视伙子，庄稼结穗时要时常上山观察收成，防止伙子的隐瞒行为。

1937年11月，八路军接防绥德警备区，发布“土地维持现状”的布告。同时，以警备区司令部、抗敌后援会和何绍南的绥德专署会衔颁布了减租减息的布告，但因双方摩擦不断，减租减息没有得到执行。

民国二十九年（1940）7月，警备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绥德分区颁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条例对减租比例进行规定：丰年按标准租额减去25%，即一石给七斗五升；平年按标准租额减去40%，即一石给六斗；歉年按标准租额减去55%，即一石给四斗五升。歉年普通耕地收成在三斗以下免租；土地特别贫瘠之区虽然丰年每垧收成亦超不过三斗者，其免租标准视各地具体情况另行规定；伙种土地按收获量分

配之，除籽种外，地主得四成，佃户得六成，如籽种牛料由地主出者（俗称安伙），则地主得四成五，佃户得五成五。禁止主佃双方以任何约文规定押租或预租；佃户应按本条例规定之数交租；地主不得无故收回租地或更换租户；凡典卖土地，其买主所买土地如非自种，不得无故更换租户。借贷金钱者，其利率不超过月息一分五厘；借粮食者年息不超过十分之三。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指出：“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执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的义务，不得抗不交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的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作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时，必须照顾农民的生活。”“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的25%（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不论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关于债务与减息规定：“减息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

减租减息是关系到地主和农民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直接利害关系的一项大家皆十分关注的政策，推行该项政策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真正要贯彻实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子洲的减租减息，起初仅是宣传动员，真正实施是从

1942年秋天开始的。绥西办事处出台了《对于回赎典产债务中几个问题处理办法草案》《为彻底执行边府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及补充指示》。

当时地主和租佃户对政策不了解，可以说，大部分未能彻底执行减租交租的两方面要求。许多地主感到减租不可避免，便想方设法对抗或抵制。他们或者将外村的土地出卖，换买本村的近地，或者把地租改成伙种、活租、安庄稼，用改变租佃形式的办法，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有的还威胁佃户，如果透露实情，便要撤租、换佃，就是来年抽地，也不让对方继续耕种。佃户们怕以后种不成地，在表面上说按照政策四六分租，实际上仍对半分租，有的还把已分到的粮食，又偷偷退还给地主。比如双湖峪区四乡霍家渠，地主霍某弟兄五家，1942年收租子时都是与伙家对分，减租条例传到此地后，乡长与行政村主任，即向他们解释，区政府检查工作的同志，也召集主佃双方座谈，详加说服，彼此口头答应遵照政府法令退租，但实际上并未实行，反坚持以后仍要对半分，后经群众大会予以批评，方将多收的粮食退回。一乡陈家瓜地主李某，亦不按条例收租，反而向伙子说：“现在对半分了，如公家查出，再按法令重分。”政府查询，李某始终坚称，已按规定收租，并言查出愿受处分。同时又暗告其伙子，不得实说。后经多方调查，始明真相。检委会为保证减租交租政策彻底实行，一致通过，除将其应退之数追出外，一并决罚粮四斗五升。二乡四旗里村地主徐某，向伙子恐吓说：“我早就想抽地，你们还要减租吗？”另外，对个别落后租户则多给一二升，施以小惠，进行欺骗。而对政府则说：“我已按四六减租了！”检委会查出后，公布其违

法行为，于是各佃户乃聚集徐宅要求退粮，并退还因减租而抽回之地。徐某当即受到群众严厉批评。从此，有不少地主自动传话给佃户，愿意将多收的粮食退出。驼耳区政府深入宣传，使人民深切认识减租交租之意义，并保证农民不会因减租而失去土地。各乡村组织检查委员会，均有热心公道之士绅参加，负责调查与劝解主佃双方的纠纷，帮助政府检查减租法令的执行，监督地主不得无故收回租地或转租等情况，同时检查遭受水灾虫害之区，合理调减，以便征缴公粮。

绥西县委和办事处集中精力，首先在双湖峪、瓜园则湾、苗家坪三区进行减租减息，然后以主要地区之成绩影响全县，以至收到很好效果。公正地主则表示：“今年政府规定四六减租，减的并不重，实际上今年收成不好。”一般租佃户反映则认为“减租交租是好事，只要保证有地种”。马蹄沟的难民说：“减租又有地种，我们可以出公粮了。”又说：“得拥护公家，没有公家怎么能减租呢！”

在减租运动中，县委和办事处特提出个别开明地主给予表扬：如老君殿三乡地主文增强（是该乡青年主任），租出土地八十多垧，今年减租交租政策传达下来之后，他就向群众说：“谁多给我租子，不但我不要，而且还要向政府报告罚他。”苗镇二乡地主胡裕年（新选的乡政府委员），他说：“咱们是解开道理的人，一定照政府条例行事。”同时，他又对租户们说：“如果你们要我把往年多交的租子退回也可以，我一定照退。”此外，如苗家坪区区长曹耀桂和该区一乡乡长李雨德，他们首先打先锋起模范作用，将多分粮食退还伙子，这个影响很大，群众都说：“区长乡长都这样做了，咱们老百姓也应该依法行事。”

1943年，绥西办事处组织农会52个，农村组织小组，有会员2593个，依靠群众的力量，实行减租减息。在政府和农会的支持下，佃户和地主重新立定租约，按照减租法令规定交租额度。双湖峪、瓜园则湾、周复、苗家坪、石窑沟5区就换约4385张，双湖峪、周复、苗家坪、石窑沟4区废除旧约租86石5升。1943年减租，马蹄沟、老君殿、裴家湾、驼耳巷、石窑沟5区减去807石6斗5升，双湖峪、苗家坪、石窑沟、周复、裴家湾5区退旧租约156石9斗。

双湖峪市镇乡，在生产运动中，把减租保佃工作深入群众后，该乡佃农生产情绪特别高。1943年4月2日该乡佃农62人，由减佃会召集商讨开展生产运动，会上佃农们一致提出恢复农会组织，以便今后在政府法令的保护下，有组织地管理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事宜。当即在热烈情绪中，除一些二流子未参加外，其余的都一个个按上手印，报名加入农会为会员。选出乔廷银、王明亮二人为正副主任委员，及其他委员共七人，并讨论会员划分小组，展开组与组、户与户间的生产竞赛，并开展帮助政府发放贷款，继续吸收会员等工作，最后通过信条四项：（一）坚决服从农会纪律；（二）积极生产响应政府号召；（三）农会会员要作生产的模范；（四）农会会员不赌博，不吸洋烟，不做坏事。该乡自农会成立后，共计解决被地主撤佃之川地、山地共六十七垧三分，仍归由原佃户租种。

1943年10月26日上午，双湖峪区召开乡参议员以上行政人员大会，首先由姬副区长将专署指示逐条详加解释，后即进行讨论。参议员任生才（佃户）说：“有的活租地，已经按四六分了，应如何处理？”“如去年地主典出去的地，

怎样才能赎回来？如只能原价即可赎回，不按当时粮价计算，就把我们亏了，那地主比安庄稼还好，只要现卖上一点点粮食就够了。”“棉花地怎样分伙，今年种一垧棉花比种七八垧庄稼还好。”大家热情很高，纷纷提出问题。经过热烈讨论后，关于如何进行减租工作，大家一致决议：一、各议员须在两日内召开居民小组会传达讨论。二、今年的减租在场上分伙交租，一定要经过参议员当场作证。三、发动换契约，换约时要经乡长签字盖章。四、随时调查主佃双方交减情形，如发生了问题，即时解决，不得马虎。五、要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随时揭发他们的阴谋。六、因天灾（如雹灾、虫灾）及其他原因，致不能交租者，应呈报政府处理。

26日晚上，农会又召开了农会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农会主任乔廷银讲话后，姬副区长又解释了减租条例，经讨论后，大家决议：一、减租是对咱们自己有利的事情，在咱们每个小组中很快传达后，就要去做，咱们一百多个会员首先要执行政府的减租法令。二、要调查：1. 其他人是否减了租。2. 调查契约，发动换约运动，咱们从前吃了亏，今天要算账。3. 哪一个地主还对咱们佃户威吓多要粮食，哪一个佃户因怕地主而多交了粮食，对主佃双方不执行法令的，都要调查清楚。三、交租与分伙时，咱们要求政府一定要经过咱们小组长当场作证，不要打埋伏。四、向地主算账，要回咱们多交的粮食。五、咱们要三天汇报一次，五天开会一次，大家要团结，今年的减租咱们农会一定就能做好，还要防止那些坏分子的活动。

11月2日双湖峪区第一乡召开大会，讨论减租问题，到会者有参议员23人，租户63人，先由区乡干部详细解释减

租条例与执行办法，后即开始讨论，共计提出问题十一个，问题解决后，群众当场要求组织减租会，选出张万和为主任，崔崇富、任生海、张世勤、李俊清等为委员，并通过决议如下：一、一定要执行政府减租条例。二、行动一致，不能互相争夺租地。三、不遵守条约者，开除出会。11月3日二乡开会，以同样的方式成立了减租会，该会当即会同乡政府通过一个决议：一、行政人员与减租委员、组长配合起来进行减租工作。二、减租会也要建立分工与汇报检查制度。三、各种减租问题，减租会互相商讨解决。四、减租要和换约运动、防奸斗争等配合起来。

在实行减租的同时，要求佃户按时交租，过去不愿交租且拖欠之佃户，经减租后也交了租。

经过减租运动，租佃形式有了变化。

双湖峪区 1941 年定租 3054 垧，活租 1974 垧，伙种 157 垧，安种 192 垧。1942 年定租 2744 垧，活租 2105 垧，伙种 1435 垧，安种 173 垧。

苗家坪区 1941 年定租 2874 垧，活租 791 垧，伙种 738 垧，安种 1138 垧。1942 年定租 2898 垧，活租 748 垧，伙种 597 垧，安种 792 垧。

周复区 1941 年定租 3883 垧，活租 2039 垧，伙种 2698 垧，安种 1433 垧。1942 年定租 5450 垧，活租 3406 垧，伙种 1062 垧，安种 2823 垧。

老君殿区 1941 年定租 1754 垧，活租 886 垧，伙种 526 垧，安种 1543 垧。1942 年定租 1517 垧，活租 1206 垧，伙种 829 垧，安种 844 垧。

裴家湾区 1941 年定租 1815 垧，活租 1700 垧，伙种 721 垧，

安种 2845 垧。1942 年定租 2411 垧，活租 1854 垧，伙种 1916 垧，安种 233 垧。

可以看出，活租和伙种增加了，而定租与安种减少了。地主害怕减租利益减少，借口自己种的名义收回土地转活租的方式谋取较大的利益。

减租减息使租佃户获得利益，地主也收到应收的租息，社会安定，群众生活得到提高，负担也减轻了。苗家坪区第四乡景家沟村，在旧政权时代，每人每年平均负担米 2 斗 7 升，1943 年每人每年仅平均负担 3 升。有一个地主王斌文过去每年负担 1 石 5 斗米，1943 年只负担 4 斗米。

减租减息促使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减租减息后农民的收入增加，而地价却随地租下降而下跌，农民可以有余钱抽回部分典地、押地，也可以买地主的土地。有的地主也把资金投入工商业，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地富出卖土地的人较其他阶层的多，其原因是由于共产党的政策让地主富农感觉到拥有土地不合算。也有地富经济被削弱的原因。通过卖地、出典地主土地大量转入农民手中，不少贫农上升为中农。根据双湖峪区 1946 年 6 月调查，1941 年—1946 年 6 月，出卖土地者 173 户，其中，地主 53 户，富农 11 户，中农、贫农、雇农 109 户。共出卖土地 802.01 垧，地主卖了 547.3 垧，占 68.2%；富农卖地 68.5 垧，占 8.5%；中农、贫雇农卖地 186.21 垧，占 23.2%。吴家沟富农张文华，1940 年前 10 口人，窑 8 孔，驴 2 头，羊 25 只，川地 25 垧（折合山地 75 垧），山地 67.5 垧，合计 142.5 垧，每人平均 14.25 垧地。此后共出卖山地 35.75 垧，余地 106.75 垧，人口增加为 15 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 7.1 垧。张文华出卖的土地，

大部分由中农、贫农、雇农买走。苗家坪区艾家圪崂 42 户，229 人，富农 1 户 5 人，旧中农 8 户 44 人，新中农 9 户 63 人，1940 年前，贫农所有土地 175 垧，每人平均 0.96 垧，减租的 6 年中，买入土地 31 垧（其中买入地富的 18 垧），典入土地 93 垧（其中典入地富的 20.5 垧），以典地折半自地来算，贫农增地 77.5 垧，合计 252 垧，增加 43.3%，每人平均 1.4 垧，增加 0.44 垧。中农原有土地 230 垧，增加 7 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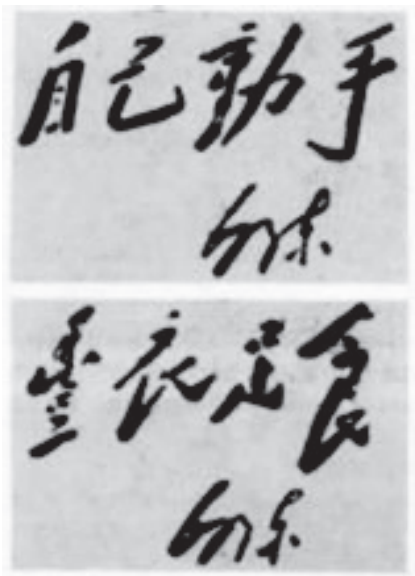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大生产运动

1941 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极为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 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绥西办事处成立之时，正是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进行之时。县委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成绩卓著。

在农业上以改进种植方法、兴修水利、组织劳力、订农户计划、组织变工队、改造



毛泽东给大生产运动题词

二流子等为中心开展工作。

订农户计划。订农户计划是1943年开始的。这年有4799户农户订了计划。占总户数的18.6%。1944年，提倡家家户户订计划，共订了17373户，占总户数的89.5%。1945年为典型化阶段，自愿而切合实际，不同家庭订不同计划。

其作用在于帮助群众从散漫生产方式走向有计划的生产，提高他们的生产信心，达到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增加生产的目的。比如，双湖峪区一家农户张统元，订了农户计划以后，家庭作了新的分工，以前他弟弟拦羊，他和他父亲种地。订了计划后增加了锄草任务，就改为他父亲拦羊，他和弟弟种地。家中的妇女纺织也有了明确分工。白天母亲做饭带娃，两个媳妇纺花归家庭公用，在晚饭后纺的线归自己私用。他母亲喂三斗蚕作为私人生产。这样家庭生产井井有条，效率显著提高，效益也自然提高了。

组织变工队。绥西办事处成立时就号召农民组织变工队，但1942年农民对此认识还有差距，因此没有接受。1943年，才有了大的进步。这年组织941个变工小组，有5746人参加，占总劳动力的24%，但抓得不紧，有的地方不经常开展，有的地方有名无实，还只是一种自发的组织。1944年接受了上年的教训，抓紧组织变工队，1944年有劳力24406个，组织了2204个组，参加劳力12656个，52%的劳力参加变工。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上也得到提高，有短期变工队和长年合作变工队等类型，克服了有名无实的“空架子”现象。1945年人力有所下降，23609个劳力，组织了互助组800个，参加劳力4556个。

变工队有了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双湖峪区刘家沟的李仲

英变工队，就搞得很好。这个村共有5户人家，7个劳力都参加了变工队。有驴5头，自己的地47垧，租种地96垧半，从春季砍谷茬时就组织变工队，他们5天砍了33垧谷茬，一个月送粪7000多袋。种夏田时分为两个小组，共用驴工18个，人工58个。如果不变工，得驴工29个，人工87个。周复区梁家沟的党生华、苗玉昌的变工队，共有39个劳动力，组织了常年变工队。1943年，没有变工，种地750垧，地只锄两三次，还忙不过来，1944年，种地827垧，还开荒地35垧，地锄了4次。周复区徐家沟的农业合作社式的变工队，也有特色。这个变工队有3户6个劳动力（其中两个雇工）有6头驴，151垧地，从种到收，一起劳动，抽出两个人开粉坊喂猪4头，还节省下劳力伙运盐赚钱缴公粮，同时开荒地4垧，溜崖畔13垧，掏坡地17垧。

老君殿区，平均每个劳动力有24垧地，老百姓过去有变工的习惯，大多是伙喂牛、驴。例如二乡三行政村42户中，变工的有25户。喂驴的30户中，有17户是伙喂的；喂牛的27户中，有26户是伙喂的。夏耘中，在党政领导下，变工队大大发展了，全区组织了124个变工队，8个扎工队，参加的劳动力共972名。变工作得好，原因如下：一、有的农户，怕和别人变工后没有好东西拿出来吃，故党政领导提出了“变工不会增加吃饭人”“变工不管吃喝好坏”的口号。同时，农贷款的发放，帮助了贫苦农民更积极参加变工队。二、有些劳动好的人，不愿意和劳动差的人一起变工，故又发动他们按自愿原则来组织。三、有人因为家里只有自己一个劳动力，又要管家务，怕变了工家事顾不上，区政府便动员男女老幼参加家务劳动，解决这个困难。四、各家的土地都是东

一块，西一块，一个人劳动来往走路误工大，人多了又不够做，因此就以三人到四人为一小组，组织小型变工队。在各县，区政府按行政村组织了检查委员会，由各自然村派代表参加，检查各村变工队竞赛的情形。

瓜园则湾区普遍组织变工队，组织了116个变工队，参加者有1011名。在变工队中发动竞赛运动，队与队、村与村之间互相竞赛。

最有名的是苗家坪区董家湾村王丕林的变工队。董家湾变工队，是子洲县长期固定变工的范例。1944年参加变工的23户，1945年增至25户。该村共住61户，前庄40户中，有37户从事经商、小手工业和揽工。后庄住21户，绝大部分从事农业，有16户参加了长期变工队，他们共有地214垧，参加长期变工的共有地188垧，其他未参加长期变工的5户，共有地26垧半，伙出20垧半，临时活变6垧，可以说后庄地除伙出外，已百分之百的变工耕种了。妇女们也变工做饭，节省下工夫纺线织布，有的三天可纺一斤线。

这个变工队在群众中有了根深蒂固的基础，成为该村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节省的工（1945年即省工830个）用于改良农作和从事扎工、拉炭，致使农业产量和副业都有增加。如变工队员李合义，1943年不变工时，12垧山地，雇半个工，除去吃粮和工资米3石，打粗粮仅1石6斗，洋芋3袋。1944年，参加了变工队，同样的地没有雇人，打粗粮4石，洋芋8袋，收净花3斤半，另外自己打短工挣米1石，还拉了半年烧炭。

该队每年生产都有中心计划，队员们为着这个计划勤勉地劳作。1944年的中心是改良农作和扎工。共计全队打水坝

比不变工时，增加三分之二，掏老荒崖地六七垧。锄草一般都锄了四次（过去大半锄二次），此外秋翻地 19 垧。扎工时每人挣了 4 斗米。1945 年，中心计划则是增加棉地、改良作务。共计增种棉花 16 垧，锄七八次（较 1944 年多一半），打卡七八次（较 1944 年多打卡六次），耕地亦较 1944 年多一次。故收获量每垧平均 40 斤，较 1944 年增收一半。积肥方面 1945 年每家掏了一个厕所，做一小窖利用雨水、泥水和柴草沤粪，故每垧地比 1944 年增加了一布袋粪，秋翻川地 24 垧，比 1944 年多翻 5 垧。1944 年没掏谷茬，虫蛆厉害。1945 年，90 垧谷茬全部掏完烧光。此外，修桥挣工资米 2 石 9 斗，该桥原计划 1200 个工，变工队则以 600 个工完成了，队员们一天背石头最高纪录达 39 回，非队员则只背 10 回，相差甚远。变工队耕作法一年比一年细致，产量（如棉花）亦随之增加。

强有力的领导和合理计工法是这个变工队巩固与扩大的主要原因。行政主任王丕林，年过花甲，但他三年来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领导着这个变工队。在他的筹划下，该队组织形式与计工办法简单合理，很受队员们欢迎。他们把全队分为三个班，除锄草时集中外，平常皆以班为单位做活，各班设一班长，其职责在于调解纠纷、召集开会、指挥作息。开会时间一般规定三天一次，农忙时则一天一次，但不专门召集，而是在吃饭时商谈，这样，既不误工，又不疲劳。该队人数很多，劳力强弱，作务好坏，地段多少，距离远近，均有差异。故规定以一（工）顶一（工），二顶一，三顶一等折工办法，解决劳力强弱问题，作务坏的，和干部一起做活，帮助他改进。地少的人由地多欠工的人还工或付工资，或把地少的人完全抽出让他出外揽工，将来回来再给变工队还工

或付工资。石匠、柳匠等有活儿就出去做，回来后用本身手艺给队员还工，以一工顶二工计算。关于地的远近好坏都是一天算一天工，不因地远地坏做活少而少计工。为了保证生产计划胜利完成，队员们自愿订了6条劳动纪律，共同遵守。

变工队组织起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队员中曾经发生过很多问题，行政主任王丕林及时予以合理解决，变工队方告巩固。变工队开始时，有些队员在计工上有平均观念，不愿照顾老弱队员，王丕林便耐心说服。例如队员李封功是个58岁的老汉，他是变工队长的叔父，大家嫌他劳力弱不能算个全劳动，可是又不好意思在队长面前说。王丕林便向大家解释：“他人老了，日月不好，又没儿女，又是自己庄里人。即使他不出劳力，也应该帮助他，再说队长的劳力比咱们队里哪个也强，从他的份上，也能匀过去。”经这样劝解了几次，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了。队员们的生产技术有好有坏，如何帮助坏的提高技术，应该是变工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可是有些队员不愿意帮助他人。例如队员王振国是个近视眼，作务技术不好，特别是锄草时常常把应留苗子砍掉，大家都责怪他。王丕林便分配他和队长一起做活，由队长帮助指导，锄不净的帮他锄净，后来他的技术提高了，成了一个好劳力。

在折工问题上，也曾发生过问题。如队员王润生，前年17岁，两天顶一工，他不满意，吊儿郎当，其他队员们都说他。王丕林便找他谈，劝他好好劳动。这样他不吊儿郎当了。夏天众人便升他一天半顶一工，到秋里，有一天他不言不语地闷在家里了，王丕林摸不着头脑，便到乡上和干部去研究，估计他对计工有意见，于是王丕林便叫他来开会，叫大家讨论他能不能一工顶一工，大家都说他背麦子和大家一样，腿

把子勤快，苦重的活儿也不偷懒，能够一工顶一工。王丕林再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笑着说：“没啥了！”

王丕林除注意解决变工队本身问题外，还特别注意解决每个队员的切身困难。例如队员王治国年纪很大了，娶不起老婆，有钱就花掉，王丕林便在前年冬天帮他说定了一个，还给他借了一斤麻油几斗麦子，把老婆引过门。去年王治国又不想变了，想一个人出去“畅快畅快”，王丕林便到他家去对他说：“现在你是成家立业的人了，总要把家业往好里闹，出门胡混有什么出路？”说得王治国一句话也回答不了，从此又好好变工了。

弟兄们不和气的，参加变工队后，经王丕林和队员们的劝说，也亲密起来了。如李冲贵和李冲富是亲弟兄，因分家时争夺一块川地曾经吵嘴打架，经王丕林调解罢休，前年哥哥李冲贵自愿参加了变工队，王丕林便问弟弟李冲富是否参加，李冲富说：“不在一起做活还要打架，在一起做活更要打架。”王丕林便保证不会发生此事。后来弟弟参加了变工队，王便把他们编在一个班，可是他们做活时不愿碰在一起，吃饭时，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王丕林看见这种情形便找弟兄俩劝说，或在会上由大家劝说，因此三年来弟兄俩不曾打过架，前年给哥哥收麦时，弟弟背的比别人多，哥哥很高兴。王丕林拍着他的肩膀说：“到底是亲兄弟嘛！”变工队就是从这些纠纷的解决中成长的。王丕林就是如此细致地照顾队员的利益，如此耐心地说服队员，使变工队真正做到了团结互助，发展生产。

还出现了瓜园区艾家畔变工队、周家崓区梁家沟变工队等典型。

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人对那些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的一种称呼。这种人，虽然尚不是流氓，但发展下去，即是流氓，或者是流氓的候补队员。这种人闲来无事，或撞庄骂舍，或说舌头盖簸箕，或抽鸦片赌博，有时也小偷小摸，群众对这种人非常厌恶。毛泽东提出要改造二流子。他说：“关于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此事在过去数年已有显著成绩，各县在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后，二流子人数大大减少了。但是一切尚有二流子的地方，必须在1943年用说服与强制两种方法全部动员他们加入生产战线。延安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塞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

据1944年统计，子洲县改造二流子情况如下表：

无业游民	小偷	游手好闲人	巫神	阴阳	烟民	娼妓	二流子
已改造	11	36	33	7	277 (女8)	12	男996 女71
未改造	5	32	10 (女1)	6	20 (女5)	16	—

对二流子，用说服教育的办法进行改造，特别是让他们参加变工队，在集体劳动中对他们予以改造。《解放日报》1945年6月29日刊登的《子洲苗区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中，可见一斑：

苗区五乡干部，对改造二流子颇有成绩。其经验为：

（一）周家圪崂杜某，起初乡干部把他“训”了一顿，给订了生产计划，杜某在背后对人说：“我生来就这样，老

人也把我没法，他们为啥训我，打不下粮又不饿着他们。”后来，乡干部感到单靠训一顿是不行的，便又慢慢地去劝他，替他打算过光景。杜某说：“过去你们来一回训一回，不管有人没人，我觉得太丢人，不愿意听你们的话，现在你们这样细心地帮助我，我很高兴，今后决心转变。”（二）徐家河张某，早年没了父母，没有好邻家帮助，是个年轻的二流子。乡政府帮他搬在张国祥院里住，由张国祥来帮助他，现在他种了八垧地，还揽了“一角”长工。（三）园子沟拓某，劳力不好没人雇他。拓如扬为了帮助他，让自己的儿子去打短工，雇拓某给自己做活。这样不但拓某转变了，拓某婆姨的生产也加紧了，两个月纺了三斤线，织了十三丈布。

1943年改造了285人，1944年改造了305人，二流子大大减少。

妇女纺织。过去，子洲境内妇女很少纺织。本境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家庭纺织业兴起。

1942年，有纺线妇女8130人，纺车8064辆，纺线28918斤；1943年，纺线妇女增加为9328人，纺车9100辆，纺线30369斤；1944年，纺线妇女增加到13174人，纺车11832辆。织妇1942年仅有2550人，织布大机有127部，小机2156部，织布4422匹；1943年发展为织妇3047人，大机241部，小机2451部，织布10736匹。1945年，纺妇增加到17359人，纺车15000余辆，截至7月，纺线147845斤。织妇5424人，织布大机近400部，小机2959部，截至7月织布214598丈。人均织布1丈8尺，解决了70%的穿衣问题。政府和合作社共同支持家庭纺织，发动人民种植棉花，解决原料，合作社放花换线，设立土布庄，收购土布，在搞得好的地方提倡重

视质量，刚开始的地方发展数量。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先进典型，双湖峪的安老婆，51岁，她组织了14个纺织小组，让153人参加了妇女纺织，并订了计划，教会100多个妇女纺线，自己纺线40斤，皆是头等。

种植棉花。1942年，种植169垧，1943年种植644垧。这年收成不错，1944年计划两万亩，而实际种了20756亩，1945年，计划种植3万亩，实际种植19914亩。政府鼓励种植，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第一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子洲虽无种植棉花的历史，但是仍可以种植棉花，大力宣传。第二解决了资本问题和棉籽问题。发放种植棉花贷款，光1943年就放了260700元。棉籽，1944年，由边区发一部分，政府到延川、清涧采购一部分。1945年主要是互相调剂。第三解决了技术问题，办种植棉花训练班，给予技术上的指导。第四解决了土地问题。

种植蓝。蓝是从山西引进的提取染料蓝靛的植物。1944年在双湖峪、四旗里、双庙湾、师家坪种植90亩。由于技术不过关，加之天灾，秋收后有6000余斤蓝靛，只卖出1000来斤，质量不好，效果不佳，农户赔本，再未推广。

养蚕缫丝。养蚕缫丝是本地的传统副业，政府发展养蚕户2928户，2年产茧36917升，产丝1697.5斤。

开荒。子洲是个地少人稠的地方，没有大片荒地，只有小块荒地、坟地和古庙地，可以开垦。1942年开荒348垧，1943年开荒761垧，1944年开荒3313垧。

精耕细作。政府为了增加产量，千方百计改进耕作方法，创造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砍谷茬，防止路虎牛牛等虫害。1944年砍了46060垧，

总谷地的 76% 的谷茬被砍斫了。

修水利，新修小块水地。1943 年修了 16 垧，1944 年修了 71.7 垧，1945 年修了 133 垧。1945 年各区动工修水利的已达 230 余处。其办法有如下四种：（一）变工修。如老君殿区张家坪有 18 垧半可修水地，由众多的变工队员修，让地主也参加变工队，修好后由大家合种，按出工多少，分种若干的地，愿还工或赚工资的由地主偿付。（二）伙修。地主的土地，由农民出工，修好后，由农民伙种，地主分收获物的一部分。如老君殿区二乡就采用此法。（三）地主雇人修自己种。如淮宁区 33 垧半水地，系由 22 户地主修的，每垧出 10 个土工和石工大修，各家按地摊算工资（由乡政府贷给小米 20 石）。（四）地主出租，修水地者有水地权 10 年，交 5 年旱地租，5 年水地租，苗区驼区就采取此办法。关于水道问题，凡经过水道之地，地户不得无故阻挠，如损失原地户的土地过大时，由修水利户出租或用拼地等办法解决之。

翻地，1944 年翻地 52946.4 垧，占总面积的近 20%。溜崖畔，1944 年溜崖畔 88215 垧，新增地 138.9 垧。拍畔，1944 年拍畔 36845 垧，新增地 54.5 垧。按壕种法，1944 年 71865 垧，占总面积的 25% 多。

施肥，川塌地能上粪的都上了粪，鼓励群众拾粪造肥。

还在农民群众中开展反对八大浪费活动：唱戏敬神、无事赶集、迷信用费、办事待客、胡嫖滥赌、浪吃浪喝、蒸酒熬糖、抽烟打逛。提倡艰苦奋斗，节省过日子。

同时，政府组织移民，两年共向南路（延安一带）移民 5323 人，其中劳力 3263 人，半劳力 178 人。

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农作物种植面积，1942年为306424亩，1944年达到364611.8亩。粮食产量当然也增加了，仅1943年就产粮274713.5石。畜牧方面，大牲畜1942年为10422头，1944年达到12802头。猪1942年有2982头，1944年达到8542头；羊，1942年49932只，1944年达到61965只。养蚕户，由1942年的865户发展到1944年的2950户。栽树，1942年栽105170株，1943年栽130442株，1944年栽208826株。

政府还鼓励农民打土窑。规定1孔土窑地基只出1斗米至1斗半米，有空闲地基，就可以让农民修建。因此，农民打土窑方便了，两年打了数千孔，群众居住条件有所改善。

盐业生产。子洲产盐地区主要集中在马蹄沟的十里盐湾。共有工人641人，其中完全以产盐为生的503人，以农业为主、产盐为辅的138人。全县共有盐井115个，自生滩一处。盐井因水内含盐质不同，分上、中、下、下下井四种，各种盐井产盐量也有差别。自新政权建立后，因工人生活改善，生产热忱乃日益提高，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推动，积极向前发展，这和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前比较起来，是大不相同的。民国二十九年以前，全年能产盐4900多石，每石平均以400斤计，合196万斤。新政权建立后，民国三十一年（1942）产盐量即达6069.9石，合242.796万斤；民国三十二年（1943）产盐6669.8石，合266.792万斤。两年来，产量增加了70万斤。

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盐税苛重。每4斗盐要出值1斗盐价的盐税，有时还不止此数，但在二十九年以后，每4斗盐还出不到1升盐价的盐税，同时盐价也提高了，以前

每斗盐换小米4升，现在每斗盐可换8升，甚至还有超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工人生活改善了，从前工人们在重重的剥削和压迫下，一方面饥寒交迫，另一方面又染上鸦片赌博等旧社会中的陋习，在这种情形之下，生产是没法提高的。自新政权建立后，工人们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下，实行了四六分盐制（工人六分、盐主四分），不仅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同时恶习也都逐渐改掉了，并且大家都已过着富裕的生活。如工人蔡自高，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揽工，每年工资不够自己花销，生活苦不可言。民国二十九年后他开了盐井，成了盐工，生活大为改善，一人劳动，已能维持三口人的生活。今年他熬盐21石，六四分盐，自己得盐12石6斗，能换小米9石6斗，除改善日常生活外，还能有存粮。现在工人们都说：“过去我们常没米吃，现在每天米粮充足，隔几天还要吃肉，而且还能有存粮。”在盐主方面，例如姜生枝有盐井一个，工人15人，民国二十九年全年产盐234石，以对半分计算，盐主能分盐117石，每个工人平均分得7石6斗2升。民国三十一年（1942）产盐259石3斗。在工人的热烈生产中，盐产量增至303石1斗，按六四分，每个工人平均分得12石1斗2升余，而盐主也可分盐121石2斗4升（较1940年多收4石以上），折合小米96石9斗9升2合。这样，对盐主、工人都有好处，因工人生活改善和生产情绪的提高，盐产量不断增加，盐主获利也就更多了。

1941年2月，时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命令驻扎在马蹄沟的三五九旅供给部煤盐生产管理处会同驻守在双湖峪的七一八团一起，在三皇峁一带打了盐井10口，以解决食盐供不应求的局面。

1944年全县有盐工799个，盐井117口。

煤炭生产。西川有不少煤窑，生产的煤供应周边各县。绥西办事处成立后，政府对炭窑的领导主要是抓紧工会工作，增加工人下井次数，开展劳动竞赛，并奖励劳动英雄。1942年有炭窑29个，炭工604人，平均每日出炭216000斤，全年产炭38880000斤；1943年，炭窑增加了两个，工人增至618人，平均每日产量242000斤，较1942年增加25100斤，产量为45657000斤，较1942年增产6777000斤；1944年，炭窑增加到36个，工人增加到772名，产量比1943年大大增加。这些炭窑也有八路军和政府合作开办的。其中，徐家沟煤矿，是1941年3月三五八旅与当地政府合建，1942年投产。洞子沟煤矿，是1943年七一五团筹建，军民共管，按股分红，有职工30多人，日产煤10吨。

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绥西炭工英雄蔡自举向延安县炭工提出竞赛。他在致延安县炭工的挑战书上说：“我是绥西马蹄沟炭工工会主任，我代表那里的全体炭工向你们提出明年全年的革命竞赛。”在这封信上，他并提出如下的条件：

一、在生产上：（1）保证全体工人每人每月下窑18次到20次（今年5月前普通是十一二次，5月后是十五六次），下窑的链子要不缺工，自己有事找人代替。（2）每次每人掏炭900斤到1300斤，炭块要大，石皮要剥净，掏多少把手当时都绞出来，窑里不能顶坑。（3）发动和组织每个窑口与每个链子都订计划，大家比赛，并提高掏炭技术。（4）卖炭要按照政府规定的价钱，不得高抬炭价。（5）组织工人的老婆参加妇纺，由合作社供给棉花，不让一个婆姨站在生产之外。

二、保卫边区和加强工会合作：（1）组织全体工人参加自卫军，每人有一件好武器。都学会掷手榴弹、埋地雷，保卫自己的矿场，每天在沟口轮班放哨，肃清破坏分子。（2）成立工人合作社，改善工人生活，合作社卖各种工人日用品，并帮助纺妇领买棉毛与推销成品。（3）提高工人政治认识，加强会议生活，每月初一、十五开会两次，讨论问题或读报，每期《群众报》都读给大家听。（4）掏一年炭要剩余半年的生活费。工人有问题，工会要随时解决，不使一位工人有消极情绪。（5）优抗拥军，给军队和抗属卖炭，减价百分之二十五。

办合作社。1940年，驼耳巷乡马守绪等3人在马蹄沟姜崖村开办驼耳巷群众合作社，入股资金300元。合作社是从1941年开始的，共成立4个合作社，有社员365人，股金6775537元。1942年元月，本县成立区联社，在双湖峪设门市1处，入股资金3900元。1943年又成立了4个合作社，社员已达11238名，股金17479539元。这些合作社大都是消费性的合作社，只有苗家坪合作社发展棉花纺织生产。合作社为综合服务机构。其业务有：买卖必需品、代农民销售农副产品、组织土特产品出口，同时组织运输力、组织妇女纺织、帮助小学教育、运输公盐、代收公益代金和公粮、代银行推销有奖储蓄、代政府收公粮、代收牲口税、安置公属及灾民、优待抗属等。合作社主要经营粗布、锅瓷、火柴、土碱、箩底、火药、麻纸、毛口袋、褡裢等。1944年2月，召开全县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检讨了以往的工作，决定合作社从单纯消费性机构转变为发展生产运输业务、扩大股金、整理社务、召开社员代表会议、健全经理监事会、按期分红

的机构。1944年7月，子洲县成立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县联社），为政企合一的经济实体，有干部职工10人，设1个门市部。合作社有了大的发展，社员增加为12190名，股金扩大为55378700元。在发放棉花、收购棉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子洲妇女纺织业迅速发展。半年来发放棉花8330斤，妇女赚工资133.26石米，成为群众的一大附加收入。双湖峪区合作社的中心工作即是运输，19头骆驼贩了两次盐就赚了20余万元，还组织了群众的28头牲口，领放棉花2709斤。8个合作社中，办得最好的是周家崓合作社，该社在去年3月成立，开始股金27万元，冬季总结有红利247.12万元，一年里组织了800个纺妇，800名社员。周家崓合作社办得好的原因：（一）主任刘正昌有威望。（二）人民自动入股。（三）合作社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物价比市价低，并能解决群众需要。（四）扶助农民小学生，从红利中取出2.4万元，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五）刘主任很虚心，每件事情都和大伙商讨，并帮助干部改造思想，从政治上团结干部，又实行了奖惩制度，工作人员都很高兴。（六）听取人民对合作社的意见。（七）合作社干部生活很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因此，政府予以奖励。

建立义仓。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政府提倡节约，尤其是设立义仓，防止灾荒。共建立义仓216所，集粗粮123石7斗2升，细粮39石4斗，干菜15479斤，小盐60石，炭6000斤，棉蓬籽、秕子、麸子、榆皮70余石，各种糠稗379石。

《解放日报》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

1945年6月28日：本县部分地区已开始义仓工作。苗区一乡已由原来的两处扩大到11处，以自然村为单位，共集

粮 20 石。五乡成立野菜义仓。周复区二乡组织义仓开荒队，由干部带头，于 6 月 4、5 日上山掏荒地 27 垧，赶种小日月糜谷，将来收获储义仓。周家崓镇商人讨论后，愿意从伙食上节省 20 石，分两季交义仓保管，以备荒年。苗区二乡提出“聚宝盆”办法，即妇女在家做饭时，都节省一把米放入一盆内储存。马区 600 多工人集会讨论增加生产和节省吃喝的办法。

1945 年 7 月 5 日：子洲县马蹄沟区满堂沟劳动英雄鲍亮声、碾盘沟劳动英雄蔡自举推动成立义仓。

1945 年 7 月 8 日：子洲增办义仓。……义仓也在各地增多，性质有二：一种是由各户捐入的义仓粮食、糠菜等，各村选出专人保管，荒年时救济贫穷，如周区 30 多个义仓，集粗粮 52 石，糠 18 石，9200 斤干菜，二乡义仓又集体开义田 26 垧。另一种由各户存粮或储存其他东西入义仓后，在平时以低利贷出，灾荒时无利借给穷人，而义仓存物所有权仍归各户。如马区十里盐湾工人就以此办法集了小盐 21 石 7 斗。拔野菜运动亦已普遍展开，可供食用野菜达 20 种，老君殿区于本月内拔了 22000 余斤，双湖峪区尚家沟男女 32 人，在三天内拔了 37 布袋，很多地方以野菜入义仓，有的现正在吃野菜，省下粮食作备荒用。

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 年产粮 274713.5 石，人均两石多（近 700 斤）。群众的负担也减轻了。有关方面做过景家沟村 1934 年和 1942 年的负担对比调查，可以看到群众的负担普遍减轻。其中地主减轻 54%，富农减轻 58%，中农减轻 67%，贫农减轻 83%，还有 4 户抗工属和 8 户雇农不负担。

负担减轻，耕三余一，群众生活理所当然得到改善。比如，毛家河村武占汉，革命以前，家庭很穷，曾到南路逃荒，原

有的15垧地被迫典出去。1941年回家后以租地为生，1942年抽回两垧地，站了两只羊。1943年收了6石1斗多粮食，除吃用4石6斗外，余1石5斗多，典了两垧地，羊增至9只，买了半头驴，男人种地，女人纺织，一家四口人，生活好多了。

盐工栾保成自父亲一代即为盐工，他也从17岁开始做盐工，一直做了10年。过去生活十分艰苦，因为没有土地，连住窑都是租借地主的。自从政府解决了这种封建剥削后，他每年可以生产约20石盐，即是说自己可以分到12石盐，能够获得8石4斗粮食（按平均每斗盐折7升米）。而且他能捎种庄稼（去年两垧半地即收获8斗稻黍、2斗红豆、七八袋洋芋）。栾保成全家3口人，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个10岁的弟弟已经送到学校里念书了。当记者问他对于政府有什么意见时，他笑着说：“过去两条腿给人家地主抓一条，现在对政府还有什么意见？”

盐工英雄郭富财已经修起全部用新砖砌成的窑洞，十分宽敞，过去他所住的三孔土窑洞依旧摆在崭新窑的西首。那是三个窄狭的小窑，仅有一扇不到一人高的小门，窗也未安设，里面漆黑一团，那是怎样简陋的居室呀！这恰好与现今的生活作了鲜明而富有意义的对比。郭富财是一个劳动的盐工的典型人物，他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起，每年可生产25石左右的盐，近年来共集存了30石粮食，这就是他用于建设他全家新生活的资本。一般的盐工生活都是大大地改善了，购置田产的不在少数，平时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些，他们大抵一天可以吃到一次白面。这是由于他们收入较丰的缘故。

在大生产运动中，县委和政府开展劳动竞赛，树立典型，奖励劳动英雄。1943年4月22—24日，绥西办事处分别在

马蹄沟、双湖峪举行奖励劳动英雄大会。奖鲍亮声枣红马一匹，蔡自举、郭富财各奖小米三斗，双湖峪纺织英雄马兰英也获奖。

鲍亮声、蔡自举、郭富财、王丕林先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

鲍亮声（1898—1970） 马蹄沟镇满堂沟（原名漫滩沟）村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子洲解放后，曾任村党支部书记。1943年11月，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组织起来》的报告。1944年，在子洲县第一届参议会议上当选为政府委员。

亮声从小家境贫寒，无力读书，由于工作需要，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只少量识了几个字。但他勤于思考，不断探索实践，摸索出高产耕作方式，以种田高产、栽种果树闻名乡里。

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亮声积极响应，组织村民互助合作，变工帮忙，开展比高产、比贡献的劳动竞赛。他和兄弟6人组成互助组，租种的120亩山旱地，打粮22000斤，亩产平均180斤，种了3亩冬小麦，实现总产950斤，平均亩产316斤多（这在当时的陕北山旱地确是典型的高产）。当年向边区政府缴公粮8000斤。在他们的带动下，乡亲们踊跃缴公粮讲贡献，出现了大生产热潮。

蔡自举（1902—1975） 马蹄沟镇碾盘沟村人，炭工。他12岁时就下煤窑掏炭，受尽了苦难。陕甘宁边区时期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成绩卓著。别人每天掏炭1000斤，他可以掏1200—1300斤，别人每月下炭窑十几次，他下炭窑20次。他还担任炭工工会主任，为炭工伸张正义，维护权利。1943年1月，绥西办事处工会号召600多工人学

习蔡自举和蔡自高。1944年2月,《解放日报》登载了《炭工领袖蔡自举》的专题报道,并出版了《马蹄沟炭工领袖蔡自举》的小册子。1943年11月,他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

郭富财(1890—1954) 三川口镇人,23岁时逃荒到马蹄沟镇水浇湾村后定居,先后给姜姓、栾姓几个掌柜做河滩(熬盐),尤其给盐主姜白业家做的时间最久,夫妇二人饱尝人生艰辛。1935年,本境南川闹红,他和红军有了联系,并让红军负责人住在他家开展革命活动。

1940年春,十里盐湾成立盐工工会,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其时,他已年过五十,且身体有病,仍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每年产盐25石左右,比一般盐工多产1/3。1943年11月,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获得朱德亲自题写的“给盐工劳动英雄 技术高明 领导得法的郭富财同志 朱德”奖状。

王丕林(1885—1965) 苗家坪镇董家湾村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村行政主任、变工队长、村党支部书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年已58岁的王丕林热烈响应,当年就组织起8户群众参加的临时性变工队。1944年春,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长期变工队,参加变工队的23户,劳力27个,加入变工的土地582亩,占董家湾后庄土地面积的90.6%。男劳力参加变工种地,妇女变工做饭,节省的时间搞副业生产,纺线织布,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丰衣足食的生活。变工队的沟条地普遍打了堰窝,开荒增种土地201亩,各种作物普遍多锄了两次,农闲时外出打短工、拉炭。每户粮食比变工前增收了40%,每个劳力打

短工平均挣了4斗米（约140斤）。还秋翻地201亩。为了解决变工队人员多少、劳力强弱、做活好坏、土地多少等情况不一的矛盾，王丕林制定出一（工）顶一（工）、二顶一、三顶一等折算办法，既贯彻了等价互利的原则，又节省了劳力，使农业和副业都得到发展，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其“劳动英雄”称号。

第四节 整风运动

1942年，绥西办事处成立后，适逢中央的整风学习运动。县委强调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和教育。当时，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有业务、文化、政治、理论四种，其中以文化教育为主。县委和各区委都建立了二小时制的学习制度，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特别加强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审判员贺治国同志是一位工农老干部，以前目不识丁，经过两年的学习，识字七八百个，可以写简单的信与报告批答。同时，本身业务也有了进步。再如瓜园则湾区区长王恩诚，也不识字，经过一年学习也识了三四百个字了。

除了在职干部的教育外，还开办过几次专门训练学习班。1943年12月，召开自卫军连长训练班，参加训练的连长共67名，训练20余天，学习领导本领和军事技术。双湖峪区营长景海清同志，不仅学习努力，他还能把理论应用于实际。1944年春，开办了乡长训练班，时间40天，主要总结各乡几年的工作，在思想上寻找差距，检讨缺点，同时对落后的违反群众利益的坏乡长展开斗争。使乡政权工作有了进步。1945年七大召开后，县委及时组织干部传达、学习七大精神，

统一思想，统一步伐。

当时，提倡调查研究。高岗和张闻天曾率调查团到本境调查研究，中共绥西县委也提倡调查研究，以了解实际情况。

1943年，县委进行了集中的整风运动。

子洲县整风运动，其实是对干部的审查运动。整风运动共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3年5月初到1943年7月，主要是党内干部的整风学习。参加者为党员干部49人，非党员干部7人。主要是区委书记、区长和县级干部，以及外来知识分子和个别有问题的干部。整风组织直接由县委领导。方针是搞清楚内部坏人，由内部灵活地转到外部去。任务是掌握思想上的领导，密切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团结积极分子，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斗争。存在的问题是：有的以为整风要整垮人；有的以为整风只整下面，不整上面；有的根本不知道整风首先整清坏人的意义。步骤是：一般从无政治问题的干部先入手讨论；对县上的干部也配合进行讨论；对无政治问题的干部讨论过以后，立即讨论材料充足的一些有问题的人。这一阶段曾讨论了7个干部的问题，整出两个隐蔽在党内的坏人。

第二阶段，1943年7月上旬至9月底，运动由党内转到党外，主要搞教师的整风班，配合全县外部的反奸运动。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办事处也开展“抢救运动”，人人坦白，日夜轮番“抢救”人。进行两期，第一期7月14日—9月13日，第二期9月4日—9月23日。第一期33人（内有党员8人，非在职自动要求参加者彭淑贞1人），为完小教师、校长；第二期22

人，为初小教师，由郭育才、郭凤鸣领导。形式为写历史自传和思想自传，弄清自己的问题。先讨论了一个教师的问题，逮捕了两人，后怀疑领导也有问题，8月12日，增加曹华山、向淑保二人领导。与有问题的人进行个别谈话，将其隔离，同时利用个别已坦白的人，要他规劝未坦白的人。9月中旬，分配8个基本坦白的人出去工作，开了欢送会，由县委书记白清江作宽大政策报告，特别强调镇压的一面，并将顽固不化的姬某予以逮捕。还召开坦白大会，也采取了革命的“欺骗政策”“诱骗”他人的真实东西，互相利用，发现破绽，互相指摘，互相攻击，号召大家坦白。开了两次坦白大会，共7天，11人作坦白报告。参加整风的共55人，除6个党员、1个非党员，还有1个自动参加中途因病退出的彭淑贞，没有被整外，其余47人全部被整为特务，其中有两个是内奸。连主持其事的三科科长郭凤鸣也成复兴社特务。有504名学生也被误整为复兴社特务。

第三阶段，1943年11月初至1944年1月21日，在全县对外反奸运动广泛开展以后，又由外部转到内部。参加者21人（内有两个非党员，但也曾是党员），是由组织部选定的人员。主要方针是审查政治上有问题和历史不清楚的干部，所以清算历史思想和检查工作同时并进，具体办法是写历史自传、思想自传，学习文件，座谈。期间和4个有问题的人进行谈话，皆怀疑其是特务。主要是清算历史问题，弄清思想，做出结论。

县委做出整风运动总结，其中谈到，第一阶段平和稳重，第二阶段不好，有逼供信的现象和操之过急的毛病，每一阶段学习时都有教条主义的毛病。

与此同时，全县清查，重点清查复兴社特务。鼓动群众坦白，当时叫“报名”，群众中流传：“报报名好。”到区乡政府报名说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就行了，于是不少人成了复兴社特务，就连当时仅八九岁的孩子也成了复兴社特务。保安科专门绘制了绥西反革命复兴社特务组织系统表。周复区靠近国统区，复兴社更多，有13个分社，35个支社，大点的自然村都有支社，有800多人。有总会，有分会，有支社，支社还有宣传、组织、调查、情报等名堂，也有美人队、暗杀队、造谣队、石头队等。大兴寺学校是米脂和横山交界的一个学校，办事处说这里窝藏政治土匪，学生和教师都成了复兴社特务。这里有4个分社。

1943年，全县清查坦白自认复兴社的2296人，其中，一般群众1322人，学生572人，教师61人，各级参议员126人，自然村长94人，行政村主任42人，农村党员26人，乡级领导32人，区级干部10人，县级干部10人。国民党的50人，三青团的14人，哥老会的46人，CC9的人，抗敌同盟会的8人，铲共义勇队的10人，合计2433人。

1944年进行甄别工作。双湖峪区于二三月就进行甄别4月，县委派向淑保等3人到周家崓区试点半月，9月下旬又到驼耳巷区试点，10月—12月，进行全县甄别。主要办法是：一、县区主要领导学习文件，统一认识。二、区、乡干部思想动员，明确甄别步骤；召开各种座谈会、动员会，对群众进行动员；调查研究，确定甄别对象；先易后难，先是后非，实事求是；采取民主大会的形式，由主席团宣布甄别结论，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去年坦白的群众又说：“走！去脱特务帽子！”

经过甄别，全县复兴社特务仅有5人。

第五节 文化教育

子洲的教育在绥德警备区属于中等，还不算落后，群众的办学热情很高，尤其在冬季经常自愿办冬学。但是，由于地处山区，发展不平衡，又位于陕甘宁边区之边境，教育管理也不完善。绥西办事处成立后，对教育高度重视，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教育。1942年秋，有完小6所，中心小学7所，普小25所，合计38所学校，学生1872名，教师83名。而学生流动很大，实际到校的只有1300多名。1943年春，对学校实行了裁并和精简，有完小5所，中心小学4所，普小20所，合计27所学校，学生1834名，教师62名。秋，因为整风，某些小学停办，有完小5所，中心小学2所，普小12所，合计18所学校，学生1585名，教师44名。1944年，提倡民办学校，共有24所学校，其中民办1所。教员62名，学生2176名。1945年上半年，因年馑，学生减少237名。这时，提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产、学与用三结合原则。各个学校都组织了秧歌队，到乡村宣传。比如一完小组织秧歌队到三川口一带宣传，还编了《二流子转变》等剧本，很受欢迎。还办黑板报，组织农村识字组。教师和学生都积极参加生产，尤其是教师掏地、担粪、锄地、纺线，学生也参加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仅1944年上半年，各完小种棉8.5垧，洋芋6.5垧，种其他2垧，瓜菜6垧，纺线128.5斤，养猪5头，养羊3只，喂鸡31只，栽树25株；中心小学种棉5.7垧，洋芋3.4垧，种其他3.2垧，瓜菜8分，纺线71.3斤，栽树21株。马蹄沟完小的教导主任马守韩以身作则，把十几门课

合并为主要的几门，注意了学用结合。国文强调学习记账、写路条、写计划、写报告、写文约等实用知识，算术除学习一般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外，特别强调珠算学习，自然主要教生产的方法知识，地理教现在各战场的战争形势图与陕甘宁边区的地理历史。

马守韩克服困难，努力工作，获得好评。他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并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记者采访了他，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工农干部当了完小教导主任——记子洲第五完小教导主任马守韩同志》，其中有这么两段：

马同志不懂得歌谱子，可是他对许多陕北小调很熟悉。他从《群众报》上找到了“骑白马挎洋枪调”的《全家福》，“刘志丹调”的《好消息》，“打黄羊调”的《收夏歌》，“张生戏莺莺调”的《锄草歌》，“绣荷包调”等教学生唱，得到了学生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马同志在过去实际工作中，对于政策法规是熟悉的，于是他就把“施政纲领”“十大政策”“租佃条例”“婚姻法令”等，作为公民课教给学生，并且还联系当地发生的实际问题来讲解。比如有一次区上闹起一个离婚案件，马同志给学生讲了“婚姻法令”和解决办法，学生起初还不信，偷偷地到区政府去问，结果却证明了马同志讲的完全正确。于是学生们自己家里发生问题，也来请教马同志了。学生李荣堂来问马先生，家里要抽回典出去的典地，有什么办法？马先生给他说明了，连李荣堂的父亲也感激不尽。

学校生产种8垧地，要担粪、掏地、下种、锄草。别的先生说：“只要我有劳动观念就是了，何必要我担粪、掏地呢？”他们觉得担粪经过街上难为情，还说掏地没镢头。于

是，马同志就首先担粪过街，没镢头，他到老百姓家帮助老百姓老婆锄草喂料，老百姓高高兴兴借镢头给他。学校里生产热情提高了，马先生又领了大的学生到地里，教给他们下种、锄草、奶粪、打卡的方法。一个学生家长乔老汉说：“以前这些娃娃，大人也使唤不动，而今他们放学回家，还要拾粪回来，马先生教的真比过去好得多。”

县委和政府对于冬学教育抓得很紧。建县前，农民就有自发开设冬学的习惯。其时，农民子弟多因贫穷和劳动力缺乏，无暇进小学读书，便利用冬季农闲时间上冬学，课本多为《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也有自编的，如瓜园则湾清末秀才蔡秉章编的3千余字的四言《平民适用杂字》，流传较广。1940年，人民政府责令各地成立群众性的冬学委员会，给冬学提供《民众识字课本》，并制定了冬学考试与毕业制度。1942年，全境共成立冬学22所，初小设立冬学班31个，学生840名，其中儿童616名，青年205名，成人19名。1944年，冬学已发展到195所，有学员6106名。农民“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庄农”，周家圪崂村的“一揽子冬学”，结合冬季生产办学，成绩显著。习仲勋曾在《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誉其是“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现将《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周家圪崂一揽子冬学介绍》抄录于下：

读子洲关于冬学的报告，内有如下一段材料：

“本县苗家坪区五乡周家圪崂冬学，古历九月初一开学。当开学前三日，报到学员仅九个人，八个娃娃，原因是怕耽误冬季生产。生活没办法，是大困难。经过村民会、积极分子会，分别商讨，最后确定这样一条方针：冬学和冬季生

产结合，要和训练自卫军等工作结合，这就形成周家圪崂的一揽子冬学。

开学日，报到学员增至六十六人，将及全村人口百分之五十，成、青、少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在学员大会上，通过学习计划，同时通过生产计划，生产组织同学习组织统一，生产组长就是学习组长，按各行各业分编九组。如：

运输组——四人。组长杜修业，每次三人出外贩货，起身领字，沿路学习，一人轮替在家上学，捎带担水做家里生活。

熬硝组——八人。请刘绍祥当熬硝指导员，扫土熬硝的时候，早晚学习，闲暇时整天学习。

推粉组——二人。午前推粉，下午漏粉，正午晚间学习。

卖茶饭组——三人。组长是学习模范杜赖。学习三天，生产两天，逢五逢十赶苗家坪镇集。

杂务组——七人。组长是变工模范杜修育，除过做冬里生活以外，整天上冬学。

拦羊娃娃组——六人。组长胡棍，清早领字，拦羊时学习，夜间检查温习。

拾粪组——六人。组长杜二高，整天学习，逢五、逢十苗家坪镇遇集，过路牲口多，放假拾粪。

领字组——三人。是临时闹小买卖的，三天集合教字一次。

妇女识字组——二十四人。分成四个小组，由杜修仪等四人教字。

此外有的原无生产计划，在开学之后由别人帮助他参加了生产组织。如杜修玉参加杂务组，还有其他人参加熬硝组等。

冬学校长杜修仪是学习模范和模范工作者。参加推粉组，一面给学员教珠算，一面学写信，写报告。文工团高鹏同志在学员们的要求下留在冬学当教员，课程是以教育厅的冬学课本为主，珠算、卫生、读报、秧歌为辅。另按各组需要，学写运输账、熬硝账、开条据等。学习时间分全日、半日、夜学、间日、个别教、送字条，有时随到随教，按程度分组上课，有时采取小先生制，先教组长，再教学员。学员们各人做了沙盘订了识字本，刷了黑牌，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订立了各种学习、生产竞赛条约。冬学每月拟开会两次，月末考试兼表演一次新秧歌。冬学经费是以全村集体开荒所得之一石五斗糜谷作开支。

迄今为止，检查各个冬学，仍以周家圪崂冬学创办得早，而学习成绩为最好。自开学以来，经常上学的成年、青年约三十余人，娃娃十余人，平均每人识会三十多字，学会五个歌子。学员们自己编了两个小调，一个说本村怎样转变，一个叫生产识字歌。秋收时候，忙极了，还调空识字。教员高鹏白天帮大家打场，休息时念报。杜修林赶驴碾场，手里还拿着生字本。现在秋收完毕，学习热潮便展开。有的一面掏谷茬，一面认字，放羊娃娃杜三高识会五十个字。外村揽工的杜俊德，找人变工回来看冬学。杜修育的婆姨看见人家识下字，后悔不该坐娘家。杜修成记性差，婆姨在墙上写字教他，杜修海夫妻俩人各占一扇门当黑板比赛识字。”

从上项材料内，可以看出今年办冬学要掌握如下方针：

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如果有同志提起办冬学，开头便是“经费困难，地址困难，教员困难，

学生困难……等。”总怪冬学不能如愿以偿，这是官办的强迫命令作风，势必办不好冬学，并会发生很多困难。或者认为要民办就让群众自己搞去，这也是一种不加领导的自流现象，也必然会使冬学办不起来。上述两种认识都是不正确的，要知最大困难是没把群众发动起来，只要取得群众拥护，加上我们的正确领导，没有不能够克服的困难。

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今天边区的经济发展了，人民需要文化是事实，然而发展文化必须和发展生产相辅前进。特别在警备区今年谷多毁坏，收成不好，如果我们办冬学，忘记了群众冬季生产的问题，哪怕就是把其他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冬学还是办不好，原因就是发展生产比学习文化更为重要。我们不能以为“现在是办冬学的时期，生产可以暂时停顿一下”。群众不乐意，反说“群众落后”。这样下去，就会造成“脱离群众”或吃力不讨好的情景。

三、这样的冬学，就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与用一致。群众做什么，我们就教什么。这不仅使群众有兴趣，容易学，并能够学一下就会用，长期不会忘，同时还能够打下向前发展的基础，提高学习情绪，巩固学习信心。

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及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这样使得冬学会更有内容，人民可在冬学内学到更多更有用的实际知识，并用以进行边区各项长期建设。

五、开展冬学运动，注意团结农村内参加冬学运动的一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农村内成千成万的文教干部，假如把他们通通提高一步，对于长期的开展边区经济，

巩固边区，建设边区，是一支骨干力量。

六、对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一般灌注。教员到农村，尽可能由群众自愿聘请，不一定要全派。实行“民教民”的方针。冬学课本，也应征求群众愿意学什么教什么。对于某些含有封建迷信毒素较少的旧书本，如《千字文》《百家姓》等，有时群众要念，可不完全拒绝。

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的强固据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必须把计划放在群众力量，群众觉悟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单纯的凭借于我们自己主观上的臆想。只要办好一处冬学，就可推广起来，办好许多处冬学。周家圪崂一揽子冬学就是我们今年开展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原载1944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第四版）

1943年12月至翌年1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工作团”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兰、孟波、刘炽、唐荣枚、张平、张鲁、马可等一行42人，在团长张庚的率领下，到本境闹秧歌、采风，尤其是在十里盐湾闹新秧歌，举着镰刀、斧头，穿着农民的服装，唱自编的新秧歌，令人耳目一新，也使子洲的秧歌活动有了新鲜内容。

1944年正月，各区乡普遍都组织了秧歌队，差不多每乡有一个秧歌队，他们都演出新内容。特别是双湖峪四乡景海清的秧歌队最好，他们集体创作了许多新剧，比如《奸仇》，演出就很成功。马蹄沟区秧歌队由当地的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共同组织，他们演出《二流子转变》《减租》《组织起来》也很受群众欢迎，群众专门邀请他们到村里演出。

张水华、王大华、贺敬之、马可在狱中采访了朱永山，以其弟兄为原型，以马家沟为背景，写成歌剧《惯匪周子山》，演出后，轰动一时。他们还在清涧发现了说练子嘴的拓开科，采录了不少陕北民歌，并推荐拓开科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会。在边区文教会上，拓开科两次登台演出练子嘴《闹官》，很受欢迎。萧三采访后写出《练子嘴英雄拓老汉》人物通讯，刊登在1944年1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同时刊登了他的练子嘴《闹官》。直到1987年，张庚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我们在清涧县遇到一个老汉，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拓开科，他不仅说得好，而且还会编词。他的词显然是用陕北方言编的，但并不是随编随说，而是经过推敲而成一首首的叙事朗诵诗。诗的形式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是十分相像的，是七言诗体，所不同的是一韵到底。他曾经给我们演过一段记述某次清涧农民反对地主非法闹工派款，自发引起暴动的故事，文辞雄壮动人，也像白居易一样，在叙事的末尾有几句作者的评语作结。”

诗人公木（即张松如，河北束鹿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作者）到十里盐湾采风，作了不少秧歌诗。后结集为《十里盐湾》。收《盐工曲》《人人都说种盐好》《问天》《三皇崩》《种盐英雄郭富财》《十里盐湾》《十瓢水》等7首诗。其中：

问 天

这一口口盐井是谁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谁浇
这一口口盐井是咱伙计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咱伙计浇

这一堆堆盐土是谁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谁挖
这一堆堆盐土是咱伙计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咱伙计挖

这一座座盐灶是谁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谁熬
这一座座盐灶是咱伙计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咱伙计熬

这一口口盐井是用什么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用什么浇
这一口口盐井是咱青筋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咱汗水浇

这一堆堆盐土是用什么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用什么挖
这一堆堆盐土是咱手爪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咱肋条挖

这一座座盐灶是用什么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用什么熬
这一座座盐灶是咱骨柴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咱骨髓熬

是伙计青筋掏
是伙计汗水浇
为什么掌柜的绫扇摇
为什么掌柜的白吃饱

是伙计手爪刮
是伙计汗水挖
为什么掌柜的把鸟笼拿
为什么掌柜的闲溜达

咱伙计骨柴烧
咱伙计骨髓熬
为什么掌柜的把娃娃抱
为什么掌柜的乐逍遥

我问老天天不答
我问盐神神他不说话
盐神神本是个泥疙瘩
老天爷和掌柜的原是一家

盐神神本是个泥疙瘩
要你这盐神神干什么
老天爷和掌柜的原是一家
我一脚把你也踢垮吧

他还学习陕北信天游，写成长篇信天游叙事诗《共产党引我见青天》。其中有：

什么花开红纓纓？
什么人领导咱闹革命？

金桃黍开花红纓纓，
共产党领导咱闹革命。

天上黑云追白云，
穷人革命要翻身。

前沟里晴来后沟里阴，
穷人革命靠红军……

驼耳巷的道情班子也十分活跃。

驼耳巷区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储藏，民间艺人善于表现自己的生活与爱憎，如农民王文斌所作的“刘营长打四川”就是讲述1935年国民党军队残暴掠抢行为的，男女老幼都爱唱爱听。而发展最普遍、历史最悠久的是道情班活动。不论在田野、山林、路上、家里，到处都可以听到道情的歌声。从光绪二十年（1894）就闹起，除了兵荒马乱跌年成之外，差不多年年要闹（和秧歌一起闹），所以谁也

会哼两句，每个乡上都有三五个唱得出色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成立了一个职业的道情班子，曾经数易班主但都是驼耳巷的人。他们活动于绥德、米脂、清涧、延川、安定等县，能演出五六十本道情戏，一切规模、组织都与一般旧戏班相同，只是人数较少，戏钱要的也少。

其余的全为群众自发的业余的道情班。他们多半是冬天学，正月里闹，他们的师傅就是那些职业的艺人，所演的剧目也与职业班子完全相同。

计有：

一乡王家岔有一班，当中有几个是唱过戏的。

二乡园子坪有一班，闹得很好。

四乡郭家畔有一班，也有五六年的历史。

五乡刘家坪有一班，祖传的，今年演过新戏。

二乡驼耳巷有一班，闹得好，五年了。

二乡李家渠与三乡河坪里合作一班。

这些班子有共同的地方：（1）参加人员成分贫农占百分之八十，中农百分之二十。（2）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一定的负责人，都是由几个唱得好的作中心，随时可以凑成，演完了就散。（3）他们都是在职业的道情班的影响与教练之下成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和旧戏班所唱的戏相同，只是少几本罢了。

延安鲁艺的艺术家还关注了驼耳巷的道情班子，他们做了调查，写出《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一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上面这段内容就是该文的摘录。

1944年10月，有了民众教育馆（简称民教馆，是文化馆的前身），民教馆开展群众文化教育工作。1945年初，全县有识字组34个，学员418名；读报组15个，有177名成员；

办黑板报 41 块，冬学 195 处，学员 6106 名。

县委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宣传部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宣传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尤其重视通讯报道。各区建立通讯小组，组织通讯网，积极给绥德的《抗战报》和延安《解放日报》投稿。本地的很多消息及时刊登在这些报刊上，让外地了解子洲，也让本地人民群众读报、识字，并了解全国各地的消息，推动了宣传工作。还组织识字读报组，让群众学文化知识，了解时事政策。比如，苗家坪区五乡小苗家沟村，成立了由苗子兴为首的 13 人识字读报组，该组 7 天在庙上开一次会，5 个读报组员向大家报告在报上看到的消息，7 个识字组员识字又唱歌，十分活跃。苗子兴读到了“防旱备荒是目前中心工作”后，便挨户宣传，组织大家拔苦菜担水种瓜，读报组还组织变工，推动了防旱备荒工作。

新医药。建县前，本境人民生活贫困、体质羸弱，鼠疫、霍乱、天花流行猖獗，麻疹、流行性脑膜炎、痢疾、白喉、伤寒、小儿麻痹等病蔓延，而境内仅个别集镇设有少数私营小药店，设备简陋，药物器械少，且时立时闭。乡间偶有郎中、卖药先生等游医，由于药价昂贵，贫民有病也多无力就医用药。病患者，轻则多采用拔火罐、扎火针、艾灸等民间土方治疗，重则医疗乏术，或一拖再拖，或求助于巫婆神汉，烧香拜佛，人民群众健康无保障，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

1944 年 1 月，子洲县建立，即在老君殿镇成立了政民药社，是年 7 月迁址双湖峪镇，更名保健药社。1945 年双湖峪有 4 个中西药社，6 个医生；周家崓区也有 3 个药房，5 个中医，其他区也有一些中医和药房。医生主要为中医。疫病时

有发生，周家砭区 1945 年春夏疫病蔓延，死亡达 518 人，其中除去成人 52 名外，其余皆是小孩。被疫病威胁最厉害的村庄是张家砭、冯家渠、双庙湾等地。张家砭全村有 29 户，148 口人，1 岁至 15 岁的小孩共有 67 个，而死去的竟达 21 个，短短半年中竟死去 31% 的小儿！瓜园区二乡也发现疫病，死去大人娃娃 100 多人（内有娃娃 74 个），仅钟家砭一村已死小儿 20 余人，病状似与周家砭区以前发生的相似。1945 年，各种传染病患者 5838 人，本境组织中医研究组、卫生委员会、部队卫生队，联合延安派出的边区医疗队予以救治。但因为医务人员少，死亡 2396 人，神汉巫婆十分活跃。

第六节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川和南川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开展工作。那时即十分重视统战工作，和各联保主任、抗日爱国人士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西川（绥西）县委成立后，为了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县委从军事、政治方面做了许多促进工作。团结民主人士和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促其参加抗日战争和地方建设。县委经过调查，掌握了旅外人士的有关信息，并召开有关会议，动员旅外人士回乡参加家乡建设。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旅外人士回归，著名的绅士张道源就是其中之一。他于 1943 年底，由国民党统治区武家坡回到家乡，1944 年 9 月，子洲县召开第一届参议会，他被选为常驻参议员，积极参加子洲的建设。在这次参议会上，严格执行“三三制”，到会的 143 名议员中，共产党员 48 名，占 33.6%，国民党及

其他党派 16 人，无党派人士 79 人。并让许多民主人士担任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比如，老秀才拓生荣担任参议会副会长，地主霍仲琦、刘万和为常驻议员，民主人士安旗亭为议员，瓜园则湾的民主人士蔡秉章、何家集的民主人士高树林担任政府委员。这些人都积极建言献策，为子洲县之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参议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讨论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以及旅外人士回乡问题。到会者积极发言，特别对旅外人士回乡问题提出了许多愿意回乡者的名单，由县长谢怀德对外公布，号召他们回乡参加家乡建设。

在落实减租减息政策时，按照土地的好坏，以政府、地主、佃农三方共同亲定租额，不准地主有过高的要求，也不准佃户无原则的抗租，也就是既要照顾到贫雇农的利益，适当减租减息，也要考虑到地主的收入，要求贫雇农交租交息。这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子洲县是陕甘宁边区统战工作搞得好的县之一。

第七节 自卫·支前·拥军

自卫 1942 年 9 月，全县有基干自卫军 1555 人，普通自卫军 11005 人。1943 年 7 月，绥西办事处成立自卫军大队部，属绥德警备区和绥西县委双重领导，办事处主任谢怀德兼任大队长。各区设营部，由区长兼营长，区委书记兼营政委，设副营长 1 人。自卫军分基干自卫军和普通自卫军两种，各区有 1 个基干自卫军连。全县组建 9 个基干自卫军连，55 个排，

165个班，有自卫军1435人，普通自卫军57个连。有长矛7877支，大刀388把，土炮90支，担架206副。

1943年冬，各营长到绥德分区接受训练两个星期。县上召开各区连长训练班。各区召开普通自卫军班排长、骨干队员训练，训练内容有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投弹平均38米，投弹英雄吴太康投了51米，实弹射击平均6环。还进行政治测验，平均81.2分。

1944年春，自卫军大队部对自卫军进行了一次整训。1945年1月，举办爆炸训练班。

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打退了顽固分子的多次进攻，如石窑沟区、周复区的自卫军带路毁掉顽固碉堡。在清查户口、禁烟禁赌、捉拿逃兵、挡粮食出口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查逃兵400余名，帮助军队捉拿带枪逃兵3名，检查10名。自卫军更是参加变工队的主力，各区的自卫军破除迷信，把巫神的三山刀也没收了。还对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现象予以制止。

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1940年，各区建了少许不脱产的自卫小组。1944年1月，子洲县成立两个游击队。第一游击队在周家崓成立，第二游击队在石窑沟成立，各有队员30多人。主要对付国民党顽军的骚扰，均隶属自卫军大队部领导。1945年3月，改为一、二揪击队，4月编为一个游击队，下辖1个连，白守芬任一连长，张华南任二连长，李树贵任三连长。游击大队分别驻扎在拓家畔、周家崓、马家沟岔等地，与国民党部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国民党方面挑起的军事摩擦，予以坚决反击。游击大队积极维护社会治安，还协助政府工作人员禁烟、禁赌等。

支前 抗日战争时期，本县群众出人、出物、出钱，不

辞辛劳为前线子弟兵送粮、送菜、送武器弹药，救护伤病员，民兵积极参战。当时运输主要靠人力畜力，途中常遇敌机骚扰，但是担架队、运输队的支前人员总是克服重重困难，排除艰难险阻，按时完成任务。

1942年，绥西办事处动员了民工3377人，牲畜7721头（匹）支援前线。1943年，又动员支前劳力3826人，牲畜4504头，有7203人参加修工事。期间制作担架150副。1942年做军鞋500双，1943年做军鞋3635双，1944年做军鞋8500双，历年共做军鞋12635双，这些大部分是公家贴布料，群众贴手工，有些不够的，如麻、铺衬等由群众贴补。还动员110名群众参加自卫队，动员归队战士、干部46名。

拥军 由于子洲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子洲境内驻军不少。1941年10月至1942年8月，独立第一旅七一五团驻双湖峪、马蹄沟；1942年9月至1945年8月，七一四团接管七一五团防务；1942年，三五八旅一连驻老君殿张家坪；1942年至1943年，抗大四大队驻双湖峪、马蹄沟、苗家坪、周家崓。驻军首长担任县委常委，和县委一块维护社会治安，清剿政治土匪，地方也组织群众拥军。

在群众中调剂山地536垧，川地541垧，水地88.5垧。代买菜151376斤，这些菜有的发给群众半价，有的发给三分之二。代买草140000斤。

每年春节都进行大型群众拥军活动。1943年春节时办事处曹华山副主任代表政府携带礼物慰劳驻军。双湖峪区召开拥军大会，人民以猪羊、黄酒、菜蔬等送给军队，并以小米赠给光荣的抗属。抗属王老汉收到一斗细粮，他向人们说：“不枉儿子当了八路军，父亲在家受优待。”马蹄沟的炭工，

也计划拿出东西来送给八路军。老炭工栾某命他的儿子栾世泽（一个11岁的小学生）赶快拿豆腐和洋芋去送给队伍上的同志们，栾世泽又自己写了一封信给驻军鲁参谋长和杨主任，表示在他的小小心灵中的拥军热忱。瓜园区党政机关，亦与驻军共同向抗属拜年并召开军民联欢大会。1944年正月，开展了拥军月活动。除召开联合会和秧歌慰问外，还用食物予以慰问。其中慰劳羊14只，猪11头，猪肉480斤，鸡44只，麦子12石7斗9升，米6石9斗1升，小盐1石5斗5升，粉条386斤6两，各种菜1868斤，煤炭7300斤，大葱400斤，瓜子1斗6升，馒头2900斤，豆腐1350斤，白酒92斤，醋195斤，酱26斤，南瓜96个。

在拥军的同时，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友军家属也在优待之列。子洲实行实物代耕，规定大人1石2斗，娃娃8斗，并根据抗日军人家属经济状况之不同，而分为半代耕和全代耕两种办法。比如驼耳巷区有抗属129人，伤残10人，工属36人，代耕米91石，每人还给炭450斤。还帮助抗属调剂瓜菜地、做零碎活、帮人工牲口耕地、借纺车等。

军爱民，民拥军，军队以实际行动爱民。1942年某团驻防西川，帮助群众种地374亩，锄草165亩，秋收1457亩，担水1632担，合起来的人工是3000个，假使以一工40元来计算的话，群众便节省了12万元左右。

在秋收中，军队以营为单位，组织秋收队，帮助了抗属及贫苦农民，他们的五大纪律是：一、爱护农具。二、不吃饭。三、不要慰劳。四、收割得干净。五、不要工钱。

苗家坪有个秀才，起初不愿腾房子给八路军住，后来，通过接触，尤其是在部队医生治好了他和侄儿媳妇的病后，

对八路军有了好感，提着杂面，慰劳战士。

有个安怀禄老汉，激动地告诉记者：“同志，就说军队吧，也好得很啦！我看到双湖峪有个大队长也参加他们当兵的种菜。当官的没官架子，吃的穿的和当兵的一样。街上还有他们开的铺子，价钱公道，实在减轻了咱老百姓不少的负担，他们还帮助咱老百姓锄草，连一口凉水也不喝。他们会打仗又会种地，真是咱老百姓的队伍，像这样好的队伍，哪里才能找到！”

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劳动模范鲍亮声、蔡自举结为儿女亲家，举办婚礼时，巡检司驻军专门组织秧歌队前去祝贺。1944年8月，巡检司驻军七一四团一连获陕甘宁边区政府“甲等拥军爱民模范连”荣誉称号，1945年，该连又获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的“军民一家，亲如骨肉”的牌匾。

1945年春夏之间，周复区八乡五龙山一带，山狼为害，多人死亡。驻军七一四团一营组织11人的打狼队，猎获4只狼，地方得以安宁。

第八节 司法工作

1942年9月绥西办事处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司法科，为办事处工作机构。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县司法处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各县司法处受理辖区内第一审民刑诉讼案件，设处长1人、审判员1人、书记员1人、法警2人，处长由县长兼任。处长、审判员由高等法院呈请边区政府任免。1944年1月子洲县成立，司法科改为司法处，有工作人员5人，其中处长1人、审判员1人。

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司法政策。1942年到1944年收到刑事案件190件，这些案件主要是烟毒、伤害、土匪和破坏边区案件，其余是杀人盗窃案件。教育释放者73人，处以死刑的仅两人。而用苦役（即劳动教育）教育了五分之一多的犯人，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而可以教育者采取挽救态度，比如有两个土匪，从重处罚也不为过，但为了挽救他们，予以教育释放。

民事案件主要有土地、婚姻、债务纠纷等案件。建立适合人民诉讼的制度，采取随到随审，不拖延案子。1942年至1944年受理案件246件，只存留6件未处理，判决或和解均有判决书或和解书作为凭证。结案不拘形式，较大的案件先由司法处讯问，后经县政务会议决定宣布判决。

判决和解互相照顾，执行“判决为主，和解为辅”的方针。

1942年司法处受理的31件刑、民事案件全部判决。1943年受理的149件刑民事案件中，和解5件，其余全部判决。因此，此阶段上诉案件就比较多。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绥德分院发出以“和解为主，判决为辅”的指示后，司法处审判案件基本按照“和解为主”的方针进行。比如，在46件刑事案件中和解了4件。在和解的方法上，采取下乡调查案情，多方面听取老百姓意见，开村民大会，用民主的方式去和解。杜家沟的一件数年未解决的土地纠纷案子，用开村民大会和解的方法和解决了，群众都很满意。还让区乡进行调解，革除过去强迫式或审讯式调解的方法，利用说服式和解办法，特别是利用乡村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调解，也就是利用基层和解，利用民众和解。比如，周复区一乡，发生了一宗命案，乡政府用帮一些埋葬费和解的办法，又利

用乡村有威望的人进行了事式和解。

由于旧的陋习存在，也发生过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例。乡村中有干部随便绑人、罚人，随便没收东西。苗家坪区某乡长把何家沟的一个老百姓捆绑了三四次，马蹄沟区有某乡长，私自捆绑处罚了 27 人。有个别区设有禁闭室，将群众随便关押在羊圈或萝卜窖，用绳子捆，打耳光，罚款，罚苦役等。经过县区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及时纠正和教育，此类现象逐渐减少，但是尚未杜绝。

第九节 勤政廉政

子洲县成立后，县委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勤勉从政，廉洁务实，事迹感人。

当时，机关干部实行供给制，衣食住行都很普通。住窑洞土炕，吃小米白菜，穿粗布衣服，更没有现在的各种车辆，下乡或步行或骑乘牲口。机关干部经常下乡，安步当车，乐此不疲。和群众同甘共苦，随时可以了解群众的需求。

1944 年，全县共有脱离生产的干部 200 人，这些干部多半是在各种斗争中成长起来与被提拔的，在干部中表现了深刻的团结互助精神，有 35 名外来干部，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团结紧密，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也十分团结。他们办事效率高，实事求是，尤其是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很受老百姓欢迎。

由于刚设立县，加之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财政困难，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千方百计、艰苦朴素、开源节流，度过难关。

其一，是节省开支。机关办公费用每人每季度纸 45 张，毛

笔3支，墨1锭。在此基础上，各机关的纸张、文具、灯油都尽量节省，办事处机关不用火柴，而用磷火棍。会少开，文少发。即使开会，也开短会，说实话。1944年，每人每月节省1升米，半年就节省了15石。自己动手泥窑、染布节省了30石小米。学校教师和学生自己动手修建校舍，可节省小米40来石。

其二，是机关生产自救。1943年开始，就组织了机关生产，机关生产在边区“大家动手，保证自给”的方针指导下进行。1943年种地36.5垧，主要种菜，也种谷物。共收粮食4石3斗，收各种菜60296斤。1944年以种棉花为主，共种棉花193.5垧，种洋芋76.7垧，南瓜8.4垧，蔬菜17.8垧。开种荒地46垧，共种糜谷146.6垧。机关工作人员还纺线子。打破了“男不纺，女不耕”的习俗。不少男干部学会了纺线子，每人平均一年纺线4斤左右。同时，机关设立了一个纺织工厂，仅半年时间就织布140匹。机关还组织了运输队，有骡子8头，驮运盐、石油、棉花，揽脚为业，赚米50来石。后来还设立客栈3个，也做小生意，赚麦子170余石。

奖罚分明。县委和政府随时了解情况，掌握干部的思想动态，对表现好的干部予以奖励，对不好的干部予以处罚，甚至绳之以法。对机关干部王恩诚、景海清，教育干部马守韩，合作社的刘正昌，财经上的康建西、郝桂标都给予奖励。对趁群众优待军队时贪污20来万的某工作干部，撤职查办，判处徒刑1年，对合作社的贪污干部也判处徒刑半年。还对敲诈勒索、贪污腐化的3个干部给予处分。还有对徇私舞弊，自己给自己减轻公粮和负担，骑大马、吸鸦片某乡乡长、文书，作威作福、脱离群众的石窑沟区区长等堕落分子，均予以开除或撤职查办。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

(1945.8 ~ 1949.9)

第一章 争取和平 防备内战

抗日战争终于结束，抗日战争是中国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规模空前的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抗战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他提醒人们，既要争取和平，还要提高警惕，防止蒋介石突然发动内战的危险。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一边加强党、政、军的组织建设，一边大力发展生产，遵照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进行各项建设，争取和平，但也积极备战，随时准备应对国民党的内战。

第一节 和平建设

普选工作。1945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1945年秋收后开始普选工作，要求各分区选择数乡先行试点。8月17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9月6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今年选举工作的训令》，决定从10月15日起至年底，全面进行乡、县、边区的普选工作。《训令》指出，这次选举必须继续坚持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和宗教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限制，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原则，乡选是三级选举的基础。10月5日，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今年乡选工作致各专

员县市长的信》，根据试点选举的经验，就选举方针、检查工作、选举代表、开代表会、宣传鼓动、加强各级领导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10月14日，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做出决定：改乡议会制为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克服乡级政权议行并立的缺点。

根据上述精神，子洲首先进行了乡级选举，乡选是在边区工作团的指导下进行的。要求各区选择一个乡进行试选。11月上旬，试选结束。总结中提出如下几个经验：（一）乡长报告工作与农民群众发扬民主有密切联系。乡长工作报告越具体、检讨自己越深刻，发动群众越容易。如双区五乡乡长王仲瑜根据各村不同情形的问题做报告，检讨自己作风，如个性强，有时对群众态度不好，处理问题有偏向与包庇等，群众很满意听，并积极提意见。驼区三乡六行政村主任乔仰旭听到群众批评后，立即承认错误，将未发之一部分鞋款全交群众。裴区二乡人民提出应设法救济某老汉，过去的政府没注意，乡长即诚恳接受此意见。由此发动了群众更具体大胆地提意见。但有些工作报告还不够深刻具体，只将各项动员总结讲一下。不讨论具体问题，导致群众不多提意见。（二）宣传动员群众，要应用各种形式。晚上开男人会，白天开女人会，多采用个别谈话的形式。上山宣传，帮群众收花摘豆子，一面帮助生产，一面拉话。如绥师工作团同学在双区五乡帮群众收谷子，群众很高兴。双区完小化妆宣传，演出选举秧歌剧。（三）投票方法，主要是放碗投豆子。有些乡人民代表会上，不提乡长候选人，由大家一次投票选出乡长。试选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选民参加投票。如双区五乡为百分之七十六，苗区五乡为百分之七十五。选民普遍地向政府提出

批评和建议，如双区五乡选民提意见 128 件，苗区五乡 126 件，现各区已开始普选，县区干部均深入农村，直接领导，县上同时出版《子洲报》，以配合选举运动。驼耳巷区有如下经验：干部首先要认识清楚；多想办法启发群众；认真做到自由投票。注意发票与监票。在三乡高塬里村发豆子时，用的是绿豆，因为豆子小，不易辨别，便多发了选民一豆，结果总票数不对，引起了计算上的许多周折。又在牛家湾村投票时，发票人又多发了一个选民一票，幸亏监票人注意周到，在投票时，发现出来。

试选一结束，全县各乡就进行选举，于年底乡选顺利结束，共选出代表 1835 名，其中新选 921 名，连任 914 名。这次选举后，大家感到政府工作水平提高了一步，群众也真正了解：“政府是人民的，干部是人民的伙计。”

1946 年 1 月 13—19 日，子洲县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本届参议会，共有议员 88 名，其中选举议员 73 名（正式 63 名，候补 10 名），聘请 15 名。其中地主 8 名，富农 9 名，中农 20 名，贫农 51 名。共产党员 28 名，国民党员 15 名，无党派人士 41 名，宗教人士 4 名。大学文化 1 名，中学文化 17 名，小学文化 19 名，粗识字 28 名，文盲 23 名。有男 85 名，女 3 名。会议主要议题：听取和审查谢怀德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解答议员提案 99 条；选举李广业、拓生荣、张书翰、续甫昌、鲍亮声、霍仲奇、姜生华、白生莲、王鸿宇为常驻参议员，参议长李广业、副参议长拓生荣、参议会秘书长王都；选举政府委员王占山、高浩富、张明科、马彦华、高树森、王丕林、霍云台、高树林、安旗亭、赵加珍、尚明礼、王性真，县长王占山。本届参议会充分地发扬了民主，议员们都积极发表

了意见。马逢瑞先生说：“我很兴奋，因为子洲县在谢县长和全体干部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皆有进展。子洲虽处在复杂环境中，时常有人想破坏它，但人民终能安居乐业，这实在是人民的大幸福。”并批评周家崓区合作社之所以未能办好，实是由于股金摊派，业务包办，人不称职之故。刘直卿先生对治安工作备加赞扬。李之周先生称赞纺织近年来有很大发展，如石窑区在民国三十一年只有五个妇女会纺，一个可织，现全区已有纺妇八百多，织妇二百多，这就给人民解决了很大的困难。韩学民先生提出目前民间高利贷尚严重存在，望政府继续予以纠正。最后大会通过议案 40 件，其主要为：一、1946 年全县生产计划；二、彻底减租，改善人民生活；三、普遍推广医药卫生，减少疫病死亡；四、在教育上解决民校经费，提高学生和教员的文化程度。参议会闭幕后，翌日即召开常驻议会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讨论如何把议会的各种决议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实现。同时，研究了租佃、司法、婚姻、文教诸问题。

继续减租减息。其主要内容为减租保佃。地主嫌地租少，想方设法抽回土地，佃户无地耕种，减租也无从谈起。比如，裴家湾区于 1945 年 11 月中旬召开各乡农会主任联席会议，主要检讨去年的减租保佃工作及研究如何执行专署今年制订的暂行减租办法。会上检讨出去年农会对减租工作抓得不紧，对佃权的保障注意不够，导致部分落后地主借口自种，向佃户收回土地，土地收回后不是荒芜了就是假典了。如二乡农会主任薛均元同志讲：“去年二乡农会在执行减租保佃工作方面有毛病，如关庄地主白旺月有百晌地左右，分租给 19 户佃农，近几年来，租子是减了，可是他非常不满，去年他说

家中困难，将佃户张福桂等租的 20 多垧地收回自种，但据了解他将收回的土地假典给白树贵 3 垧，余下的全荒芜了。”也有个别狡诈地主，欺压佃农，提高租额，如庙沟地主朱某有 120 多垧地，经减租后他向佃农小拓四、高应升等讲：“按减租条例走，每垧地是二斗租子，不按减租条例走，每垧地是一斗租子。”其他各乡也有同样现象。为贯彻减租政策，保障佃户生活，会上决定今后要加强农会工作，会后各乡即开始整顿农会组织，贯彻减租工作。二乡在三四天内，已发展农会会员 80 多名，并决定向个别顽固地主进行说服斗争，将荒芜了的土地分租给无地或缺地种之贫农。四乡有 30 多户佃、伙户开会讨论向地主收回多交租子，两户地主在一天内即退回多收的三石四斗一升租子。

生产建设。中共中央于 1945 年 11 月 7 日指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共子洲县委和县政府在抓紧减租的同时，把生产当作第一要务来抓。尤其发挥变工队的作用，充分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其中董家湾王丕林的变工队已经坚持 3 年，并且逐年发展，由 23 户，增至 26 户，有 16 户参加了长期变工队，生产热火朝天。裴家湾区淮宁湾修了 33 垧水地。1945 年 10 月，拓元国区长不畏严寒，亲自下水抢修坏坝，群众因受感动，倍加积极，24 户不团结现象亦由拓区长帮助解决，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完成。1946 年计划再修 103 垧水地。春训班号召全体干部向拓区长学习，并将下列兴修办法继续推广：（一）发动群众变工修，按地段记工账，修就后地多者给地少者还工或付钱；（二）伙修，地主人无劳动力可让别人修，修就后由修者伙种；（三）租修，地主人不修，可租给别人修，修者可取得五年或十年佃权，

前三年或五年按旱地交租，后二年或五年按水地交租；（四）贫寒的地主人要自修，或雇人修，政府可贷款帮助；（五）典地修水利者可取得一定时期的典权，如因特殊情况，未至协商定之典期，地主人欲抽回典地时，除付原典价外，应酌情补价修水利者所费之工。

盐业、煤炭、纺织等生产有了新的进展。

救灾工作。1945年，子洲县春夏亢旱，还有其他自然灾害，生产救灾刻不容缓。县委和县政府在专署工作团的帮助下，积极救灾，发放农业贷款，解决灾区群众的种子、畜力、生产工具问题。组织群众补种秋田作物，扩大冬麦面积，增加种植蔬菜、洋芋，并开展增产节约、节衣缩食，设立义仓，储存野菜、野果、玉米芯、榆树皮、米糠、麦麸等代用品，备荒度灾。1946年春荒更为严重，人无口粮，畜无草料。县委和政府及时发放救济粮，同时动员群众互相帮助，调剂口粮，自救救人，缓解春荒。

教育文化。政府支持民办小学，1945年秋季有民办小学35处（其中1944年成立的15处，1945年成立的6处，由初小转民办的8处，由冬学转民办的6处），教师36人，学生649人。这些民办小学以苗家坪区的景家沟民办小学最好。

县政府为求普及社会教育，节省群众经费，特于1945年8月间试办巡回社教。派社教辅导员朱绍序先生，到马蹄沟区四乡瓦窑崩、王家砭、老庄沟三村轮流教学，经费由政府负责，各村群众甚为欢迎，报名参加识字者已达101人。朱先生的办法是：组织有序，按地区、生产、文化程度、性别分类编组，如变工组、儿童组、牧羊组、成人组、妇女组及读报识字组。时间是按各村集日分配，如一、四、七在瓦窑崩，

二、五、八在老庄沟，三、六、九在王家砭，每逢十天为休息日，朱先生轮走的日子，由各村小先生代教。每次教的时间，根据不妨碍生产的原则，什么时候大家有空，就在什么时候教。教材以《民众课本》和《抗战报》为主。他又编了一本新识字课本，内容是简单适用的杂字。此外他还编了一个劝识字的歌子，仿“骑白马”调，教大家唱。有时还给妇女和儿童教棉花打卡法等。自8月12日到9月1日20天内，学生们已识会28个或40余字，还唱会了“变工锄草”等3个歌子。

继续办冬学，组织读报组、识字组，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其中苗子兴的识字读报组很有名气。苗家坪区五乡小苗家沟村，只有二十几户人。该村过去内部不团结，一切工作做不好，可村干部总是怪这村子坏，老百姓落后，而没有好好检讨领导上的毛病。后来乡政府发现了本村23岁的积极分子苗子兴，他对革命工作有认识，能团结群众，并能看懂《群众报》。1945年3月间，乡政府就帮他订了一份《群众报》，并让他发动别人识字读报，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成立了13人的识字读报组，后来转为冬学，又增加了6人。到1946年5月间，参加识字的人更多了。苗子兴看到在一起学习不方便，就把大家按程度分为甲乙两组：甲组识字较多，以读《群众报》《大众报》为主；乙组识字较少，还有不识字的，以识字为主，由苗子兴给大家教或写字条。学字从学庄稼名称开始，以后再逐渐学着联句。苗占国、苗文彬等5人，过去一字不识，现在已能看懂《群众报》《大众报》，能写信记账了。苗文业过去也一字不识，现在能给本村的黑板报写稿子了。他们每星期还围绕着目前的中心工作讨论一次，如春耕时讨论组

织劳力，夏耘时讨论锄草，最近就讨论备耕。每次讨论中间，还要读报、考字、唱歌、讨论时事、自由讲演等。识字组还在村口办了个黑板报，内容有时事、生产、卫生和药方等，村里人很喜欢看。

由于开展读报识字活动，村子团结了，家庭和睦了，工作起劲了，生产也上去了。

优待抗工属。1945年抗工属1229户，优待粮1718.7石；1946年，抗工属1897户，人口6420人，优待粮2688.75石。其中抗属我方1348户，友军40户；工属，我方502户，友军5户；共计1599户受优待，298户不受优待。县级机关代耕75名（内有小孩41名），标准为大人1.2石，小孩0.8石，合计73.6石。

社会救济。1946年2月28日，专署发来救济粮45石，给重点灾区救济30石，救济其他11.37石。

第二节 积极备战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即被蒋介石公开撕毁，战争不可避免。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子洲县和国民党占领区毗邻，随时有遭到突然袭击的可能。因此，备战是当务之急。

县委和县政府响应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

的号召：一切为了保卫边区，一切为了自卫战争的胜利，广泛宣传动员，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组织坚壁清野，预先防备。连续两次召开自卫军营长联席会议，讨论部署了备战问题。1946年8月3日，子洲成立了社会部，加强保卫工作。同时举办民兵训练班，让民兵掌握投弹、刺杀、设计、埋雷等技术，组建民兵游击队，还发明了子弹头雷管。

鉴于正规部队调离，在报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批准后，1945年12月19日，绥德军分区警备第十团在马蹄沟成立，子洲县有512名青年参军，赵立业任团长，张铭科任政治委员，李有益任副团长，贺治国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春，绥德军分区精简整编，撤销团一级机关，警备第十团整编为直属军分区的第三警备营。1946年秋，解放横山等地的北线战役发起，警备第三营首先解放了高家沟，然后配合教导旅和新四旅一个团解放了横山县城、响水堡、波罗堡等地。战役结束后，绥德军分区成立了第四团（警备第三营编为四团第三营）、第六团。四、六团不少战士是子洲青年。四、六团在太原战役和解放大西北中打得英勇顽强，解放军七纵队授予一面“能守能攻”的奖旗。

第二章 土地改革

第一节 征购土地

1946年冬—1947年春，子洲开始执行征购土地政策。

1946年11月25日，边区政府按照中央的指示，首先在绥德县贺家川村进行试点，由政府用征购的方式向地主买地，然后再卖给贫苦农户。仅9天时间，村里61户无地少地农民就在边区银行的资助下，获得了土地。12月初，边区政府公布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明文规定：“一、在抗日战争中、自卫战争中，对边区有功绩之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均匀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均匀地数之一倍；二、中小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均匀地数应多于当地中农每人均匀地数百分之五十；三、大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均匀地数，应即是当地中农每人均匀地数；四、恶霸地主留给其家中每人均匀地数，应即是当地中农每人均匀地数百分之八十。凡地主自力耕种之少量土地，不得征购。”

12月24日，新华社专门向全国发出电讯，报道了贺家川村通过政府征购和平赎买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银行资助无地少地农民获得土地的成功经验。

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进一步派出工作团，在各个分区推广了土地征购工作。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土地条例》，取消了有

关“土地之承购应以现耕为基础”的条款，提出“征购土地之分配，应按人口分配给无地及少地之贫苦农民，使每人所有之土地数目与质量，达到大体的均匀。”

征购土地即发行公债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给农民或贷款由贫苦农民购买的方法。此法实际上用和平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

1947年2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指出土地公债是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也可以使地主把所余土地全部拿出。“在经验中证明许多地主宁愿献地、写献约，而不愿得公债卖地、写卖约。因地主感觉写了卖约，以后再无借口收回土地。”

1946年冬，子洲也开始征购土地。征购是名义，而分配是实质。征购的款项基本没有到位，而贫苦农民已得到土地。地主大都选择了主动把自己的土地献出，由农会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比如，双湖峪绅士安旗亭代表母亲、兄弟献出山地10垧、川地2垧和应征购的窑洞3孔。

当时以土地多少定成分，人均6垧地以上就定为富农，人均8垧至10垧地以上就定为地主。这样，左的倾向多，驼巷区三乡，订了四五十户地主，不少中农订为富农，个别贫农也有订成地主的。

对地富的浮财未触动。

在斗争中，也发生过干部贪污、徇私情等现象。县政府四科科长、周家崓区委书记把斗出的银圆、烟土贪污了。驼巷区四乡乡长把会议上决定征购某地主的15垧土地私下改为12垧。

土地征购时，对地主富农比较宽容，给地主留的地等于中农土地的数量，只分割富农土地中的出租部分，留给他们相当于中农的一倍半到两倍土地，并宣传：地主多年没受苦，所以要给留多些，不然生活会困难。

征购前地主人均占有土地 14.3 垧，富农 8.73 垧，新富农 5.6 垧，富裕中农 5 垧，中农 3.6 垧，贫农 1.8 垧，雇农 0.46 垧，手工业 0.32 垧，炭工 1.1 垧，贫民、小贩 0.72 垧；征购后，地主人均占有土地 3.95 垧，富农 4.97 垧，新富农 4.86 垧，富裕中农 4.49 垧，中农 3.92 垧，贫农 2.68 垧，雇农 2.21 垧，手工业 1.23 垧，炭工 1.42 垧，贫民小贩 0.91 垧。

可以看出，征购后，地主、富农人均占有的土地虽有减少，但仍相当于中农或富裕中农水平。

第二节 诉苦、清算

1947 年，伴随着征购土地，子洲开展了诉苦、清算运动。清算运动，即有组织地召开大会，发动贫苦农民对罪大恶极的地主展开清算、诉苦、斗争。苗家坪区一乡诉苦大会上，烈士女儿哭诉，地主高某在土地革命时，勾引反动军队杀害她父亲的罪恶事实；老君殿区六乡冯某的婆姨哭诉地主高某倚势强奸她的情形，引起公愤。

高家沟区一乡温家沟的清算在全县很典型。现把清算报告（1947.10.12）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首先，组成临时工作组，朱区长任组长，姚静波为副组长，预先确定了斗争对象，即于 9 月 10 日扣押反动地主，11 日出发并分工到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13 日召开清算诉苦大会，

产生了清算委员会，分组进行斗争对象家产清理之后，即分配果实，2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领取斗争果实，10月2日结束。

全乡86%的群众得到果实。同时，旧国民党员与三青团员及发洋财者暨赌博者等数人在大会上向群众坦白。

第一步：诉苦清算大会。

首先产生清算委员会，选出清算委员17名，推选出霍维英为主任，高树喜为副主任。大会上当场清算了4个地主，群众自发清算了两个地主。另外斗争了37人，其中自动献粮者8人。所谓斗争，就是面对面地对地主、富农清算，主要清算他们的政治表现，着重清算他们的财产。其中高某一贯是恶霸地主，且是国民党员，王某是任过联保主任的王某某之叔父，思想特别反动，对租佃户特别苛刻。该二人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带领白军抢劫群众财物、牲畜不少，欺压群众甚多，因此群众对该二人特别愤恨，故决定扫地出门。所谓扫地出门，就是让他们离开自己住的窑房，财产全归清算委员会处理。

第二步：清理地主家产。

分组清理，各设有组长，并配备有经验者。主要是深挖地主、富农藏在窖窖里的粮食和其他财产。并利用被扣地主与家中人求生怕死的心理要求其自供而将他们家院外山中的窖窖大部刨出，虽有个别顽固地主对窖窖拒不自供，但因清算委员会工作的同志细心吃苦，亦无遗漏。共创出粮食32.792石，被服器具折合44.19石。

高某因其兄被斗，自发献粮1.5石，另一人亦受其影响，献粮两石，其余另发动了6人献粮。其中顽固地主束某坚称

没粮不献，清算委员引他参观了被扣地主的住处及其被刨后的家庭，才献粮1石。共献出粮食21.8石，被服器具折合2.6石多。

白某两口人有地20多垧，且放有颗颗账，土地革命时定其成分为富农，后认为不合适，改为地主，动员其献粮11石。

第三步：果实分配。

先估价，原则确定为四六分（算账得四分，群众得六分）。分为三层。最穷者每户得粮1.5斗，次穷者每户得粮1.3斗，穷者每户得粮1斗。338户得到果实，占全乡人口86%强。

二乡部分村庄受到雹灾，从果实中抽麦子3石救济。清算委员会及帮助工作者各给麦子6升。

召开群众大会，到会300余人，改选了领导，农会委员高某因给地主通风报信而被撤职。

之后，旧国民党员与三青团员及发洋财者暨赌博者等8人在大会向群众坦白，不彻底者被逮捕。

在清算过程中，打击了地主阶级，贫雇农扬眉吐气，但也有一些“左”的做法。某乡，借口农民秋收，20多干部斗争地主，甚至使用各种非刑；某村一个地主家属耳朵内被灌进炼红的清油致死；某乡一贫农因保藏地主财物，被吊起拷打；某乡为追索地主转移的财产，致一贫农妇女自尽；斗争果实甚至连富农及大商人也分得一份。斗争期间杀猪宰羊，大吃大喝，浪费现象严重。

1947年11月5日，县委书记任志新、县长李身修联名发出通知，指出：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获得不少效果，但不能包办代替，不能对贫农进行打击，更不能使用非刑。斗争地主的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发动群众，让群众用自己的力

量——自己诉苦，自己动手，向地主诉苦，清算报仇。只有群众用自己本阶级的伟大集体力量，才能打垮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势力，干部没有任何理由包办代替。一切群众的行动，甚至不文明的行动是正义的合法的，应无条件地支持。一切脱离群众，干部包办的行动，是错误的，应受严格的批评。并把《土地法大纲》《晋绥农会告农民书》发到各地。

在诉苦、清算中，当场镇压了一些恶霸和敌对分子。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和土地改革前后，子洲县先后处决了一批恶霸、敌对分子，据1948年4月30日统计，共处决68人。其中，迎敌者11人，历史问题者14人，投敌者12人，给敌人做事者9人，破坏坚壁清野者3人，组织武装叛变者2人，政治土匪及历史问题者3人，敌探6人，敌军军官4人，胡宗南兵4人。

处理这些敌对分子有三种方式。

其一，若反动分子在某一地群众最痛恨，事实明显，即召开一乡或数乡的乡民会议，由政府出面组织临时法庭，由群众诉苦斗争，然后宣布罪犯，事后依法制裁，执行枪决。用这种方式处理者有38人。

其二，发动群众在大会上向恶霸反动分子展开激烈的斗争清算，提出罪恶事实，由群众向政府要求镇压，政府接受群众之自我要求，执行枪决。用这种方式处理者有3人。

其三，事先去群众中说明处理某一坏分子，大量发动群众，并调查材料，预先酝酿，在群众中确立谁诉苦谁质问，在开会时即成立由群众中选出主审等人的人民法庭（县或区的干部只参加1人），人民自己为原告，逐一诉苦清算，完全由人民审判处理。用这种方式处理者有18人。

另外，秘密处死者有 15 人。

子洲县给上级汇报，认为，以上三种办法，根据经验，第三种最好。因为人民对罪犯有深刻的仇恨，愿意怎样，即可怎样，政府干部不包办代替。群众亲手报了仇恨，发扬了广大人民对敌人对阶级斗争的高度热忱。

用第一、二种办法是政府代替包办，不能亲手雪仇，在处理栾某时，群众诉苦，公家枪决，不能让群众感到满足。如有曾被栾强奸妇女，在死尸上乱刺，还说：“我在你死骨头上还要解恨！”

这次处死的 68 人，有本县籍的 54 人，胡宗南部队官兵 14 人。

公审大会的程序比较简单，现将 1947 年 7 月 27 日，双湖峪公审高明善的情况简述于下，以见一斑。

高明善是双湖峪一乡高坪村人，贫农。1947 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外劳动，至晚未归。深夜，带镢头一把，口袋一条，回家路遇米脂卧羊区二乡老石窑湾村朱继青，从苗家坪赶集回来，吆驴二头，驮粮 5 斗 4 升，其中麦子 2 斗，小米 1 斗，黑豆 2 斗。高见财起意，将朱打死，把尸体丢在山水窖内，3 月 25 日被司法机关逮捕。5 月 15 日晚上，高越狱逃跑，改名换姓，投奔榆林国民党。后因时局所迫，投诚归案。1947 年双湖峪组织人民法庭进行公审。公审程序是：首先通过会序；接着梁科长报告开会意义；第三，通过人民法庭组织名单：主审人曹耀科，陪审人刘县长、梁科长、冯区长、李万海，书记员叶春文、王世丕；接着人民法庭组织人员就位，开始审问。审问时有人领头喊口号，最高潮时，大家齐喊：“快把坏人枪决！”最后，临时人民法庭商议，

根据高明善的罪恶事实，接受人民之请求，依法严惩，决定将其枪决，立即执行。临刑时主审问其有无遗言，高说了欠人之账和他人欠己之账共四宗。之后就行刑了。

由于是战争时期，处决人犯很快，审批程序也很简单，经过绥德保安分处批准的有5人，榆横特委批准的3人，县委、政府决定的36人，朱专员及各区署决定的17人，未经县上决定的7人。这样做有利有弊，利在迅速处理敌对分子，对反动分子震慑很大，弊在群众怎说就怎干，难免有过头现象，有时把握不住群众情绪，把不该杀掉的杀掉，或者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些人推到敌对方面。

第三节 土地改革

1947年11月1日至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绥德义合区薛家渠阳湾的空地上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即“义合会议”。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属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各地委书记和专员、绥德专署各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地方军分区部分干部共922人参加了会议。大会由习仲勋、贺龙、林伯渠分别主持，贺龙致开幕词，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传达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号召学习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会议着重检查和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来，边区进行清算、减租、征购地主土地的进展情况和问题。会议以较多时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和纠正了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及某些离开党的路线、政策和违反纪律的倾向。对于部分干部出现的阶级观点模糊、对敌斗争不坚定、不敢放手

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予以揭露、批评、教育。会议作出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

为了贯彻“义合会议”精神，子洲县首先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也叫土地改革大会），布置全县土地改革工作。土地改革大会自12月1日起，至20日止，开大会8天，小组会11天，剩一天组长以上及县级干部开大会，其他人开小会。

中共中央西北局特地派出子洲土改工作团，团长是高仰云，他是米脂人，时任西北党校副校长，兼任中共子洲县委副书记。

首先成立筹委会，杨成森、任志新、李身修、刘佐丞、王生源、高浩富、徐天培7人，下设秘书处，王生源为秘书长，胡其谦副秘书长，下配4个干部，以区为单位分10个小组，县级单独设1个组，党校工作团分别派人参加。

会议首先总结了中共子洲县委一年来的工作。

关于对子洲土改之估计，工作团和地方干部有分歧。工作团认为县委于1946年3月10日和23日，发下的指导土改文件是保存地主阶级（后改为维护地主阶级），分配果实是富农路线。县委书记任志新认为是目的与方法的矛盾，执行方法不彻底，照顾了地主，而副书记王生源认为干部腐化很严重，其他不是严重问题。

县委书记任志新两次上会检讨，工作团当场追问，弄得他下不了台。后来转到斗争四科科长李某身上。

第6天大会讨论，首先选出杨成森、刘佐丞、徐天培、李身修、王生源、白映珍、黄巨金、王正芳、李万章等9人为主席团，由李身修上台反省。因其反省不彻底，当场被撤销其主席团成员资格，接着李某、苗某上台反省，也下不了台，

苗某当场被开除党籍。大会上追问与斗争的都是党校的同志（工作团成员），地方干部只有9人发言。表决李身修撤去主席团成员时地方干部只有少数人举了手。

第7天大会，副书记王生源反省，也下不了台，也要撤销其主席团成员资格，但未能通过。

12月17日，刘佐丞作大会总结，中心内容是整编队伍、领导、具体政策三个问题。整编队伍首先是打破旧圈子，党员公开。他还讲了一些具体政策界限。接着，对犯错误的干部处分：开除党籍、行政撤职6人，警告、行政撤职3人，警告1人。其中科长2人，区长、区委书记6人，县府文书1人，乡指导员1人。

会议决定了有关子洲土地改革的步骤：先农村，后市镇，各乡同时发动群众，普遍斗争地、富的浮财、底财，联系分配土地工作。

同时，决定成立土地改革指挥部，驻三眼泉，下设5个指挥所，各辖2个区，全县组织25个工作组，各组领导2—3个乡。

子洲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就是正式进行土地改革。12月22日，土地改革工作团下乡，至1月6日，共15天。

首先发动群众，要突破旧圈子。也就是对原有的干部不信任。全县1073个村普遍建立贫雇农小组，也建立了贫农团。接着斗争地富，有不少“左”的做法。裴家湾区工作组召开诉苦大会，标幅书“农民法庭”，鸣枪三响开会，地富戴白条，农民戴红条，地富狗腿子不戴条子。当场捆绑20多人。普遍采用肉刑，烧、烤、吊、打，个别地方甚至上压杆、上竹签、烧红马刀烙嘴，石窑沟、瓜园则湾区斗争的66户地主被吊打了40户，99户富农被吊打了42户。马蹄沟、驼

耳巷区斗了130多户地富，吊打75户，20多户受刑最重。其他地区情形亦相同，对地主富农没有区别，浮财底财一律没收（少数地方对富农财产未完全没收），斗争时期共死了35人，122户地主外逃。

大部分地主、富农遭斗争，甚至中农、贫农也遭斗争。斗到的粮食，也有就地大吃大喝的。

斗争果实。全县共斗出小米176.493石，小麦395.531石，杂粮2278.165石，合计粮食2850.189石；牲畜骡马6匹，牛34又5/6头，驴141头，羊981只，猪1头；金3693两，银首饰元宝13906.41两，银洋17704元，铜圆黄钱10325斤。鸦片719.15两，边币19334.22元，敌币2785800元，麝香6分，油80斤（一个区的）。布匹：市布506.15丈，土布868.62丈，棉花500斤，绸子436.06丈，纱布42丈，油布3.3丈。衣物：被子432块，毡1133块，褥毯250块，皮衣26件，粗棉衣2204件，细棉衣1752件，粗单衣2957件，细单衣2196件。

配合土地改革，出了17期油印《子洲报》，登载123篇稿件。

在斗争地主的同时，也进行干部审查，采取群众大会审查的方式。也有过火现象，三皇崂打了几个区、乡干部。

1948年1月4日县委紧急通知。主要内容如下：斗争地主富农一般废止肉刑，个别恶霸可交群众处理，斗坏干部只准批评不准打，但干部必须承认错误，真正有罪者，可组织人民法庭审讯。目前工作重心是斗地富，对坏干部现在搜集材料，缓后斗争。斗富农一定要与斗地主有区别，只拿出其长余的部分。对中农是坚决团结的政策，就是富裕中农的长余财产也不能动，只可以动长余的土地。至于组织中农，应

在贫雇农形成核心之后，再个别吸收，成立农会。定成分方面，目前首先要查清自己的队伍，然后再查清斗争对象地富成分，最后再定中农。

1948年1月5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指导工作。在子洲，习仲勋特别注重调查研究，7、8日两天，同延属地委负责人李景膺、李景林谈话，9日，又和三边的同志了解土地改革运动进展情况。

1月7日，习仲勋在子洲召开的土地改革会议上讲了话。他共讲了关于义合会议、形势问题、英美苏关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土改工作、整党问题、救灾问题、领导工作等8个问题。而这8个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倾向。他说，义合会议是战争以来的一个干部会议，基本是成功的，但有几个问题未很好解决，一是对联合中农强调不够，二是对工商业保护的政策处理不够，三是“三三制”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土地改革首先要划清敌我界限，孤立敌人，防止过“左”过右。目前的土地改革中特别要防“左”，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联合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对富农经济、政治上要有区别，对地主要分开大、小、恶霸与否，争取干部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参加工作，对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不能采取冒险过“左”的做法，对民主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应联合，给予适当照顾。将中农以富农斗了，这个问题不能马虎，要纠正偏差，尽可能退回更正斗出中农的财产，承认错误。根据十来天的土改中，一般的表现是“左”，如绑、捆、吊、打、烧等肉刑，定成分不讲实际。

习仲勋特别强调，要按照政策准确地划分阶级成分，不能看滩滩大小、生活好坏、矮子里选将军定，主要看生产手

段即占有土地有多少，从剥削关系上定。对地主，已经参加5年劳动的不能定为地主，斗争地主分开大、中、小、恶霸与否，除大恶霸和特务分子外不要斗死，采取强迫地主劳动的改造办法。对富农斗争面要窄，按平分原则分其多余的财产，衣物东西一般不动。对新富农和旧富农应有所区别，地主富农有工商业者不动，严格划定中农和富裕中农，要与富农区别清楚，中农是农村团结的主要的长久的同盟军。鳏寡孤独，无法种地，靠出租土地为生的，不能定为地主、富农成分。老区的土地改革要慎重，老区贫雇农占总人口的20%，中农占总人口的80%，这里不一定再平分土地，可用抽补的办法补无地少地人的问题。老区地主富农占8%的观念要改变，否则要犯原则性错误，不能把新富农当旧富农斗，也不能把已经参加劳动的地主，进行再斗争。搞地主的底财不一定打、捆、吊、要，而是慢慢地与他要，一定拿不出来将来还是社会的，叫他放在工业上。目前将分配土地作为中心一环，要选出很可靠的贫雇农管理斗争果实。土改和生产结合很重要，要使生产下降时间缩短，经济很快得到恢复。

习仲勋还指出，在土改中要正确对待干部，混进我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应予以清洗，但要慎重。群众审查干部是应该的，也是很好的方式，但要掌握领导方法，防止自发运动，有三种办法：一、放手批评，不准打人；二、承认错误，准许说理；三、如果违法，可以绑送。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9天，进行了多次座谈和调查研究，了解到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发现各地的极“左”的做法正在蔓延滋长，应该立即纠正制止。

1月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

地改革中的9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的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作了阅示。

1月14日，习仲勋离开子洲，晚上回到绥德义合的薛家渠驻地。

子洲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1月4日—2月2日，工作转变为纠正偏向。

1月8日，召开各指挥所主任及部分小组长联席会议，进行总结。会议开了6天，要求按行政村为单位平分土地，1947年春天，已经平分了的地方，只进行抽补，并要求把土地改革与生产救灾联系起来。

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成果，布置了治安保卫、建立民兵

与自卫军工作工作。

第四阶段，2月2日—3月13日，土地由平分转到调剂。各地工作重心是调剂土地与分配果实，同时进行救灾、移民、动员春耕、调剂籽种。

2月4日，指挥部又发出紧急通知：一、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以消灭封建及征收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旧富农的长余土地和财物来满足，绝不能损害中农利益；二、子洲经过土改，封建已成残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土地已得到相当的满足，贫农、雇农、中农土地差额不大，今天应采取调剂方针，达到土地问题接近平均或大体平均上，因为绝对平均是办不到的；三、采取调剂方针要在去春给地主留有好地中去抽肥，征收富农长余土地向新富农宣传解释，自愿拿出一些土地（绝不能强制）及在去年分配不公的地方抽出一些土地，再从公田、学田、丁地、黑门产中拿出土地进行调剂。中农的土地不能强制拿出平分是肯定的，如果动中农土地，必须要中农思想上真正自愿及全家多数自愿，调剂工作是很细密的，必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认真进行；四、要在正月十五前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但必须以分好为原则，某些地方如分不好，可待秋后再分，并将此次解决土地办法和春耕准备工作，进行普遍深入宣传，绝不要因分配土地误了春耕，妨碍生产。

指挥部于2月14日还发出关于处理典当关系与债务问题的通知。

全县共调剂土地 36052.22 亩。抽地主土地 4441.05 亩，给地主补入 164.15 亩；抽富农土地 8864.34 亩，补入 74.16 亩；抽新富农土地 331.33 亩，补入 25.8 亩；抽富裕中农土

地 4335.93 垧，补入 154 垧；抽中农土地 5610.6 垧，补入 4055 垧；抽贫农土地 868.67 垧，补入 24137.66 垧；抽雇农土地 255.23 垧，补入 5749.53 垧；补入手工业者土地 47.72 垧，补入炭工人土地 132.76 垧；抽贫民小贩土地 18.5 垧，补入 127.95 垧；抽盐产地 103 垧，补入 42.5 垧；抽公地、黑门产、移民地等其他土地 11223.57 垧及未分完土地 78.69 垧，调剂后余 269.32 垧。调剂后，地主平均占有土地 2.64 垧，富农 3.01 垧，新富农 3.67 垧，富裕中农 4.26 垧，中农 3.77 垧，贫农 2.97 垧，雇农 3 垧。

分配土地采取几种方法：一、除农会干部外，另选出分配委员会；二、村与村各种物品搭配调剂；三、将果实评出价格，根据实际分配；四、以乡召开果实展览会；五、由农会讨论分配方案，在群众大会上宣布，经群众讨论后决定；六、把果实分为上中下三等，对特别贫困者予以照顾。

土地改革初期，不少地方施用肉刑。施用肉刑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斗出埋藏的底财和浮财。各级领导认为“不上榨不下油”。指挥部所在地三眼泉，富农郭某有 20 个银圆，肉刑后就拿出来了，指挥部的人说：“不上榨硬是不下油。”第二个原因，干部害怕走了地富路线，因为在土改大会上多次批评过去不让打死地主的做法，因此宁“左”毋右。其三，领导施用打黄牛镇黑牛的办法。其四，群众中的不良分子假公报私。其五，主观臆测，代替实际研究。比如驼耳巷区五乡，群众说某户有一百元宝，三千银圆，结果斗出三个元宝，一块银圆。为了继续挖，因此斗得很惨。

土改对待中农问题认识模糊，把大部分富裕中农划到地富中。不让中农参加农会，中农的负担也较重。苗区二乡一

户中农被摊代耕粮 5 石，后纠正为 9 斗。

对待工商业者，尤其是地富兼营工商业者也进行斗争，甚至把药铺的药材没收了，医生也扣起来，把粉房的粉面没收了，猪也杀了。煤矿没有动，但把盐滩也分了，出现诸多矛盾。对军工烈属、统战人士，不加区别地予以斗争。

第五阶段，3 月 14 日—4 月 28 日，总结。

从斗争果实中拨救灾粮食 1235.5 石（缺马蹄沟、周家崓二区），救济了 7250 户 24214 人（缺双湖峪、苗家坪、周家崓三区），移民 7000 余人。由志丹运回 600 石粮食，用斗争果实购回粮食 256 石（缺两个区），六个区调剂籽种 188.33 石。

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纠偏工作。

县委为了取得经验，指导全县纠偏工作，于 1948 年 4 月初组织纠偏工作组赴周家崓区二乡试办纠偏工作。工作组有高树玉（县委宣传部长）、刘静（县委秘书）、吴祥山（周家崓区书记）、冯体康（县农会干事）等 4 人，高树玉任组长，于农历四月十二日开始，五月二十日结束，共 38 天。大体分改正成分、退还财物（包括粮食、青苗、反贪污）、调查研究街产问题三个阶段。

这个乡有 516 户，2435 人，土地 4482 垧，人均土地 2.25 垧。

改正成分，原定地主 12 户，富农 20 户；改定为地主 8 户，富农 14 户，富裕中农 4 户，中农 3 户，未确定 3 户。

承认错误，向错斗户赔礼道歉。

财物退还，凡属贪污与私自窃取的果实全部退出，业已变卖者由本人负责抽赎，或在应分果实内顶还；估分多分果实，处理同上；已分好的多分者看具体情况退分果实一半或三分之一；一般分果实户退四分之一，特别贫寒者免退；自

愿全部退还者只按其应退部分计算；随退随收随登记；退还果实价值高于应退部分，在已退还果实内补给；在可能范围内，归还原物；以乡为单位统一进行。退还被服 208 件，家具 255 件，银器 15 件，其他 4 件。对已分的粮食以打借条的形式退还部分。对部分青苗也予以退还。

退还粮食，一般以农会名义打借条，待后归还。

青苗，街产，根据实际情况，或退，或不退。

在周家砦区取得经验后，全县进行了土地改革纠偏工作。

1948 年 4—9 月，提高认识，强调团结，处理麦青。显著斗错户由原户收割，尽可能退还土地，据 5 个区统计退还 870 垧。确定不了是否斗错，收归农会，酌情或出租子，或对半分，5 个区共有 141 垧。

1948 年 10—12 月，执行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错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退还。9 个区，退还粮食 61 石，衣物 571 件，银圆 974 块，银子 227 两，银器 44 件，器具 255 件。

纠偏时确定在不损害斗争户日后的中农生活的水平下，以保证土地占有不低于当地中农的标准，进行补还调剂，1946 年购出的土地和土改中自愿献出的土地不再退还。只将 1947 年土改中斗出的土地财物进行退还调剂。在抽补的办法上一般是将斗争户成分审定后先召开座谈会，承认错误，赔不是，让他们诉说自己的冤屈，使其了解党的政策，和群众关系协调融洽时，征求意见，提出退赔要求。有的区乡干部上门认错，征求意见，对个别要求过于苛求者，予以耐心说服。比如裴家湾区逐乡组织纠偏委员会，请当地有声望人士参加，分头向斗错户进行说服工作。驼巷斗错户提出要收回 158 垧地，经几次说服后退回 98 垧，话说开、水拨开，达到

被错斗户的满意。

全县在土改中原定地主 505 户，纠偏后为 138 户；原定富农 602 户，纠偏后为 213 户；原定新富农 11 户，纠偏后为 60 户。退回土地 5043.83 垧，粮食 364.196 石，银圆 318 元，银子 133.6 两，衣物 745 件，器具 1144 件，驴 5 头，牛 17 头，羊 100 只，树 79 株，棉花 10 斤，布 7 丈，羊毛 10 斤。

驼耳巷区一乡定成分错得最多。共定地主 22 户，富农 24 户，纠偏后只剩有 1 户地主，1 户新富农，3 户旧富农，斗错 41 户。

对土地改革中，致死的人命案件，子洲县司法处也进行过追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裴家湾区四乡进士沟李良璧肉刑致死案的处理。李某等三人在工作组授意下，把曾当过乡长的李良璧用烧红的铁锨在其小腹和睾丸上烧、炼，用手绳多次捆绑，反复折腾，致他于 1947 年腊月初一死亡，他的成分起先定为富农，后纠为中农。

1948 年底，子洲司法处处理了这一案件。将两人逮捕，另一人逃跑。逃跑者后来也被抓获。1949 年 3 月，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3 年，另两人各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半。

1949—1950 年全县进行土地评产和颁发土地证、窑房证工作。截至 1950 年 5 月全县共登记土地 333715 垧（1001145 亩）。土改前后，农村人均占有土地对照如下：

	地主	富农	富裕中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工商业者
土改前人均占有面积（亩）	42.9	21.5	15	10.8	5.4	1.4	2.13
土改后人均占有面积（亩）	8	10	12.8	11.3	9	9	5

第三章 自卫战争

第一节 北线战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要加强边区北线工作，目标是榆横地区，为边区扩展地盘，取得更大的回旋空间。

西北局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北线战争，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起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晋绥联防军北线指挥部在陕北响水堡南面召开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指挥教导旅、新四旅、警三旅及部分地方部队，配合起义行动，夺取榆林。

1946年10月12日夜，横山石湾的国民党驻军保九团一大队官兵，在少校团副张亚雄、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和机枪中队上尉许秀岐的领导下，打开了城东暗道，让绥德军分区接应部队两个营入城，后经激烈交火，解放军兵分六路，控制了各制高点，包围了保九团团部，迫令所有抵抗者缴械。13日上午，国民党米脂、绥德、子长三县联合党部总书记叶秀卿等被俘。

13日晚，绥德军分区一个营从石湾抵达高镇外围，驻守此地的保九团中校团副秦悦文接到胡景铎的密信，要求其听从绥德警备区高朗亭副政委的命令，接受起义。于是，秦悦文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会，宣布起义。14日凌晨，秦悦文、吴

风德集合各据点 700 余人，迎接解放军入寨。之后，高镇周围小据点的国民党驻军也相继起义。

南殿寺（今电市）吴家园子国民党驻守部队也同时起义。吴家园子是国民党距离子洲最近的一个据点，经常和子洲县搞摩擦。

1946 年 10 月初，驻守吴家园子的李得福连长调离，由关中人王兆丰接任，此人年纪轻轻秉性强悍，号称双枪手，眉长过目，外号王长眉。10 月 10 日，县委派遣共产党员梁永珍和刘正功先后秘密潜入吴家园子村，告诉单线联络员、地下党员吴银贵、赵永成，要他们接应起义。10 月 12 日，解放军四六团某连白守芳连长奉命来到殿寺赵寨村策划攻打山寨，同来的还有李有益副营长。他们召集基于自卫队队长吴瑞高、赤卫队大队长高永明等十余人，在赵永雪家中开会，决定当天晚上包围山寨。天刚黑，周围各村的 500 多自卫军结集在山寨周围，兵分八路，每路有解放军 10 余人，向山寨靠近。进军中高永明不幸牺牲。13 日拂晓，山寨被包围，双方开始交战，整整打了一天。14 日，寨内火力加重，解放军的两个神枪手牺牲。15 日，解放军在山寨四周架起云梯强攻，王长眉只好要求谈判。后来接到高镇秦悦文的命令，王长眉才决定起义投诚，吴家园子才获解放。

横山起义获得成功。

北线战争，子洲县组建了动员委员会，先后动员基于自卫军 700 余名，战勤人员 24976 人次，担架 799 副，毛驴 5631 头次，设伤兵大站 4 处、小站 11 处，运小米 1043.96 石。

第二节 保卫边区

1947年3月4日，胡宗南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和董钊的整编第一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包围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3月13日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3月19日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进入延安空城。

4月底至5月初，胡宗南军队在老君殿、裴家湾、驼耳巷、苗家坪、双湖峪等处骚扰，群众深受其害。

8月，再次到达子洲西川境内，所过之处，门窗毁坏，鸡犬不宁。

4月底的骚扰尤其严重，人民群众遭受了重大损失。

县委书记任志新、县长李自修于5月27日作如下报告：

驼耳巷区：敌人走过一、二、三、四乡，二、四乡未受损失（因没有停），一乡走过老庄、牛兴圪塔、石窑畔等村，三乡自黄峁河以里，都有敌人走过以及住宿，这些村庄未坚壁的面、粮食（是群众的吃粮）都被敌拿光了，另外走时还捉了鸡，拉了驴。

裴家湾区：当（胡宗南军）从子长进攻绥德时，在一、二、五、六四个乡几乎住遍，一连住了两天两夜（当时正遇小雨不能走）。当由绥德往南撤时，三、四、五乡敌人从头到后尾的部队都住过一夜，裴区除一乡有几个村子未被敌人侵占外，其余的村庄被敌人抢的十室十空，一扫而光，现将

裴区的损失开列于下：（一）青年男人掳了一千余人，至今还有几百人未回来。打死杀死共 35 人，妇女大部被强奸，连 53 岁的乔老婆也没有留下，叛军李某的老婆也被强奸得现在炕上不能起来。（二）杀了耕牛 30 余头，黄土瓜全村共有 7 头牛，即被拉了 6 头，毛驴拉走的和杀了的共在 800（头）左右，仅六乡即被敌军拉走 120 余头。被敌军杀死的羊共千余只，羊头、羊肚、羊肠、驴腿、牛蹄子到处皆是，鸡全被吃光了，裴区现连鸡叫也很难听到，所以裴区现在不能生活的灾民甚多。

老君殿区：敌军往返两次，有 34 个行政村被遭扰（全区共 45 个行政村）所到之处十室十空，计群众损失吃粮两千余石，猪羊鸡全部杀光，羊 1349 只（原有 6000 只），驴、马 386 匹（原有 876 匹），柴草烧光，掳去的壮丁 120 名，杀死 4 人，强奸妇女非常普遍（尤其是大川各村庄）……

苗家坪区：五、三、二乡经过敌人骚扰……

双湖峪区：市镇乡敌人来了百余名，抢了一次东西，计有白面、黑面、鸡，具体数目字正在清查中。还拉了 10 余个青年，现大部跑回来，同时打死一个乔寡妇，丢下 3 个孩子。

3 月 21 日，子洲县人民政府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县人民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胜利果实，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3 月 31 日，中共子洲县委组织南川、周（家砦）高（家沟）区、石（窑沟）瓜（园则湾）区 3 个游击队。4 月，县自卫军大队部命令双湖峪、苗家坪、驼耳巷、马蹄沟 4 个区组织游击队，先后共组织 8 个游击队。其中，南川两个、西川 6 个，编制 180 人，并进行了多次战斗，为保卫边区作了应有的贡献。

老君殿区的游击队于 5 月 7 日午后，在四乡葛家河村与

敌人一个班发生遭遇战，经十分钟战斗，将敌军一班全部解决。班长当场被击毙，并抓俘虏9名，缴获中正式步枪7支，子弹535发，手榴弹13枚，枪榴弹5枚，手电筒2把，刺刀6把，枪榴弹筒1支，我游击队员1人挂彩。同日下午，在封家沟里，乡委员封治国同志捉敌人电话员1名，获得电话机1部，黑草驴1头，军用毡4块，信号红布5块（丈二长大面布）。总计敌人南撤时，老君殿区游击队员缴获步枪7支，子弹800余发，枪榴弹30个，弹筒1个，手榴弹70个，其他物资甚多。

裴家湾区游击队亦比较活跃，缴获敌军步枪3支，迫击炮弹二三十发，子弹、手榴弹很多，游击队员完全拿的是美国手榴弹。

苗家坪区游击队也获得一部分战利品，石窑沟区、瓜园则湾区游击队配合北线地方兵团作战，一部分去了横山。

5月，县委、县政府机关撤离双湖峪，到马蹄沟办公。并加强了南区（裴、老、驼）游击队，防备敌人再次北犯，其他游击队也在加强中。

8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刘景范签署命令：子洲县裴家湾区六乡指导员王振修同志，临危不惧，机智勇敢。敌犯绥德窜经该乡时，隐蔽山上捉敌便探二名。坚持岗位，不避烦劳。对我军过往部队，能在困难条件下适当保证各项供给，及时集中全乡牲口，完成运送伤员的紧急工作。据此，应予传令嘉奖。子洲裴家湾区三乡公民张林清，在敌人进犯该乡时，设计营救被俘乡长脱险，具有舍身保护革命干部的高尚精神。据此，应予登报表扬。

8月8日，县委紧急命令群众坚壁清野。8月10日左右，

中共子洲县委、政府机关撤离马蹄沟临时驻地，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和敌人周旋，8月31日，回到马蹄沟，照常办公。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结集在大、小理河川，一边整训一边待命，准备战斗。后来，一野打沙家店、打榆林的部队都是从子洲出发的，子洲游击队还配合了打沙家店和打榆林的战役。

第三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在子洲

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曾在子洲县的裴家湾镇邱家坪村、何家集镇高家塌村、马蹄沟镇巡检司村三个村庄居住过。

1947年3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清涧县枣林沟出发，到绥德田庄稍事休息后，周恩来副主席过了山西，毛泽东和任弼时率领党中央机关离开田庄，沿淮宁河西行，于3月29日凌晨到了邱家坪。毛泽东住农民邱朋明家，在这里住了两天。一次，他外出散步，问警卫员金武森累不累，金武森回答不累。他又问：“你愿意不愿意留在陕北？”金武森回答：“我愿意跟着主席，和陕北人民一起消灭敌人。”毛泽东高兴地说：“好！我们应该留在陕北，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把敌人消灭了。”

这天下午，任弼时同志把中央机关各大队和九团的领导干部召集到邱家坪半山腰的一条小沟里开会。首先各单位汇报了人数、装备、经费等情况，然后任弼时同志讲了话。他说明了敌人的情况和各个战场上我军的胜利消息，详细地分析了大好形势，论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意义。任弼时还传达了毛泽东

的指示：我们要在陕北坚持战斗，敌人爬一架山，我们也爬一架山，不消灭胡宗南匪军，我们就不过黄河。任弼时要求大家深刻领会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对战士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作长期打算，艰苦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做好群众工作。

本来中央机关要在邱家坪住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只好提前离开。1947年4月1日毛泽东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来到子洲县何家集镇高家塌村，毛泽东住农民高清国家。在这里，警卫战士找房东结算做饭用了的柴火钱，房东坚持一分钱也不收。毛泽东主席知道后叫给送点东西，于是战士们就给留下一盏马灯、一个挎包。当晚，毛泽东沿淮宁河西行。毛泽东在淮宁河川作五律《张冠道中》：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然塞上行。

8月1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靖边小河村，沿着大理河畔向东进发，进行长途行军。8月7日下午，从横山肖家崖村动身，来到子洲境内。这天下着雨，路上很难走，当走到阳峁时，小理河上有山洪，大家设法蹚过河，住在巡检司村。刚住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点起蜡烛又忙起来了。天亮了，战士们给毛泽东铺好被褥，想让毛泽东主席休息一会儿，可是毛主席却走到崖畔上，和房东傅守申老汉交谈起来。

8月8日毛泽东离开巡检司，继续东进。路过马蹄沟、双湖峪等地，晚上住在绥德县李家崖村。

（另一说，毛泽东3月31日到达邱家坪，4月2日离开。毛泽东8月4日抵达巡检司，住了三天后离开。）

第四节 周恩来副主席途经子洲

1947年4月4日，周恩来副主席从河东返回绥德，在绥德专员杨和亭的陪同下，一行7人，沿大理河西行，走到沙滩坪稍作休息后，到子洲县董家湾村询问了村子里的备战情况。周恩来还走访了几家农民，问：“小米、山药蛋够吃吗？”“粮食埋在山里是不是安全？”“基于自卫军都干些什么？”“会埋地雷吗？”

并询问了乡长，乡长回答后，周恩来鼓励乡长：“你是一乡之长，担子不轻啊！”周恩来对董家湾村的备战情况很满意，表扬王丕治同志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周恩来副主席到了双湖峪镇，据《汪东兴日记》载：中共子洲县委只有办公室主任一人看家，其他人员都疏散到山里去了。周副主席对办公室主任说：“你去把县长、县委书记找回来，我有事和他们商量。另外再想办法弄点东西给我们吃。”

晚上，子洲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来见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他们说：“敌人来之前县委机关疏散是对的，但主要领导不留下就不太好了。我在子洲县城的街上看到不少军人和伤员，应该把他们收容起来，组织起来。伤病员要组织人把他们送到野战医院去及时治疗。现在正是春天，要马上准备各种粮食，备战不能丢了生产。敌人进攻子洲县城是完全可能的，让县武装分队驻守在城内，保生产，保卫边区，看到敌人再走也来得及。县委领导更应留人指挥部队保卫县城人民的安全。”

据杨和亭回忆：

子洲县委的同志把周恩来迎到县委办公室的窑洞里。立时，窑洞里外挤满了人，周恩来笑容满面地向人们打过招呼以后，随便找了一条凳子坐下，听杨和亭汇报全分区的战备情况。当我讲到“一般群众已经准备好疏散去向，粮食已经坚壁并保证部队供应，敌人若来了，到城里是个空城，到乡村粮食也找不到”时，他高兴地笑着说：“好啊！我们就是要动员老百姓，打人民战争，战胜敌人。”

子洲县的同志也把他们的工作作了全面汇报。其后周恩来便作形势报告。他讲道：“蒋介石、胡宗南动员 20 万军队，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发动猖狂进攻，进占了延安，妄图一举吃掉我们。但是，他占的是一座空城。青化砭一仗，我们旗开得胜，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李纪云，给敌人一个响亮的耳光。现在，从战略上看，敌人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从兵力上说，敌人兵马多，我们的兵力少。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敌人像野牛一样，闯进了我们陕甘宁边区，他进来容易，出去难，我们把他放进来，目的是要将他消灭。在我们边区的北线，国民党的二十二军是杂牌军队，他们同我们的关系还搞得不错，没有配合这次对我们边区的大举进攻，只是在边界扰乱袭击。这说明国民党打内战，他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周恩来还特别讲道：“我们要把群众的工作进一步做扎实，把战争的形势、政治斗争的形势给群众讲清楚。告诉党员、干部和群众，不要怕暂时一县、一镇、一村的丢失，更不要怜惜打烂坛坛罐罐，这是小事。我们要的是大的胜利，也就

是要把胡宗南匪军全部消灭在陕甘宁边区里，把胡宗南的老窝西安解放了，这才是大事情。必须把这些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同时要组织群众武装，把民兵游击队搞好，配合主力部队打游击，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想办法消灭敌人。”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指示：“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和革命群众长期斗争经验的结晶。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干部、群众，才能支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并取得彻底胜利。各级党委要特别加强党的组织工作，革命战争中，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战争是打不好的。无论县委、区委或支部，都应该成为战斗的堡垒。”

晚饭后，杨和亭陪同周恩来去双湖峪小河沟三里路村休息。大家劝周恩来早点休息，他却将杨和亭等留住，又交谈起来。他问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的工作情况，又问到疏散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正在这时，米脂中学教务主任赵亚农来找，交谈了学校情况后，周恩来指示米脂中学、绥德师范两个学校，各抽调 40 名学生，参加战地医院的护理工作。赵亚农欣然接受，回去后，两校很快就组成 40 人的队伍，到部队医院工作去了。后来，这些同志大都成为医务战线的领导骨干。

接着，杨和亭向周恩来汇报：“地、县的一些干部家属、学校、托儿所、医院，还没有安排好。由于过去给晋、绥那边增加过不少负担，现在不好意思去了。”话已出口，他又觉得很后悔。因为周恩来日夜操劳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大事，自己却把这点困难在他面前讲出来，多么不应该呀！正当他感到不安时，周恩来开口了：“那怕什么，都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该过黄河的就要过去嘛。”说毕，顺手取笔铺纸，

写了五六封信，亲自安排，把杨和亭提出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这时候，毛泽东来电，请周恩来到子长、靖边、横山县交界处的青阳岔、卧牛城一带会合。周恩来看完电报，神情格外兴奋，询问去青阳岔、卧牛城的路线，杨和亭仔细作了介绍之后，便请他早点休息。

第二天一早，杨和亭来到周恩来的住处，看到他已在院子外面同群众谈话。他又在了解群众生活情况，以及有多少人参军，等等。

早饭后，杨和亭和周恩来乘马返回子洲县委机关。刚到县委，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裴仰斗来报告：“有三十几个武装人员，说是教导旅的一个排，我们怀疑是敌人派来的武装侦察，便包围起来了。但他们拒不缴枪，还说‘人可死，枪不能缴’。”周恩来听后就说：“请那个排长来，就说我在这儿。”

那个排长一听说周副主席叫他，高兴地跑来了。走进门见了周恩来立正、敬礼，报告说：“我是教导旅的侦察排排长，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找主力部队路经此地。”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小伙子，坐下。”那个排长还不好意思坐，周恩来便热情地拉着他的手坐下了。排长把教导旅的情况，他们完成任务的情况，以及掌握的敌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很满意地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还有一件任务交给你们，能不能接受？”排长站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请周副主席指示。”

“我们要去同毛主席会合，但是只带了五六个人，请你们护送一下。”

“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好吧！那你们先去吃饭，饭后休息一下，准备下午出发。”周恩来说完，那个排长高兴地出去了。

下午，周恩来快要出发了，还特意叮嘱杨和亭，要把民兵游击队搞好，加强侦察，把敌人的情况了解清楚，及时用电台向中央反映，并鼓励他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做好战备工作。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大理河流水潺潺，川道里柳吐新翠。春意盎然的双湖峪街头，周恩来骑上大红马，向人们频频招手之后，沿大理河川西行。当晚住在周家崓镇（一说住巡检司），第二天才离开了子洲。

第五节 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 习仲勋、林伯渠在子洲

1947年，在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也撤离延安，在陕北各地流动办公。6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住子洲县封家峁农民惠维存家。6月11日，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率边区政府来到了马蹄沟区张圪崂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也驻到水浇湾村，陕甘宁晋绥边防军司令部驻在张圪台村，边区群众报社驻在柴家圪崂村，边区政府随军医院驻在清水沟村，边区政府被服厂在吴家沟村，再加上转战陕北的随行人员与警卫部队，马蹄沟，一时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中心。

6月13日，《边区群众报》将四开四版的油印报，正式改为八开四版的铅印报。

6月中旬，林伯渠主席主持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对

政府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撤销总动员委员会，将战时动员工作划归民政厅统一领导。大力加强兵站工作，由其统筹安排和实施战时转运供给。月底整编工作结束，边区政府后方党政机关总人数为 3746 人，较 1946 年减少 5038 人。

整编后，针对胡宗南部队在老君殿、安塞、志丹等地的“清剿”破坏活动组织群众反“清剿”。西北局于 6 月 18 日，发出《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

6 月 27 日，林伯渠主席撰写的《为前线立功》在《边区群众报》发表。文中说：“在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的伟大人民自卫战争中，每次战斗的胜利，都涌现出成千成万的战斗英雄，为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劳。在后方为了保证前方胜利，边区人民在担架、运输、救护伤兵、供应粮草、反特锄奸以及生产节约、土地改革等战时工作，也开始涌现出一些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但与前方主力部队的作战功绩相比较，则仍有逊色，甚至赶不上战争的需要，落在战争发展的后面。须知战争是全面的、长期的、艰苦的，要彻底消灭蒋胡贼军达到最后胜利，就必须动员所有人力、物力，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人人立功，事事立功。”

7 月 1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联合在马蹄沟水浇湾村驻地山坡下的大槐树前召开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6 周年。会议由马明芳副书记主持，林伯渠主席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后说，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

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我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号召全体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在讲话中从党与群众的关系讲起，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

7月9日，林伯渠主席和夫人朱明，在马蹄沟临时驻地，接见了出席子洲县人民政府召开的教师会议的全体人员。

7月15日，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林伯渠主席在《发刊词》中写道：

陕甘宁边区，在十年相对和平时期中，曾经在各种建设方面，获得良好的成绩，是值得我们宝贵和重视的。经过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应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地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战争的考验。

事实已经证明，凡是能了解群众实际生活和要求，研究上级指示，总结新的经验，在战争中必有新的创造，工作也有很大转变和发展；反之，则工作无进展，甚至使人民受到

很大损失。

《边区政报》就是适应这一情况和需要出版的：

一、《边区政报》必须适应迅速转变的客观情况，抓住以战争为中心而产生与发展的各种新事物，如在前线上，在后勤中，在战争、生产、土地改革及各地游击战争、反“清剿”中，它应成为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提示教训，帮助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提高能力，推进工作，在战争中开展立功运动的一个武器。

二、为着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本着“大家办大家看”的方针，成为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大家的刊物。因此，给政报写稿，把政报当作经常学习文件，组织讨论，随时提出意见，充实改进政报的内容，应是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更应组织领导进行。此外，政报应广泛搜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来不断地加以改进，使其真正能够和每一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以不断改进自己来推动边区政权工作有力的前进。

《边区政报》创刊号，特别登载了一篇有关子洲担架队的通讯。

7月29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西北野战兵团在马蹄沟位于新民寨三城的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兵团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贺龙、张宗逊、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王政柱、廖汉生、王震、罗元发、张贤约、黄振堂、黄新庭、余秋里、王尚荣、朱辉照、顿星云、杨秀山、郭鹏、李铨、王邵南、洗恒汉、张希钦、王恩茂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敌情通报、各纵队的情况介绍、各战略

区情况、晋绥与陕甘宁统一等情况介绍，就落实“小河会议”精神，如何进攻榆林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作了详细研究部署。在彭德怀、贺龙讲话之后，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略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有利于西北野战军今后发展。”彭德怀司令员在总结时又特别指出：“榆林战役的主要任务是诱敌深入，是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及陈赓纵队南渡黄河，打乱敌人的整体部署。我们拖住了胡宗南的主力深入榆林，就有利于陈赓纵队在陇海线上站住脚和发展。”

7月底，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进攻，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单位，相继离开马蹄沟，经过绥德等地东渡黄河，前往山西碛口高家坪。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习仲勋、马明芳和西北局党组及后委党组成员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边区政府李鼎铭、刘景范、霍子乐、霍维德、贺连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阎揆要、张仲良、张经武与边区群众报杜桴生、胡绩伟、曹国兴等都在马蹄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第六节 支援前线

支援军队和政府，是子洲人民的光荣传统。1946年，子洲人民就给政府运粮运炭，动员畜力1587头，做军鞋6993双。

1947年，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本县人民在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领导下，以《陕甘宁边区人民战时服勤暂行办法》为宗旨，掀起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战勤支前热潮。全县参加支前的民工55000人，动员畜力23000头，部队所需粮食、衣服都是人民冒着生命危险运送的。当时家家户户不分昼夜为战士赶做军鞋，仅1946年12月至1948年4月就交送军鞋51002双，共需女劳力20276个，按细粮折价2550石（每双军鞋折4个女工，每个女工折1升细粮，每双军鞋材料费折1升细粮）。仅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本县6个区（全县9个区）战勤负担人工408852个，畜工165365个，共折细粮6557.495石，全县每个劳力负担0.4石（当时每个人工折细粮1升，畜工1.5升）。群众支前时，常遇敌机轰炸，敌军冲击，人畜时有伤亡。据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间统计，全县支前人员就有15人死亡、6人受伤，还有19头牲畜死亡。

战争时期，民兵还配合部队侦察敌情，押送俘虏，查获敌探，追捕逃散敌兵等。凡敌人进犯之前，全民动员坚壁清野，使进犯之敌寸步难行。现将1947年1月—1948年8月战勤担架运输统计表摘载如下，可窥一斑：

种类	时间	人数	天数	担架副数/运畜头数
担架	长期	4208	145076	66
	短期	3252	46854	546
	临时	27475	86937	3473
	合计	34935	278867	4084
运输	长期	1188	51100	1253
	短期	3775	61056	3867
	临时	15978	99154	18809
	合计	20931	191310	23929
总计	—	55866	470177	—

（备注：当时子洲县人口 119546 人，户数 24781 户，男女劳力 46921 个。）

其中有代表性的担架队是刘伏昌率领的子洲县担架队。子洲县担架队完全拨给四旅，共 120 副。1947 年 5 月 27 日在已有 9 个区集中，5 月 28 日出发，顺利完成了任务。

南线战役中，子洲县动员了 70 副担架，共 420 人。一星期内就逃跑了 349 人，占总数的 83%；服务到底的只 71 人，占总数的 17%。西线战役中，子洲县又动员了 110 副担架，服务 51 天，逃跑的只 29 人，占总数 493 人的 5.8%。期满回县时军队特奖马 2 匹，驴 3 头，长枪 12 支，子弹 200 发，手巾 39 条，帆布 43 块及衣服被褥很多东西，并给二中队队长刘伏昌同志（马蹄沟区副区长）写了一封信：“刘区长：你带的二中队是最好的模范，你老汉很吃苦耐劳，特奖马一匹，枪一支，你有何困难希提出，我们愿帮助解决。”二中

队荣获模范担架队的称号。其模范事迹主要表现在：（一）队员工作责任心强，不仅完成最好的担架队员任务，而且完成最好的护士任务。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常不等战士把伤员从火线上拉下来，就冒着敌人的炮火前去抢救；在转运时，表现非常耐心、细致和恳切，把自己的被褥给伤员垫，袜子给伤员枕，干粮给伤员吃，真是问寒问暖，像兄弟一样。因此伤员说：“至死忘不了子洲担架队的恩情。”（二）队员爱民工作做得好，曾先后在曲子、环县等地帮助群众收割菜籽 45 亩，锄草 78 亩。发现随便拿碗、打盆、要油盐等行为，立即制止并给予赔偿。因此群众也就纷纷自动送酱、醋、蔬菜给他们。

1949 年 5 月，解放大西北时，全县又组织了 110 副担架、612 名担架员，随军参战半年，受到部队的嘉奖，凉州解放后胜利归来。

1947 年，本县先后有 2500 余农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进行了归队工作，1948 年 7 月，县委发出关于战士归队的通知，动员离开部队的战士归队。至当年底，全县离队的 883 名战士有 423 名归队。

1948 年 4 月 24 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抽调干部去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到新区工作是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也是老区党组织的长期的重大任务。本县先后抽调 257 名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后来还抽调了一些。这些干部，服从组织分配，抛妻别子，奔赴陕西关中、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开展工作，解放大西北，后来大部分定居大西北，成了建设大西北的骨干。他们积极工作，为大西北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也光荣牺牲了。

第四章 党的建设和区划变动

第一节 党的建设

1946年8月3日，为加强子洲县的保卫工作，绥德地委决定成立子洲县社会部。

1947年，伴随土地改革，中共子洲县委也进行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风。

1947年5月4日，根据中共西北局指示，中共榆横特委在米脂卧羊区柳家圪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河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高风山、杜秉德。工委下辖四十里铺、沙滩坪、双湖峪、苗家坪4个区委，各区都有一个游击队。由于战争时期，变化很快，河西工委仅存在20余天即撤销了。

1948年冬到1949年春，对农村支部进行了整顿，运用党内外民主相结合的方式，纠正与暴露了党内存在的一切自私自利、违犯法令、欺压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错误思想及行为。清洗了一批思想落后、作风恶劣、不可救药的坏分子出党，解决了212件党与群众关系的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

1949年4月28日—5月2日，中共子洲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双湖峪镇召开，大会应到代表53名，实到代表40名，代表全县1750名党员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子洲

县第一届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9名，候补委员2名，选出5名县委常委，选王生源为县委书记，并选出8名出席绥德分区党代会的代表，做出了发展生产、加强干部学习的决议。由于大量干部外调，从农村补充了不少干部。据1948年统计，子洲的在职干部66%是刚从农村提拔上来的，85%是新提拔的。提高干部素质是当务之急。大会决定，提高干部质量是提高工作的中心环节，要举办轮训班、兴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把干部的业务、政策、文化理论水平提高一步，并且来一个学习大竞赛，看谁学得多，看谁学得好。同时，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

对农村支部的建设，也提出意见。特别要求加强农村党员的教育，依据农村党员生产的具体情况，规定切合实际的学习与教育制度。如建立党日制度，定期上党课、读报，开讨论会。附近有民校、冬学、完小的地方，党员应该积极主动地到夜校、半日班中学习，区乡干部应该成为农村党员的教师。

全县有2313名青年、妇女、工人，分别参加自己的团体，但总量还很少，分布也不平衡。要求加强领导，壮大力量，健全干部组织生活。特别要求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方针，实行“工主兼顾的股份制度”，教育盐工、炭工，戒除不良嗜好，减少浪费，积蓄资本，扩大再生产，提升工人生产技术，改善工人公共福利，组织正当的娱乐活动。

子洲县于1946年成立妇女联合会；1947年开始筹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子洲县委员会；1948年冬天至1949年春天，分别召开了青年、妇女代表大会。1949年3月，全县

826名盐工中，有盐工分会8个，652名会员；431名炭工中，有炭工分会4个，235名会员；110名教育、银行、自给工厂等工人中，有107名会员，合计会员994名。5月，子洲县工人联合会成立，主任李茂植。

中共党组织逐年得到发展。1945年，有支部69个，党员1392名；1946年，有支部74个，党员1616名；1947年有支部75个，党员1864名；1948年有支部55个，党员1652名。1949年9月30日，中共子洲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有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下辖9个区委，63个党支部，有2166名共产党员。县委书记杨崇明。

子洲县人民政府设秘书处、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建设科、公安局、司法处、武装科、税务局、邮政局、粮食局、县联社。县长由刘直卿代理。

1949年5月5日，经中共西北局批准，在延安王家坪成立中共陕北地区委员会、陕北行署和陕北军区。机关驻地王家坪，区委书记李合邦，行署主任曹力如，司令员张达志（未到职）、吴岱峰，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人民政府分别归属其领导。

第二节 区划变动

1946年秋，武家坡、李继先、复兴3个区及水地湾、殿寺等地相继解放。武家坡、李继先、复兴3个区都划归横山，水地湾、殿寺和高家沟等组成高家沟区归属子洲县。子洲才真正有了原属横山的地域。其时共有10个区。1948年8月，

根据专署之决定，又将石窑沟区和高家沟区的两个乡划归横山县。8月22日，由子洲县政府呼宗佑同志、横山县委林里同志及石窑沟区区委区政府全体干部同志一块办理接交事宜。子洲县划拨给横山8个乡概况如下：石窑区6乡10779人，男全劳力2293个，女全劳力1548个，土地52596垧，驴1260头，牛80头；高区2乡3412人，男全劳力663个，女全劳力652个，土地13071.5垧，驴68头，牛29头；合计8乡14191人，男全劳力2956个，女全劳力2200个，土地65667.5垧，驴1328头，牛109头。

划出高家沟区的两乡和石窑沟区后，新组建了殿寺区，当时有裴（家湾）区、老（君殿）区、驼（耳巷）区、苗（家坪）区、双（湖峪）区、马（蹄沟）区、周（家崓）区、殿（寺）区、瓜（园则湾）区等9区，52乡，240个行政村，833个自然村。

1949年2月，又划出老君殿区所属的第6乡，共31村，归子长县管辖。划出土地8415垧，窑429孔，房子37间，马棚121间，共划出去的户数344户，共划出人口1989人，男1024人，女965人。男劳力263个，女劳力144个。军工烈属77户，人口168人。成分：贫农285户，中农33户，富裕中农24户，富农2户。牲畜：牛74头，驴52头，羊182只。形成子洲县现在的地盘。

1949年9月30日，子洲有裴（家湾）区、老（君殿）区、驼（耳巷）区、苗（家坪）区、双（湖峪）区、马（蹄沟）区、周（家崓）区、殿（寺）区、瓜（园则湾）区等9区51乡。

第五章 恢复生产 医治战争创伤

第一节 生产救灾

1947年，子洲县遭受了春旱、秋涝、雹灾、霜冻等自然灾害，有9个区26个乡遭涝灾和冰雹，15.45万亩耕地颗粒无收。涝后霜冻提早而来，跌下年馑。加之胡宗南进攻陕北，侵害了不少粮食，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人心惶惶。1947年冬，还勉强可以度日，1948年春，不少地方的群众没有粮食吃，陷于饥馑之中，尤其是瓜园则湾区、石窑沟区、高家沟区，灾害更为严重。大、小理河畔的榆树皮被剥吃一光，不少灾民逃荒。全县有灾民52512人，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灾民嚼草研骨、身体瘦弱、浮肿，以致疾病流行。龙尾峁村（现属电市乡）31户农民有20户40人患病，其病状有出水、出斑迹、流鼻血、打摆子、吐黄水等多种。

4月18日，县政府根据陕甘宁边区的救灾方针：“组织起来，团结互助，生产自救，并辅之以政府赈济”决定每乡都成立救灾委员会，各行政村组织救灾小组，广泛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党员、干部、群众认识灾荒的严重性，树立必胜的信念，稳定人心，鼓励群众。

政府分三个阶段救灾。第一阶段，动员移民，村干部带头，政府供给路费，全县共有2109户、9215人迁徙至山西、延安南路等地。第二阶段，组织群众互相调剂，互相帮助，

由政府发放救济粮。瓜园则湾区王家沟劳动模范杜修枝给 46 户灾民救济粗粮 3.939 石，糠 33 袋等。政府成立募捐委员会，各区各机关共募捐小米 2.285 石，麦子 0.555 石，衣物 34 件，鞋 50 双，毛巾 72 块。政府发放救济粮 4716.2 石，其中 341.862 石是从群众中调剂的。去冬到今春，先后在山西隰县、本省志丹、吴堡、绥德龙湾运粮 1541 石，群众调剂土改斗争果实 4449 石，拨给 11639 户、52512 个灾民。第三阶段，生产救济，组织变工抢种地 39608.7 垧。虽多方救灾，仍有 3497 人浮肿，754 人死亡。

大乱之后，必有虎狼。1948 年春天，山间野狼猖獗，咬死 23 人，咬伤 57 人。1949 年春天据 4 个区统计，咬死小孩 14 人，咬伤 23 人，咬死咬伤牲畜 120 只。

县政府向上边请求派遣打狼队，还派人带领警卫战士打狼，各区政府将防雹组转为打狼组，带枪上山生产，打死大狼 3 只、小狼 16 只。

第二节 恢复生产

经过近二年的战争，全县生产停顿，满目疮痍。耕地面积由 312370 垧减少为 299137 垧，牲口由 9023 头减少为 6066 头，劳力由 27995.5 个减少为 18394.5 个。县委和政府千方百计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让各项事业皆不同程度地有所恢复，有所发展。在子洲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上，作出了发展生产的决议。指导思想是：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子洲 90% 以上的农业人口，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不能忽视近 1 万人的盐、

炭业与相当普遍的运输、纺织等副业生产。

第一，在农业方面今明两年以恢复为主，完全战胜灾荒，达到战前水平。

通过允许土地财产自由买卖、典、押、转让、雇工经营及在特定条件下（如丧失劳动力、从事工业运输等）的土地出租，允许私人借贷，利息双方自由议定等政策，提高各阶层生产情绪，树立劳动致富思想。

大力发展劳动互助，以贫雇农、中农为主体，团结与改造地富二流子，团结广大农村妇女等，发动一切可能参加的劳动力到生产战线上来，普遍提倡季节性的小型变工，逐渐地将其转化向长期发展，在两年内争取20%—25%的劳力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实际的而不是形式的，参加到劳动互助组织中来。农村党员应该成为一切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等的积极参加者、组织者、领导者。

实行奖励政策，对繁殖牲畜、发明工具、改良作务、发展劳动互助、兴修水利、兴办合作社事业等有显著成绩的农民、干部，利用各种形式（口头的、物质的、书面的）在大会上、小会上给予奖励。

农贷必须保证发放在扶助合作社生产事业、帮助农民解决生产困难等方面，必须有借有还，纠正过去某些农民把农贷看作是救济，认为借了可以不还的错误观点。

继续贯彻新农业税政策，修正评产，统一税率，刺激提高生产。

第二，盐、炭业方面。目前着重发展炭业，政府应采取私营公助、公私合办等方式扶助之，以适应人民生活消费与盐业生产的需要；盐业因土改中未认清其剥削性质，平分盐

地的结果，相当影响开采事业的发展，同时必须认清盐工获得盐地后，其生产积极性则较前提高了，今后发展盐业应首先从教育工人减少浪费，积蓄资本，合力扩大再生产，尽可能地改良生产技术，改善工人的福利事业等方面着手。

第三，副业方面。应该以运输、纺织为主，发展组织运输合作，提倡推广小型大车，提高运输力，加速物资流转。在家庭纺织业方面，近年来有飞跃的发展，能自给外，尚可外销，今后应注意提高纱、布质量，组织手工纺织合作以保证在关内贸易中、自由竞赛中，不受到淘汰，仍能获得正常发展。

第四，国营生产。现有的国营生产的基础是薄弱的，生产技术是落后的，但它却有着伟大的发展前途，在整个国民经济上居领导地位，领导上应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应先从扩大经营，合理管理，减低成本，提高质量入手，争取逐渐提高。国营商店，不能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还应通过市场，与投机商人做斗争，同时扶助合作事业、小手工业生产者向前发展，扶助有利于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国营生产商业部门的共产党员应安心工作，应特别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的商业政策，把自己的政策水平提高一步，以适应发展生产的需要。

第五，合作社。合作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是我们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渐走向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要提高农业生产，单靠党政机关在行政上的指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经济上的指挥机关，这个经济上的指挥机关之一就是农村的生产供销合作社。毛泽东主席指示我们：“谁要轻视与忽视这一点，谁就要犯极大的错

误。”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子洲普遍组织过生产的、消费的、信用的许多合作社，先后都垮台了，给社员以很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地损害与打击了人民与干部兴办合作社的勇气和信心，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子洲不能办合作社了。相反应当虚心地领受这一失败教训。我们认为：过去西北局领导合作社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主要的缺点在于当时党政领导上犯了急性、冷热病，先则强迫包办（强迫入股，包办业务），继则放任自流。在合作社干部使用上强调才，忽视德，任用了不少商人办合作社，他们缺乏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只知投机非法生意，从中肥己，正确的业务方针不能通过他们贯彻，以致遭此恶果。今后发展合作社，应先理清旧的，催收拖借，追查贪污，争取挽回影响。然后从试点出发，逐渐推广，在群众有迫切需要，并有积极分子做骨干的地方首先建立试点，待取得经验在群众中建立信仰后再来求普及。合作社的唯一任务，应当是协助社员生产，保护社员利益，减轻与避免商人的剥削。它必须将比较廉价的工具与生活必需品供给农民，又以公道的价钱收买与推销农民的副业生产品与工业原料品。必须防止投机商人一样剥削群众，以营利分红为唯一目的的错误做法。党政机关今后应派得力的干部，到合作社去工作，学习做生意，但不是学习如何像商人那样剥削农民与小生产者，而是学习如何减轻以至免除这种剥削，以便合作社树立强有力的领导骨干。党政领导应加强对合作社干部的政治领导，谨防意志薄弱分子在政治上、生活上作了商人的俘虏，陷入腐化堕落的圈套。政府必须在合作社的基金、税收方面给予优待，一切国营经济部门，特别是贸易公司

把扶助合作社的正当发展，应看作自己的基本业务。

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生产很快得以恢复。

1949年，荒地减到最低程度，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1%。土地改革纠偏，稳定了各阶层的情绪。76%的乡村基本完成了评产工作，并在评产的基础上实行了按常年产量、按比例征收的新农业税政策，使公粮负担趋于公平合理。

评产工作。全县52个乡，细评了39个，粗评了13个。根据8个区（缺老君殿区）的统计，山地共269332.756垧，评粗粮116193.244石，平均每垧地0.4314石；川地8712.322垧，评粗粮10221.523石，平均每垧地1.1732石；水地928.189垧，评粗粮2188.244石，平均每垧地2.358石。山、川、水地合计，每垧平均0.461石。实际确定平均每垧地0.43石。

继续组织群众变工协作，发展农业生产。1949年全县组织了477个互助组，互助组坚持自愿结合原则，规模几户到十几户不等，有1908户农民、2009个劳动力参加变工。同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通过组织二流子参加变工队、制订村民公约等办法改造二流子，全县有138个二流子，163个半二流子，其中75个得到改造。1949年，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为32.63万垧（97.8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30.51万垧（91.52万亩），占93.5%；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1.02万垧（3.06万亩），占3.1%；蔬菜、瓜类等其他农作物1.1万垧（3.3万亩），占3.4%。1949年，粮食产量达到77222.2石，比1948年增产7200石，人均粗粮0.729斗（4032万斤，每亩产量44斤，人均占有粮380斤），但是，仍未达到战前水平。

扩大盐业、煤炭生产。1949年，有盐井137口，工人893名，产盐8287石（1653吨），合计可收入小米4143.5石。仍比战前的平均年产2000吨少。1949年，有炭工451人，原煤产量15830吨，收入小米2400石，接近战前水平。

广开门路，进行副业生产。一是搞运输。全县有长脚240头，短脚514头，长脚每头能赚米4石，短脚每头能赚米1石，合计可赚米1474石。二是组织妇女家庭纺织，扩大规模。全县有纺妇16451人，织妇6605人，每人平均纺线10斤，合计纺线164510斤。能织布（3斤织1匹）54836匹，纺妇以每天赚米2升计，织妇以每天赚米3升计，合计赚米4938石。还有其他副业，比如三皇峁办起纸厂一处，有3名工人，可赚米14石。

总计，各项副业生产赚米12969.5石，占农业收入的29%弱。

商业的恢复。胡宗南进攻陕北，兵荒马乱，加之自然灾害，双湖峪、马蹄沟、老君殿、周家砦等集镇的大部分字号累赔歇业。由于战争和经营不善等原因，1948年，合作社亏赔，入股1斗米退6升，合作社改称工业事业合作社（简称工合）。1949年，恢复创立了5处合作社，共计供给棉花22220斤，推销线子9509斤，布1698匹。因为有了合作社，生产者才能积极生产。比如周家砦的姜生清，原有织布大机一架，因没有线子停产，周家砦供销社供给他线子、收买土布，他才能大量生产，并由一架织布机增为四架。不少私营商铺也重新开业，工合也得到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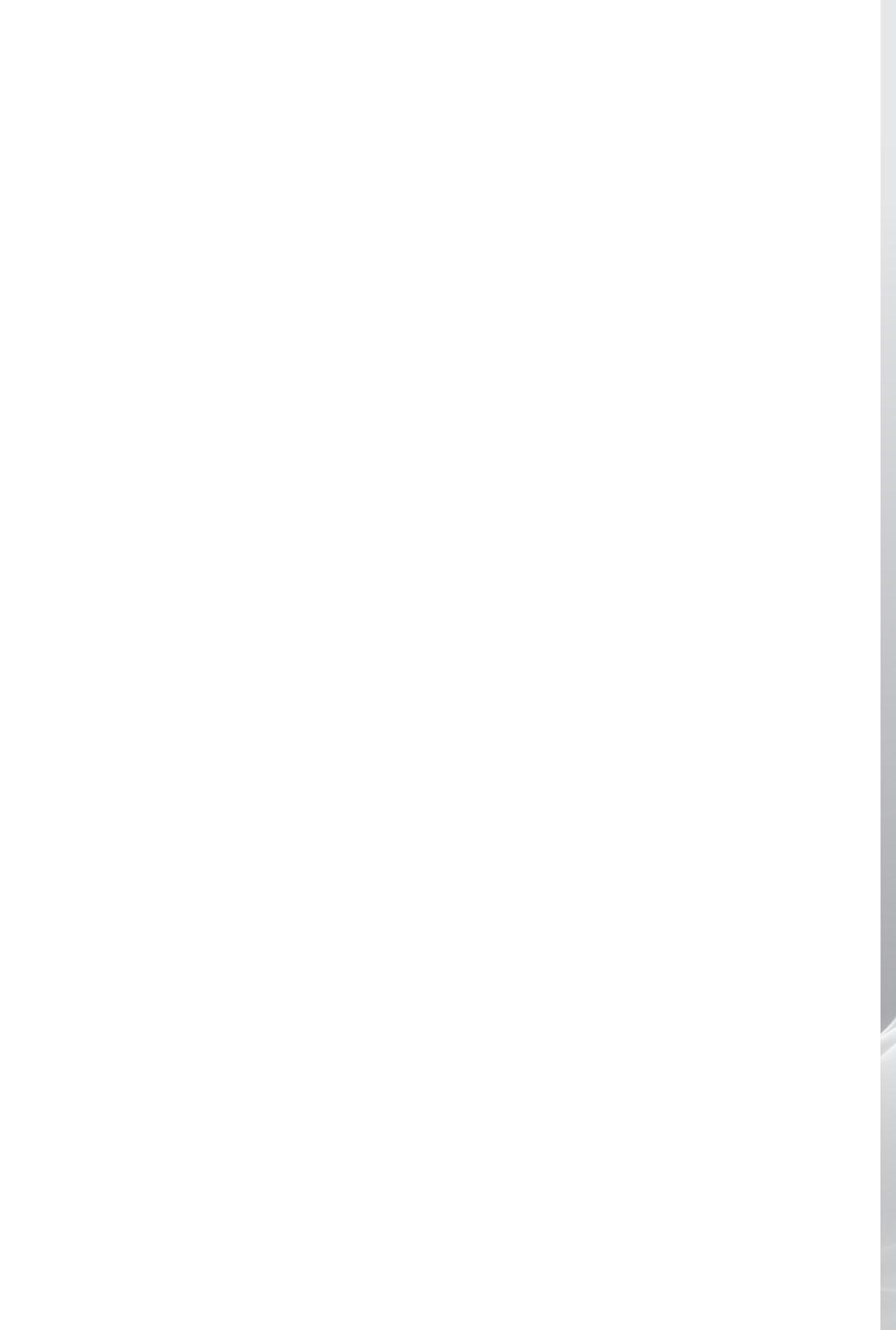
邮政事业有了发展。早在绥西办事处成立后，就在双湖峪成立了邮政代办所，1948年，分别在周家砦、苗家坪、

马蹄沟设立邮政代办所，1949年成立子洲县邮政局，方便了群众。

学校逐步恢复，教育缓慢发展。1947年，由于战争，学校停课，教师转移到山西。1948年5月，全县教师从山西返回，积极筹备复课。9月，全县已恢复学校20所，在校学生934名，比战前减少32所，学生减少1173名。1949年，恢复学校31所，其中完小5所，普通小学11所，民办小学15所，在校学生1586名，仍比战前少521名。

1949年，全县兴办冬学118处，有学员2012人，同时还办起夜校、妇女识字组等，好多区有了文艺宣传队。县民教馆也恢复文化活动。

卫生事业。1947年，胡宗南进攻时县保健药社随县政府迁至马蹄沟镇，医生转移，药物藏潜，遂停业。1949年，老中医高维岱于双湖峪镇重新办起保健药社，有医务工作人员7人，子洲有了唯一的公立卫生机构，卫生事业有了起色。



附 录

中共子洲历史大事记

1919年

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北京求学的李子洲（字登瀛，绥德城内人，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投身到这一运动中，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

6月下旬，李子洲等带领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了包围新华门总统府，向徐世昌请愿示威的斗争。

同年，李子洲利用放寒暑假的机会回家乡宣传五四运动，使科学、民主思潮波及本境。

1920年

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秦钟》月刊，李子洲负责发行工作。该刊刊登了一些宣传科学、民主内容的文章，共办了6期。

是年开始，本境不少富裕人家子弟到榆林等地上中学。

1921年

10月10日，北京大学陕西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呼延震东等联合在京的陕西籍学生，将停办的《秦钟》更名为《共进》，改出半月刊，李子洲继续搞发行工作。

12月，李子洲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子洲是较早加入的会员，并且是一位活跃分子。

1922年

夏，在京就读的李子洲、呼延震东和在天津上学的白超然回陕北，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联名上书陕西当局，要求在陕北创办师范，经过力争，次年，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在绥德创办。

9月7日（农历七月十六日），芹园土匪李占魁率散兵土匪二百余人，围攻马家沟岔南寨子，40余人遭残害，地方日益不宁。

1923年

年初，李子洲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8月，李子洲应原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的邀请，到该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他协助校长改革教学方针，向学生讲授《新青年》等刊物上的文章，宣传唯物史观。

1924年

春，李子洲应杜斌丞之邀，到榆林中学执教，并任训育主任，他支持刘志丹等学生进行革命活动。

春，在山西汾阳铭义中学上学的本境学生李临铭在一个姓刘的教师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临铭是本境第一个共产党员。

春夏之交，榆林中学开办平民学校，本境学生刘景向曾

担任过该校的负责人。

夏，马蹄沟、三皇峁十里盐湾盐工三百多人，手持火枪、铁锹等工具，冲到三皇峁盐局，盐吏见势不妙，夺路而逃。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欲派兵镇压，经榆林杜斌丞周旋，此议才罢。

夏，李子洲被任命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大胆改革，聘用进步教师，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

12月上旬，在李子洲的指示下，共产党员王懋廷在绥德四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本境学生徐步墀、李棠安、王祖谋等在绥德加入青年团。之后，苗仰实、田庆丰、贺维新、韩士杰等也在四师加入了党团组织。

冬，陕北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绥德四师小组在四师秘密成立。党小组直属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有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田伯英任组长。

冬，绥德天足会到本境大理河川宣传放足，禁止妇女缠足，但禁而不止。

是年，槐树岔乡十垧坪的杜聿昌、马岔乡冯家渠的冯鼎臣到广东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1925年

6月，绥德各界人士联合救国办事处委派本境学生姬世道、高炎、李秉乾、栾本纯等8人，来大理河川筹划救国事宜。14日，周家崓、双庙湾、楼砭、水地湾、车家沟等学校学生和周家崓群众集会，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援“五卅运动”。

夏秋之交，本境榆林中学学生张逊谦受共产党派遣，同

刘志丹等人一道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

12月，中共榆林特别支部在榆林中学秘密成立，本境榆林中学学生刘景向担任支部书记。

是年，本境学生王俊让、周梦熊、周发源、刘景向、栾本植、师俊伟、张逊谦等人在榆林中学，加入中共党团组织。

是年，老君殿群众砸毁天主教堂。

是年前后，本境青年学生冯文江、安子文加入陕西的进步组织“共进社”。

1926年

1月，在北京中国大学上学的本境学生冯文江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2月，在榆林中学闹学潮被开除的本境学生周梦熊、周发源到定边高等小学任教，按照绥德地委指示，秘密建立了定边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定边支部，周梦熊任书记，汤中甫、周发源为干事。

4月，共青团清涧县第二高级小学特别支部成立，本境的青年教师景仰山是负责人之一。

夏，北京大学、绥德第四师范学生李棠安、王国治、叶玉荣、赵仰普、刘澜涛、贾拓夫等人，利用暑假来本境宣传马列主义。

秋，苗家坪高小学生下乡宣传成立农民协会。

冬，共产党员周梦熊在周家崓高小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呼“反对基督教！”“抵制英日货！”等口号。

秋，本境共产党员李临铭、贺维新准备到兰州上国民军干部学校，途经银川被组织安排就地工作。9月，他们在银

川市鼓楼建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特支书记，同时协助建立宁夏国民党党部，李临铭任常务主任。

冬，经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本境第一个中共党团支部在苗家坪高小（由绥德、米脂两县合办）建立，直属绥德地委领导。书记田庆丰，组织委员苗仰实，宣传委员贺维新。同时，发展田庆昌、景步哲等加入共青团，并建立了共青团苗家坪高小支部，书记田庆昌，组织干事郭步岳，宣传干事景步哲。

是年，本境共产党员李策铭、周梦熊、冯启明等人，到横山第一高等小学任教，宣传马列主义。

1927年

1月20—25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李子洲和本境的共产党员刘景向出席了这次大会，李子洲被选为执行委员，担任青年部部长。

5月，马文瑞领导学生在冯家渠小学闹学潮。

8月，苗家坪高小党团支部改为苗家坪党团区委，田庆丰任区委书记。

秋，周家崓高小成立共产党支部，书记先后为马象英、刘景向，1928年2月，因人员外出，停止活动。

10月，陕北共产党受到严重破坏，冯文江等人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绥德秘密恢复党组织，冯文江任恢复后的中共绥德县委书记。

11月，老君殿高小成立共产党支部，书记李宗白。翌年4月，扩建为中共老君殿区委。

冬，共产党员呼永华、呼永仁、周志新三人组建了李银

家沟党小组，翌年春，发展为支部，1930年冬，因白色恐怖严重，停止活动，书记先后为呼永华、呼永成。

冬，中共姜家崖支部成立，1931年2月，因绥德县委遭破坏而停止活动，书记张效良。张效良联系十里盐湾盐工，成立三皇峁盐工支部，发展党员14名，1934年因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

中共吴家山支部成立，书记吴生荣。1931年2月，因绥德县委遭破坏而停止活动。

是年，苗家坪、老君殿等地建立农民协会。

1928年

1月，中共绥德县委调高光祖到苗家坪高小任教，在西川双湖峪、三皇峁、周家砦一带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苗家坪镇南丰寨古庙里召开。

4月，中共封家坪支部成立，书记先后为王希勃、封营书。1931年2月，因区委遭破坏而停止活动。

夏，中共双庙湾支部成立，书记刘长华。1931年2月，因绥德县委遭破坏而停止活动。

7月，中共园子坪支部成立，书记马兴图。1931年2月，因绥德县委遭破坏而停止活动。

8月，中共李家渠支部成立，书记马华援。1931年2月因老君殿区委遭破坏而停止活动。

秋，中共绥德县委负责人呼永华、马文瑞、白明善等人在周家砦镇李银家沟创办平民学校，借教书之名，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0月初，米脂中秋节事件（9月28日，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党代会，被国民党发现，国民党从绥德调兵一营，包围米脂县城，杜衡等被捕，致使会议终止，即为中秋节事件）后，赵通儒、冯文江、杨国栋和另外几个代表到苗家坪小学（苗家坪区委驻地）召开临时特委会议，共商善后事宜。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并调白明善、霍世杰参加特委工作，还决定将苗家坪区委改称为中共绥德西区委，下辖10个党支部。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清涧折家坪。

10月，白明善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组织委员周发源，宣传委员赵通儒。中共绥德县委也搬迁到西川一带活动。

秋冬之间，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清涧折家坪迁到老君殿黑泉沟（原清涧第四高小）。

1929年

1月，白明善在李银家沟起草土地革命宣传材料。

2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机关被国民党陕西当局破坏，党团省委领导人大多被捕入狱，李子洲也被捕。他在狱中坚持革命斗争，坚贞不屈，在敌人的迫害下，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疾病加重，不幸于6月18日逝世于狱中。

2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张家岔（原属绥德县，今归子洲县马岔乡）柳迎培家召开。会后，特委机关迁往榆林。

春，中共景家沟支部成立，书记郭步荣。冬天，因王三海叛变，支部遭破坏。

春夏之间，因去岁大旱，灾荒严重，本境群众饿毙于道，惨不忍睹，不少贫苦农民卖儿鬻女，逃荒山西，据记载，仅

米脂西北即在 500 人以上。绥德、米脂皆组织“饥民自救团”，本境贫苦农民也到处“吃大户”。

初夏，在共产党员李景林的领导下，由张宗贤、张建财领头的数百名十里盐湾盐工，包围三皇峁盐局，放火焚烧盐局门窗，盐局官员哀告求饶。在乡绅栾茂青调解下，盐局局长签名呈文减税，盐工斗争获胜，方散。

是年，周家崓学生驱逐基督教教士。

1930年

2月，本境的景仰山（又名景宪瑞）担任中共府谷县委书记。

秋，中共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到安定任家砭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担任党的区委书记。翌年1月，中共安定县委成立，他任县委书记。

是年，共产党员郭步荣、李仕刚、郭步斗在三眼泉、楼砭、叶家圪崂等处组织“提灯会”集会游行，学生高呼口号，反对国民党军阀。

本年至1932年，本境先后三次流行线性鼠疫（俗称新症浪），波及现在的17个乡镇（仅瓜园则湾乡未出现）139个村庄发病人数2370人，死亡约2120人，以石灰峪、郭家畔、钟家崓最为严重，村庄人口死亡半数以上。

1931年

2月，中共绥德县委遭到严重破坏，本境的共产党组织大多停止活动。

9月，双湖峪学生在校长安志铭的带领下，戴着“不买日货”的袖章，抵制日货，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

1932年

3月12日，共产党员刘善忠、高朗亭、高文清一行三人，趁怀宁湾民团头子邱树凯不在之机，化装后进入寨子，智缴步枪六支，银圆百块，烧毁账簿等文契。次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经济员刘益三。

10月8日，共产党员马华援领导老君殿及清涧东河畔上万农民到清涧城抗粮抗税。本境民间艺人拓开科据此编成练子嘴《闹官》。

12月13日，据陕北代表团报告第二号称，三皇峁也有了共产党支部，直属陕北特委管辖。

1933年

8月，马文瑞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

秋，中共双庙湾支部恢复，书记刘长年，翌年10月又遭破坏。

1934年

春，共产党员李维军、张效良、吴猛旺、郭殿强和马凌云在三皇峁合资办起“五合馆”，作为秘密联络据点，从事地下活动。10月底，因叛徒告密“五合馆”遭破坏。

秋，国民党折可达便衣队来到老君殿，先住在红柳湾，后住在圜圉山。

9月，陕北红军先后两次攻打圜圉山寨子，未克。

12月8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在《关于陕北最近工

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谈到，绥德建立1县委，划分5区委，支部29个，同志200多人。公开游击区域村庄四五十个，每个村庄都有贫农的组织，在绥德西川三皇峁有一个盐工支部。

是年，大理河南的槐树岔、高家坪、砖庙、驼耳巷等地逐渐发展为苏（维埃）区和游击区，一些曾停止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又恢复活动。

是年，国民党在地方推行保甲制度，本境有18个联保，各联保设主任一人、佐理员一人，联保下设保、甲，订立保甲规约。同时，在本境大筑寨堡，移民并村，强迫群众上寨子。国民党政府还组织“铲共义勇队”，制造白色恐怖，“围剿”红军。

1935年

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撤销，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工委），陕北各县委由西北工委领导。

2月6日，秀延县苏维埃政权成立，本境大理河南的槐树岔、高家坪、砖庙、驼耳巷、淮宁湾、裴家湾、老君殿、何家集、苗家坪（山区）归其管辖。本境设有十一区（在何家集一带，驻地不定）、十二区（驻地驼耳巷）、十三区（驻地美谷界）、十四区（驻地进士沟），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扩红等活动。

3月，拓嘉祯带领红军十支队，穿过大理河到米脂西部（今瓜园则湾乡、三川口镇、李孝家河乡、横山石窑沟乡等地），武装开辟米西。

3月，国民党在苗家坪设立“肃反办事处”，后又在周家崓设立“肃反工作委员会西川工作队”，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

夏初，刘明山、牛刚带领的一总队和省特务队30多人第二次到米西，先后在大王山、栾崓、卧虎湾一带活动。6月29日，转入庄果湾住下，由于叛徒告密，红军被围，战士冲出重围，返回安定。

7月，刘明山、牛刚再次来米西，在磨石沟一带惩办反革命，建立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开辟100多个村庄。

7月10日，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向盘踞在三皇崓的国民党四九九团一营发起进攻。12日，红军攻占了柳树圪塔，击死击伤敌连长各一名，歼敌两个连，后因被张廷芝骑兵营袭击，红军腹背受敌，于13日撤出战斗，转移到淮宁川蛇沟一带结集待命。

7月17日，刘志丹得悉高桂滋师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二营、张廷芝的骑兵营去高家塌抢粮，便率领主力红军前后夹击，共歼灭四个连，国民党军队遭重创，五〇二团团团长艾捷三负伤，逃到圜圉山寨子。

8月13日，西北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省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三支队，队长牛刚，政委刘振华，开辟米西。

9月，国民党绥德专署编印《保甲要义》小册子，分发各地，加紧保甲控制，以对付陕北的革命势力。

9月24日，米西县革命委员会在石窑沟乡折家山成立，杨彩霖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本境大理河以北山区大都归米西县管辖。米西县辖7个区，涉及本境的有4个区，一区在周

家砦以东，南殿寺以北一带；二区在殿寺、赵寨子、盐湾一带和三川口等地；三区在瓜园则湾、吴家山、纱帽湾及三皇峁一带；四区在西庄、白草峁一带。

10月23日，红军诱歼侯家高山（在今三川口镇）之敌，未成。

10月，西北军委决定，将陕北游击队一总队（一支队、十支队）、三总队（八支队、十三支队）、二十一支队、二十三支队在南沟岔合编为米西游击师，师长柴福俊，政委魏国亮，主要活动在横山和米西一带。

1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西省，本境归其管辖。

11月底，中共米西县委在石窑沟乡的牛肋肢湾成立，县委书记杨彩霖。同时，米西县革命委员会改名为米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随，副主席刘建业、李文真、白云汉。

12月6日，《红色中华》载，米西19名青年参加红军，陕西省又派高岗、戴季英、马义到秀延、米西、绥德等地扩红。

12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师在磨石沟沙坪一带遭国民党驻扎在周家砦的左协中、驻三皇峁的刘世礼、驻三川口的史老么等部队袭击，夜间作战，敌人互相误打。三连指导员刘振华带几个战士撤退，受伤而被害，他的头被挂在三皇峁街上示众。有民歌：对面山上一朵红花，刘振华闹革命人人爱他，咱们红军千千万，只你国民党坏蛋杀不完。

12月中旬，刘志丹率领陕北红军二十六军两个团和七十八师两个营从瓦窑堡出发，经三眼泉、石窑沟、武镇、韩岔于腊月十五日到横山。

冬，毛泽东在瓦窑堡接见了米西县的15名乡长，肯定米

西县的工作成绩。

12月24日，中共代表赵仰甫和国民党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代表——中校秘书马文生在南丰寨协商，达成“彼此表面对立，暗中互不侵犯”的协议。

是年，秀延县苏区进行土地改革，本境大理河南部的部分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

1936年

1月2日，米西100余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

1月，《红色中华》载，三皇峁一带，炭窑工人罢工。

春节，刘志丹率红军二次打横山后来米西，和米西群众共度春节。

4月26日，由九支队改编的红军独立二营（营长封九应，政委陈克功）在高家塌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失利。

初夏，国民党在横山、响水、波罗、镇川、米脂、绥德、双湖峪、三皇峁、周家崓、石湾一带驻扎大量军队，“围剿”红军，秀延、米西等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7月，秀延、米西苏维埃政府撤销。米西划为游击区，县委和军事部改编为米西游击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惠子俊。

夏，红军二十三支队先后攻打冯家渠墩儿山寨子、周家崓前川炮楼。

夏秋之间，为了“围剿”红军，国民党政府加紧抢修绥德到石湾的公路，11月28日公路试车，试车后再未行车。

8月，中共陕北省委决定在卧牛湾成立米西工作委员会，工委机关设在石窑沟村。主席白文生，副主席赵生仁，翌年1月，工委主席改为书记，书记蔡淑德，副书记李虎岗。

1937年

2月6日，《新中华报》载，清涧游击队在张家坪一带活动，于1月21日将此地的民团全部消灭，缴获步枪18支。

7月9日，《新中华报》载，国民党八十四师五〇〇团第四便衣队队长勾结土匪在秀延七区中沟寨子向红军挑衅。

9—10月间，中共米西工委撤销。

10月，原驻绥德国民党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奉命调离，由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接防，本境原驻扎的艾捷三五〇二团等部队撤离，由八路军驻防。

1938年

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关于统一群众团体组织为抗敌后援会的指示》，本境各联保先后成立抗敌后援会，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

1939年

5月7日，十里盐湾千余名盐工，在中共地下党员张文直、杨继洲领导下，闯入盐局进行斗争，盐局官吏逃走。

是年，共产党在裴家湾首建农会，半公开活动。

1940年

2月29日，八路军驱逐陕西省第二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何深夜逃离绥德。三五九旅组成一临时兵团，尾追不舍，翌日晨，双方在本境南丰寨接火，八路

军全歼保安七中队，截回专署二科科长申体康等 100 余人，何绍南逃奔镇川。

3 月 7 日，八路军攻打马家沟岔阳寨子，何绍南的保安二中队、八中队顽抗后，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逃奔横山郑家寨子。至此，本境大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

4 月，本境整理保甲，原保甲长重新改选。同时，登记私枪，各保甲组织自卫军，维护地方治安。

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十里盐湾成立盐工工会。

7 月 12 日，三皇峁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盐工和盐主的对半分成为六四分成。

秋，八路军在绥德、清涧、安定边界击溃薛应九、拓怀兴等土匪 400 余名。

冬，各地皆建立农会。

1941年

5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五一施政纲领》，各级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男女平等。5—6 月，绥德、清涧等县进行选举，本境大部分群众参加了选举。

夏，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在双湖峪设立“绥米清安边（界）办事处”，拟在此地筹建一个县级政权。

10 月，绥德分区决定废除保甲制度，将地方政权改为区、乡、行政村三级。

11 月 6—21 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本境苗生枝、安志铭、冯文江、苗仰秀、裴仰斗等为参议员，出席了会议。

是年始，国民党顽固派经常在本境派遣特务、政治土匪，制造麻烦，搞摩擦。

1942年

1月，马蹄沟周围发现土匪，发生抢劫案，当地驻军，全力清剿，十数天消灭土匪20余名。

1月，西北局书记高岗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考察团到本境双湖峪、周家崓等地调查研究土地问题。后写成双湖峪调查、双湖峪九乡二行政村调查、双湖峪土地纠纷事件、双湖峪调查土地变动中的艾绳义、双湖峪农户家庭调查等报告。

3月，八路军在徐家沟建的煤矿投产。

4月，改选行政村主任及自然村村长。

5月28—31日在马蹄沟召开双湖峪、马蹄沟、周家崓三处小学参加的本境首次小学生运动会。

6月，绥米清安边办事处有干部30人，通讯员5人，杂务人员7人，同时“西川划县即日着手”。

8月1日，西北局决议，成立中共西川县委。县委书记为马义。

9月12日，中共西川县委召开首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筹建新县问题。

9月17日，绥米清安边（界）办事处召开区长联席会议，讨论新县区划问题。

9月18日，西川办事处正式成立，下设裴家湾、老君殿、驼耳巷、苗家坪、双湖峪、马蹄沟、周复（即周家崓、复兴乡）、瓜园则湾8个区，49个乡。办事处主任为马义，副主任曹华山。办事处驻地双湖峪。

10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议，将西川办事处更名为绥西办事处，并同意将子长县的南沟岔、涧峪岔划归办事处（后未实施）。

12月10日至翌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率调查团来本境调查。

12月22日，绥西办事处启印。是时，办事处下设秘书室、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司法处，属地人口91170人。

11月初，进行乡、村选举工作，不称职干部落选。8日，选举结束。

11月，中共绥德地委决定由白清江任绥西县委书记，次年2月始莅任。

是年，抗日军政大学四分队驻苗家坪、周家崓、马蹄沟等处。

1943年

1月，办事处工会号召600多工人向蔡自举和蔡自高学习。

3月，原米脂石窑沟区归绥西办事处。

3月，绥西县委设立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工作机构。

4月22—24日，绥西办事处分别在马蹄沟、双湖峪举行奖励劳动英雄大会。奖鲍亮声枣红马一匹，蔡自举、郭富财各奖小米三斗，双湖峪纺织英雄马兰英也获奖。

5月1日，绥西办事处开始整风学习，绥德分区派人研究和领导绥西的整风学习。

7月，自卫军大队部成立。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做《抢救失足者》报告，之后，

本境掀起所谓抢救运动，不少群众被整为“复兴社”特务，教育界最烈。教育界分两期整风，第一期7月14日—9月13日，第二期9月4—22日，先后53名教师参加，绝大多数教师、504名学生被误整为“复兴社”特务，连三科（教育科）科长郭凤鸣也被误整。次年，才得以甄别。

11月，新任办事处主任谢怀德到职视事。

11月28日，绥德专署呈文陕甘宁边区政府，请求将“绥西办事处”改为“西川县”。

12月8日，本境7940石公粮已全部入仓，瓜园则湾区公粮640石，人均0.6斗。

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从1944年元旦起，在原绥西办事处设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子洲同志，命名该县为子洲县”。

12月至翌年1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工作团”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兰、孟波、刘炽、唐荣枚、张平、张鲁、马可等一行42人，在团长张庚的率领下，到本境闹秧歌、采风。张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采访了在狱中的朱永山，以其弟兄为原型，写成戏剧《周子山》，公木写成诗歌《十里盐湾》。

是年，开展大生产运动，组织变工组941个，有5446个劳力参加；有纺车9100辆，纺妇9328人，纺花30329斤；布机2692架，织布10736匹；有盐工641人，盐井115口，增产盐70万斤；产粮274713.5石。两年来，有1245个二流子得到改造。

是年，组织农会52个，有会员2593名。

是年，有1856人移往南路（延安以南）。

12月，蔡自举、郭富财、鲍亮声等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

1944年

1月10日，双湖峪数千群众集会，庆贺子洲县成立。县委书记为白清江，县长为谢怀德。

1月，子洲县第一游击大队在周家砭区成立，属县自卫军大队部领导，有队员39人，队长李生业，政委马文华。同时，第二游击队在石窑沟区成立，有队员30多人。

1月中旬，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号召开展劳动竞赛。

1月，200余佃户齐集双湖峪区霍家渠（霍姓地主有土地1642.5亩）要求地主减租，地主被迫答应。

2月，本县第一所公立卫生机构——政民药店在老君殿成立。7月，药店迁到双湖峪，更名保健药社。

2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子洲建县消息，同时登载《李子洲革命事略》。

4月，本县向晋绥边区运送小盐。

春，本县向延安南移民1516名。

5月，八路军七一五团和当地群众合资兴建的洞子沟煤矿建成投产。

9月1—8日，子洲县首届参议会在双湖峪召开，选举谢怀德为县长。

9月，县参议会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号召旅外人士回乡。

11月，本县民间说唱艺人拓开科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说唱了练子嘴《闹官》，大获好评，他的《闹官》登在1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

11月23日,《解放日报》刊登习仲勋的文章《关于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周家圪崂一揽子冬学介绍》。

是年,野狼出没,仅瓜园则湾区就有23个小孩被狼吃掉。同时,疫病流行,患者5838人,死亡2396人。

是年,大规模植棉,共植19378亩,亩产皮棉7斤。种蓝36亩。

是年,缴公粮6250石。

1945年

1月8日,国民党军队保安十一团派出20余人,到本县石窑沟区七乡长崩塬骚扰。

2月3日,《解放日报》载文,介绍周家圪崂冬学。

春,周家峁区疫病严重,死亡518人(52个成人,余者为小孩)。

4月,李广业任中共子洲县委书记。

5月17日,子洲县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合编为县游击大队。队长邢大道,政委贺治国。下辖两个小队,有队员120余名。

6月5日,已有13个合作社,股金边币5000多万元。八路军某部攻打顽军永丰山寨子,未克。

8月,根据绥德地委指示,将本县妇女救国会和青年救国会分别改称为妇女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主任马桂英,青年联合会主任郭玉才。

9月14日,全县动员一千余头牲口,为八路军运送粮草。

10月,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离开本县,群众募捐边币70万元欢送。

11月，乡村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或小组。

12月，绥德警备区十团在本县马蹄沟成立，赵立业任团长，张明科任政委。

是年，中共子洲县委下辖9个区委，有党支部54个，党员1292名。

是年，全县歉收，每斗小米由边币1.2万元，涨至3万元，最高达4万元。县委、县政府组织群众备荒。

是年，先后三次扩兵，556名青年农民加入八路军。

1946年

1月13—19日，子洲县第二届参议会在双湖峪举行，选举参议长李广业，县长王占山。

2月28日—3月16日，县委举办春训班，105名干部参加学习，传达“七大”精神，布置春耕生产。

4月2—27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举行，本县马文瑞、谢怀德、冯文江、李广业、蔡自举、拓生荣、高树林（候补）、刘万和（候补）等，出席了会议。

8月3日，为加强本县的保卫工作，绥德地委决定成立子洲县社会部。

8月，全县开始查租、清算运动。

10月12—14日，北线战争。横山、石湾、镇川、武家坡等地皆获解放。为了支援此次战争，本县组建动员委员会，先后动员基干自卫军700余名，战勤人员24976人次，担架799副，毛驴5631头，设伤兵大站4处，小站11处，运小米1043.96石。

11月20日，绥德军分区三个直属营扩编为四、六两个团，

本县 512 名青年农民加入四、六团。

11 月，北线战争后，高家沟、水地湾、殿寺等地划归本县管辖，新增高家沟区（今横山高镇）。

12 月，陕甘宁边区土地公债工作团抵达子洲。

是年冬到翌年春，本县进行土地征购工作。据双湖峪、周家崓、苗家坪、石窑沟、瓜园则湾 5 个区统计，向 204 户地主征购土地 10942.55 垧（每垧 3 亩），征窑 614 孔，地主献地 907 垧，2285 户（11014 人）无地少地农民得到土地 13051.94 垧，窑 542 孔。

1947年

1 月 3 日，召开政府委员、常驻议员联席会议，选举李身修为子洲县人民政府县长。

3 月 21 日，县人民政府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县人民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胜利果实，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3 月 31 日，县委组织南川、周（家崓）高（家沟）区、石（窑沟）瓜（园则湾）区 3 个游击队。

春夏，各区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交由群众公审，先后镇压 60 余人。

3 月 29 日凌晨，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绥德田庄到本县淮宁河川的邱家坪村，毛泽东住农民邱朋明家。在这里，任弼时召集会议，向警卫团和中央机关人员传达了枣林沟会议精神，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留在陕北。

4 月 1 日凌晨，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由邱家坪到本县高家塌，毛泽东住农民高怀清家。当日晚，即离开沿淮

宁河川而上，宿涧峪岔的庄果坪村。

4月5日，周恩来副主席从河东返回绥德，在绥德专员杨和亭的陪同下，沿大理河川而上，在绥德沙滩坪稍事休息，到本县董家湾检查了备战情况，随后来到双湖峪，听取了杨专员和中共子洲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夜宿三里路马姓农民家。之后，到青阳岔和毛泽东主席汇合。

4月，县自卫军大队部命令双湖峪、苗家坪、驼耳巷、马蹄沟4个区组织游击队。

4月底，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进犯本境淮宁河川，山顶沟道皆是军队，所过之处，门窗毁坏，鸡犬不宁。仅裴家湾区被掳走青壮年1000余人，杀害35人，杀耕牛35头，杀羊1000余只，抢走毛驴800余头。老君殿区掳走青壮年120名，杀死4人，抢走大牲畜386头，羊1200只，粮食2000石。

4月29日，国民党军队一架飞机在老君殿区贺家塬山庙上撞毁。

5月4日，根据中共西北局指示，中共榆横特委在米脂卧羊区柳家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河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高风山、杜秉德，工委下辖四十里铺、沙滩坪、双湖峪、苗家坪4个区委，各区都有一个游击队。由于战争时期，变化很快，河西工委仅存在20余天即撤销。

5月初，胡宗南军队在驼耳巷、苗家坪、双湖峪等处骚扰，群众深受其害。

5月，县委、县政府机关撤离双湖峪，到马蹄沟办公。

6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住子洲县封家峁惠维存家。

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由白庙岔转移到子洲县

马蹄沟。6月底，陕甘宁后方党政机关在马蹄沟进行了整编，总人数减为3746人，较1946年减少5038人。

7月1日，西北局召集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庆祝“七一”。马明方副书记讲话，号召每个党员必须切实做好支援前线工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讲话，号召每个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王维舟副司令员讲话，号召每个党员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

7月9日，林伯渠和夫人朱明在马蹄沟接见了出席子洲县教师会议的全体教师，林伯渠讲了话。

7月下旬，西北野战军驻扎在大、小理河川待命。月底，彭德怀司令员通令西北野战军立即向国民党陕北军事重镇榆林进发，夺取策应太岳部队渡河的时机。

7月底，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离开马蹄沟，向河东转移。

8月7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机关由横山肖崖村来到本县巡检司村，毛泽东住在农民傅守申家。次日离开，到达绥德县李家崖。

8月8日，县委紧急命令群众坚壁清野。

8月14—22日，胡宗南军队在大理河川骚扰，群众有组织地到山沟避难。

秋，早霜，歉收。

秋，由于战争，学校停课，教师东渡黄河搞运粮救灾工作。

12月1—20日，召开全县土地改革工作会议。18日，西北党校赴子洲土地改革工作团团团长高仰云宣读了“亚洲部”（即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之后全县进行土地改

革。县委在三眼泉设立土地改革指挥部，下设5个指挥所，25个工作组。12月22日至翌年1月6日，土地改革工作组下乡，1073个自然村普遍建立贫雇农小组。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分窑房，工作轰轰烈烈。同时也发生了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使用肉刑等“左”的偏向。全县有35人死于肉刑，122户地主、富农外逃。

12月，由于战争和天灾，本县群众陷于饥馑之中，瓜园则湾区、石窑沟区、高家沟区灾荒尤为严重。

是年，先后有2500余农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年

1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来子洲，向干部做报告。他讲了八个问题：一、西北局会议（义合会议）；二、形势问题；三、英美苏关系问题；四、统一战线政策；五、土地改革工作；六、整党问题；七、救灾问题；八、领导工作。他特别要求坚决纠正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使土地改革健康发展。

2月4日，县委发出紧急通知，将土地改革中的平分土地政策改为“抽补调剂”。

春，县委、县政府机关迁回双湖峪。

春，山间野狼噬人，咬死23人，咬伤57人。

4月18日，县政府决定，每乡都成立救灾委员会，各行政村组织救灾小组。1947年冬到1948年春，先后在山西隰县、本省志丹、吴堡、绥德龙湾运粮1541石，群众调剂土改斗争果实4449石，拨给11639户、52512个灾民，移民2109户、9215人。虽多方救灾，仍有3497人浮肿，754人死亡。

5月20日—6月26日，县委在周家崓区进行土地改革纠偏试点工作。

5月，全县教师从山西返回，积极筹备复课。

夏，西北党校赴子洲土地改革工作团返回延安。

7月，县委发出关于战士归队的通知，动员离开部队的战士归队。至年底，全县离队的883名战士有423名归队。

7月26日，周家崓召开群众大会，批判“一贯道”的破坏活动。至8月下旬，共揭发出9起“一贯道”案件。

8月22日，遵照绥德专署决定，子洲县石窑沟区6个乡、高家沟区两个乡划给横山县，共划出人口14191人，土地65667.5亩。

8月，据统计，从去年2月开始，先后组织长期担架8次，短期担架243次，临时担架2143次。共合788667天，跟畜人工184697天。担架队员牺牲15人。妇女做军鞋51002双。

9月，全县已恢复学校20所，在校学生934名，学校比战前减少32所，学生减少1173名。

10月，全县开始土地改革纠偏和确定地权工作。各乡村改选农会，纠正错定的成分，退回部分财物，开和欢会，向错斗户赔礼道歉。12月20日基本结束。全县原定地主505户，纠偏后为138户；原定旧富农为602户，纠偏后为213户；原定新富农11户，纠偏后为60户。

是年，先后有257名干部到新解放区工作。

1949年

2月，老君殿区第六乡31个村划归子长县。至此，形成本县版图。

3月16日,《群众日报》头版载文,批评子洲县政府拖延公案的现象。

4月28日—5月2日,中共子洲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双湖峪镇召开,大会应到代表53名,实到代表40名,代表全县1750名党员出席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子洲县第一届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9名,候补委员2名,选出5名县委常委,王生源当选为县委书记。并选出8名出席绥德分区党代会代表。

5月,子洲县工人联合会成立,主任李茂植。

5月,县委书记王生源调离,杨崇明任县委书记。

5月29日,全县612名担架员(110副担架)由徐作启率领,到耀县接受任务,支援解放大西北。11月23日,凉州解放,始完成任务归来。

5月,子洲籍起义军官张道源自告奋勇充当信使,上华山劝降国民党旅长韩子佩,在北峰被杀害。

9月,子洲籍安子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30日,中共子洲县委下辖9个区委的63个党支部,有2166名共产党员。

子洲县早期共产党员和 共青团员名录

子洲县第一个共产党员是李临铭，他是在山西汾阳铭义中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本境不少青年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和榆林中学上学，在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熏陶下，加入中共党团组织。本境第一个党支部是中共苗家坪小学党支部，接着周家崓、老君殿黑泉沟清涧第四高小、李银家沟，先后有了党支部，所以这些地方的中共党团员就比较多。

李临铭（1902—1959） 双湖峪镇人，曾名瑞廷，本县双湖峪村人，临铭小学毕业后，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1924年春，临铭由一姓刘的教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子洲法院档案记录，李临铭供述，他于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安排他转回绥德师范，以念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秋，冯玉祥让刘郁芳在兰州创办国民军政治干部学校，派钱清泉到绥德师范招收学生，钱到绥德师范和李子洲取得联系，一共招收了30多个青年，临铭也被招去。途经银川时，党组织安排李临铭、贺维新、陶振亚、王兆卿等6人留在银川开展工作。1926年9月，临铭等人在银川市鼓楼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特支书记。同时，他们又协助国民党建立了宁夏县党部，临铭任常务主任。不久成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和学生联合

会等群众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下令驱逐共产党人，并通缉追捕李临铭。临铭得知，星夜骑马逃出银川，但仍被追上。敌人将他一顿毒打后，以为临铭已死，便将他推下山沟。直到第二天临铭才苏醒，逃回定边。

到定边后，经人介绍在定边小学担任教务主任，是时积极和绥德地委、县委联系恢复定边特别支部，并任中共定边特支书记，后因局势变化几经周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临铭离开定边投奔在国民党石子俊部下当了副参谋长，不到三个月因病回家乡休养。后以行医为生。

1948年，临铭的精神病益重，整天哭笑无常，语言失控，经常和村镇干部发生口角。1958年1月，子洲县法院以“地主翻案、辱骂干部、干扰公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送靖边杨桥畔劳改场服刑，1959年8月病逝于刑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刘正平（1904—1931） 原名刘嘉善，字鹏举，三川口镇阳湾村人。

1923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4年冬，刘正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李子洲介绍刘正平、安子文等人去北京中法大学学习，上学期间，正平又和安子文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他回家乡和曹鸿碧在三川口、西庄一带宣传革命，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秋，刘正平被党组织派到宣化高桂滋部从事地下工作。其公开身份是一〇九师少尉参谋。

1930年，刘正平结识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遂按

刘天章的指示，到互济会同高克亭一块开展工作。1931年7月，互济会宣传委员李来宾被敌人逮捕，供出了刘天章、刘正平等人，破坏了特委机关。正平和天章先后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正平坚贞不屈。敌人在得不到任何情报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于12月在太原小东门外将其杀害。

周发源（1904—1976） 周家崓镇李银家沟村人，出身地主家庭。青年时到榆林中学上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支部宣传委员。榆中毕业后，到定边教书。1926年2月，汤中甫、周梦熊、周发源、龙惠民等人遵照中共绥德特支的指示，以定边高小为活动中心，建立中共定边支部，周发源任支部委员。同年6月，任中共定边特支书记。1928年10月，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1931年，白明善被捕，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形势恶化，周发源逃奔到山西汾阳，从此脱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发源又返回绥德，从事商业。“文化大革命”中，以资本家的名义被遣送回家乡，1976年在劳动途中失足而亡。

张逊谦（1904—1992） 马岔乡马岔村人，1925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刘志丹一块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曾参加晋西游击队，后脱党。任过国民军团长、副旅长。20世纪80年代曾任陕西文史馆馆员、子洲县政协第一届委员。

艾捷三（1900—1954） 名克明，字捷三，双湖峪镇双湖峪村人。1921年考入榆林中学就读，1924年未毕业就到洛阳当兵，秋天到邯郸陕军第一师干部学校受训，1925年在国民第二军第十补充团高桂滋部任排长，翌年任连长，5月间驻防北京，经同乡马云程（米脂人，革命烈士）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开赴河南，任营长。1930年到山东，升任八十四高桂滋部五〇二团团团长，此时脱党。1934年，驻防洛阳，全师集体加入国民党。1943年，他被提任为八十四副师长，一年后，调任新二师副师长。1945年，新二师并入八十四师后，他转业于屯垦大队。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9月，他被任命为绥德警备司令。一年后，调任宝鸡专员。宝鸡解放后逃到兰州，后到青海组织土匪与人民为敌（另一说，他已投诚，随解放军到兰州，害怕有人算他的旧账，1950年化名薛海城潜逃到青海）。全国解放后，被抓获。1954年，在绥德被镇压。

曹秀清（1902—1984） 双湖峪镇曹家沟人，杜聿明夫人。大革命时期在榆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跟随丈夫辗转各地，1949年赴台湾，经周恩来总理安排，与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取得联系。1963年5月20日，曹秀清从纽约登机，飞到瑞士日内瓦，住了几天后，又由日内瓦经莫斯科取道回国，6月3日，她终于回到北京，和获得特赦的丈夫杜聿明久别重逢。1983年，曹秀清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5月，病逝于香港。

冯启民（1904—1976） 原名祖佑，马岔乡冯家渠村人。1925年榆林中学毕业，1926年在横山县高小任教，经马云程、曹亚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推选为陪审员，曾与县长、农会主席一起多次清算土豪劣绅的劣迹。顽固分子仇视他，将他告到国民党陕西省民政厅，要求查办，因组织暗中掩护转移，未遭抓捕。1928年任中共绥德区委委员、书记等职，1929年底任绥德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31年自行脱党。全国解放后在西安教育部门工作。

拓克宽（1905—1931） 又名拓荒，字和卿，苗家坪镇佟家瓜村人。1924年春考入榆林中学，7月克宽从榆中转入绥师上学。冬季，他由柳长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4月，克宽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高桂滋部队当了司务长，后来升任连长，开始了历时5年的兵运工作。这5年中，克宽在高桂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一〇九师担任过我党地下军委领导的二团党总支委员、三团党总支书记等职务。

1930年秋，高桂滋部驻防山西平定县，听候整编。根据北方局指示，从四十七军中抽调部分党员到各地搞农运，且这批人员改由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此时中共山西省委派杨重远、拓克宽、胡廷俊、吴岱峰等人筹建一支红军游击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奔波，筹集长短枪20余支，组织起30多位武装人员，后与阎红彦、白锡林组建的武装小组会合于吕梁山区，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克宽任大队长，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党总支书记杨重远。

1931年7月，西渡黄河，到陕北开展革命。1931年农历八月初，游击队行军至安条岭，深夜遭到敌人重兵包围。克宽在侧翼出击时，未追上大部队，遭张廷芝部一个骑兵排的围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6岁。

冯文江（1905—1974） 马岔乡冯家渠村人。1924年榆中毕业，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共进社”，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转党。讲习所结业后，调回陕西渭南省东农民办事处任职。1927年，调西安中山学院担任农民运动班班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通知他离开中山学院回陕北任绥德县委书记。1928年春，他出席了在本境苗家坪南丰寨召开的陕北特委会议，不久任特委宣传部长。1931年秋，因父病重回家探望，失掉了与组织的联系。绥德县委书记周发源临时安排，让他担任了西川区委书记。次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被释放回家。

1940年，绥德解放后，冯文江重新参加工作，任绥德专署教育科督学。1945年，任边区政府政务秘书。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由胡明、常黎夫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不久任参事室参事。1956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参事室参事。1974年11月27日，因病逝世。冯文江是马文瑞之表兄，对马文瑞参加革命影响很大。

李策铭（1906—1954）字临轩，双湖峪镇人。1925年春，考入绥德师范，与安子文、徐博、刘正平被称为“西川四大名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受李子洲校长的器重。1928年春因闹学潮，绥师被井岳秀查封。李策铭同周梦熊、冯启民一起到横山高等小学任教，并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又在米脂、绥德、榆林等地小学、师范、中学执教，两次被绥德教育局聘为督学。此间，自行脱党。后长期在榆林、宁夏任教。

田庆丰（1906—1937）苗家坪镇本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苗庆丰与苗仰实、贺维新一起在苗家坪高小创建了本县第一个党支部，田庆丰任支部书记。1927年7月，苗家坪高小党支部转为区委，田庆丰担任区党委书记。区党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抗租、抗税和抵抗国

国民党拉差等革命斗争，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1937年，国民党绥德专署逼他当联保主任，田庆丰因未得到组织批准，拒绝担任。国民党绥德专署的人强行把田庆丰带到绥德，进行了拷打，将田庆丰逼死于绥德。

封营书（1908—1953） 何家集镇封家坪村人。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营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37年至1939年，任中共子长县委统战部部长。1943年，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室政务秘书科长。1947年，任宜川县县长、县委书记。1950年，调西北行政委员会工作。1953年，因病去世。

曹鸿碧（1908—1974） 原名崇学，双湖峪镇曹家坪村人，九岁入双湖峪小学读书，十五岁以优异成绩考入米脂三民二中，毕业后又到绥德师范就读，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绥师被查封停办后，曹鸿碧等十多人考入北平新办的政治大学。西安事变后，曹鸿碧随西北抗日联军开赴东北抗日前线，日本投降后，转入地方工作。全国解放后，调到江西省从事工业建设。1959年，调任陕西省机电设备成套局局长。

刘景向（1908—1968） 周家砦镇董家圪塆村铁佛寺人，谨言慎行，敏学好读。1922年考入榆林中学，1925年，经焦维炽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接焦的职务，担任了榆林地下党支部书记，并受命筹备中共榆林地委。

1927年，赴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在史可轩、邓希贤（邓小平）部下当职员，深受史、邓两首长的器重。“四一二”政变后，中山军事学校被迫解散，景向按组织意图返回故乡，到周家砦高级小学任教员。1928年，到横山第一高等小学任教。是年秋，考入北京政治学院，后留学日本。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景向为抗议日本侵华，毅然弃学返回，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奔波于西北各省。40年代，经杜斌丞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后执教于北京铁道学院，为三级教授。景向训导有方，治学严谨，备受师生爱戴。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1968年含冤离世。

苏杰儒（1909—1985）原名自强，三川口镇驼耳巷村人。1927年，在榆林中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杰儒在吴起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队伍，先后担任陕甘工农游击队中队长，红二十六军班长、排长、连党代表等职。1931年，他去甘肃平凉、庆阳等地活动并组织领导了西华池起义。1935年，他在攻打保安县城时负伤，此后由党组织安排在绥德、米脂的苗家坪、龙镇、卧羊寺等小学任教员，开展地下工作。1945年，党组织派他去定边营盘号盐店当掌柜，期间杰儒受分区司令员贺晋年委派，积极为促成三边十一旅起义创造条件。

抗战胜利后，苏杰儒担任安边县公安局长、三边军分区保安处干事等职。1947年春，在定边战役撤退时被马鸿逵部下抓走，先后被关押在银川、兰州两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杰儒先后担任宁夏企业公司副科长、人民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人民检察署处长等职，后担任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常委，并受组织委派参加了民革甘肃省委员会，担任甘肃省民革副秘书长、委员、副主任委员等职。

安子文（1909—1980）原名志翰，字浩然，双湖峪镇

人，1924年从绥德四师毕业后，离开家乡到北京、保定读书。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3月18日，参加李大钊等人领导的示威游行。1927年12月，安子文到开封向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后，河南省委决定将安子文由团转党，并分配他担任省委交通科长。192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他被捕入狱。后由党组织营救出狱。1928年秋，党组织派他到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往返于上海、武汉、沙市之间，为党传递文件，护送党的重要干部。1931年3月，在天津被特务逮捕关进监狱。他在狱中坚持斗争，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委员。1936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43年春，安子文到延安，担任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子文担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任一个月后，中央组织部长彭真被派往东北工作，于是安子文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八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后任中组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安子文受到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予以彻底平反。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安子文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

景仰山（1902—1950） 苗家坪镇郭家沟村人。1926年冬天，在绥德第四师范读书时由马瑞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由党派遣到清涧高杰村任教师，秋到米脂第一高小任教师，后担任米脂县委书记。1929年春，由陕北特委分配到府谷第一高小任教师，担任府谷县委书记。1930年冬被捕，1933年春寻保获释。1934年春到苗家坪当教师。冬天，再次被捕，自首叛变。1937年任米脂、府谷国民党县党部助理

干事和干事。1943年任榆林专署科长，1945年任十一旅驻宁夏办事处主任，1948年任国民党中统宁夏调统室秘书，10月任北京中统局誊写。1949年任宁夏中统局干事、秘书、代理主任等职。1950年被镇压于银川。

马文瑞（1912—2004） 高家坪乡马家阳湾村人。1927年冬，在周家崓小学秘密成立共青团支部，任书记。1928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1930年，任安定县北区委委书记，后任县委书记。1935年，任陕西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部长。1937年，任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1945年，任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次年任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局副书记。1955年，任国家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先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9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84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离休后任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马逢瑞（1910—1972） 字应芝，高家坪乡马家坪村人。逢瑞于1925年在周家崓高级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师范学校，受革命熏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井岳秀因害怕学生进行革命活动，将绥师解散，逢瑞回家务农，自动脱党。后又在吴家塔、周家崓等地任教师，期间加入复兴社和国民党。1940年子洲解放后，他从事商业活动。1943年整风时，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参加复兴社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受到宽大处理，被分配到绥德专员公署工作。1946年因病复员回家，1950年秋到米脂中学任教，后又到葭县、延川等地任教，1958年开始任延川中学校长，出席了陕西省文教群英会。1962年被精减回家。

杜修方（1905—1935） 砖庙镇砖庙村人。1927年，于榆中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回家，白天下煤窑掏炭，晚上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和马文瑞、郭步岳等人在刘家坪、毛圪台、花牛岭、白家湾等地宣传革命，组织、武装群众，组建和扩展革命地盘。1933年，任秀延县十二区主席。1935年8月12日，为配合牛刚游击队在驼耳巷老山岭和国民党艾捷三部队的战斗，修方亲临前线英勇参战，一举击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当敌军组织多于我方几倍兵力反扑时，修方临危不惧，奋勇作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郭步岳 1911年生，驼耳巷乡郭家畔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在本境任团区委组织委员、靖边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关中分区保安科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干部科长、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保安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一野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全国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副检察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离休。

刘万祥（1914—1930） 何家集镇枣林圪村人。1927年，全国革命处于极其困苦时，刘万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陕北红军二团团团长，在一次攻坚战中失踪。

郭子清（1909—1994） 原名郭步云，驼耳巷乡郭家畔村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在苗家坪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以教师身份在米脂姬家寨、本境景家沟等地搞地下革命，任党支部书记。1935年春在本境驼耳巷一带开辟苏区，任区委书记，后任红二十六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陕甘省苏维埃主席、三边地委组织部副部

长、国家化工部技术安全司司长、陕西省化工局副局长等职。

周梦熊（1904—1990）周家崓镇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榆林、神木、横山、定边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组建定边特支并任书记，1933年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巴浪农场等单位工作，1984年离休。

徐步墀（1905—2000）马蹄沟镇四旗里村人。1924年，在绥德师范加入共青团。1927年，到北平大学法学院读书，曾参加青年互救会及左翼作家联盟。毕业后到榆林中学、绥德师范、响水师范、清涧中学任教，1957年，在清涧中学任教时被错划为右派，清洗出教育界，劳教4年，1979年获平反。

苗仰实（1905—1941）苗家坪人，1925年在绥德四师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受组织派遣提前毕业，回苗家坪任教，同田庆丰、贺维新组建了子洲境内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出席了陕北第一次代表会议。白色恐怖严重时出外隐蔽，1941年卒于内蒙古固阳。

贺维新（1906—1964）苗家坪镇何家沟人，1926年在绥德第四师范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在苗家坪高小任教时，和苗仰实、田庆丰成立中共苗家坪高小支部，他担任宣传干事，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师俊伟 马岔乡师家坪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刘澜涛的入党介绍人。

李秉乾（1907—1947）字子建，马蹄沟镇段家湾村人。是绥德师范第一届学生，大革命时期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前后自行脱党，曾任周家崓商会会长（其子李文斌回忆）。另据公安局档案《清乡总结》中说他1927年加入国民党，后来还担任过分支书记。

栾本纯（1908—1950） 马蹄沟栾家渠人，1924年到绥德师范读书，加入中共党团组织。1926年考入北平法政大学，后参加了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大荔、河南卢氏、陕西韩城县县长，陕西省建设厅秘书室主任。

景兴治 苗家坪镇郭家沟村人，后被国民党杀害。

栾本植（1907—1995） 字培之，马蹄沟镇栾家渠人。1925年在榆林中学加入中共党团组织，11月，因发动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武装押送出榆林。后加入国民党，多年从事教育工作。

李崇安 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时加入团组织。

高炎 周家崓镇白家沟村人，绥德师范第一届学生，加入过青年团，当过教师。

姬世道 周家崓镇车家沟村人，1927年在米脂东街小学任校长，4月间由高崇实、何佩章介绍加入共产党，1928年脱党，后一直任教师。

师维俊 马岔乡师家坪村人，1929年毕业于绥德师范，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从事教育工作。

王祖模 双湖峪人，在省立第四师范上学时加入团组织。

王秉儒 景家沟人，团员。

贺鸿儒 团员。

郭希贤

马万里

王修仁

王俊让（1903—1961） 马蹄沟镇水浇湾村人，1924年入榆林中学就读，1925年在榆林中学加入中共党团组织，11月，因发动学生罢课，被开除学籍，武装押送出榆林。1928

年考入北平大学，两年后肄业回乡，曾任横山、清涧、府谷等县县长。

张效良 在三皇峁开过“五合馆”，后被误杀。

吴生荣

吴锦义

崔玉珍

李维均

师维业

苗兴昌

田庆昌

王秉文

郭步荣

李仕刚

郭步斗 1912年生，郭家畔人，1927年，由景步哲介绍入团，农民。

薛泽武

薛继福 1910年生，薛家柳沟人，1927年入团，农民，后自首。

田庆盈 也名田子厚，1913年生，苗家坪人，1927年夏由贺鸿儒介绍入团。后当过店员，退休干部。

高光祖

贺鸿儒

安培山

景步哲

马象英

韩士杰

周自岐 李银家沟人，曾任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后在天津经商。

刘精一 周家崓镇人，大革命时期加入党团组织。

赵拱璧 周家崓赵场人，大革命时期加入党团组织。

高学孔

马文德

徐登奎 马蹄沟镇四旗里村人。

郭开登 马蹄沟镇小沟子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叛变。（资料来源，清乡报告）

李宗白、马瑞章都是清涧人，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在老君殿高小任教，建立了清涧第四高小党支部，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其中有：

李丕成 老君殿镇黑泉沟农民，1927年5月由封营书、封营荣介绍入党。

张宏忠 老君殿镇黑泉沟农民，是早期共产党员。

战红 李家崖农民，早期共产党员，后被国民党杀害。

封营荣 即封可涵，何家集封家坪村人，1927年3月，在黑泉沟上学时由马瑞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常委。

封营秀 何家集镇封家坪村人，大革命时期，在黑泉沟清涧第四小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封士清 何家集镇封家坪村人，大革命时期，在黑泉沟清涧第四小学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知承 何家集镇人。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永英

薛毓瑞 薛家渠人。

师学文（师如清）

郭长才 驼耳巷乡郭家畔村人，木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国民党活活打死（郭步岳回忆）。

郭长厚 驼耳巷乡郭家畔村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入狱，后越狱逃跑到山西。

徐达仁 马蹄沟镇四旗里人。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宁夏劳动局工作。

冯文俊（1903—1966） 马岔乡冯家渠村人。1924年于榆中念书时加入党团组织，毕业后考入青岛大学进修，期满后于1925年开始从教，先后在米脂、绥德、子洲任中小学教员、教导主任、校长等，从教40余年。

裴仰山（1913—1982） 驼耳巷乡新庄村人，1927年，正当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仰山跟堂兄裴仰斗开始了秘密革命活动。1928年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月，他和郭步岳找到了红军一总队负责人刘明山，得到了刘明山的正确指导和有力支持，并于同年2月创建了以驼耳巷为中心的十二区，将革命斗争公开化，不几个月，扩展到250个村庄。裴仰山先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十二区区委书记等职。

1937年，裴仰山满怀激情投入到抗日战争，先后在秀延县任工委书记，在米脂、绥德、吴堡、清涧等县任县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仰山被调到冀东地区领导广大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唐山市和河北省委工作，曾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裴仰斗 驼耳巷乡裴家渠村人。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子洲县保安科科长，绥德专区保安处处长、地

委常委，汉中地委委员。1953年到青海工作，历任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黄南州委第一书记等职。

张永丰（1910—1985） 驼耳巷乡驼耳巷村人，1926年，考入米脂三民二中学习。翌年闹学潮，随全班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和全班同学集体退出国民党，坚持革命斗争，并于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回乡务农并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任地下党支部书记。1935年，他先后在秀延县、保安县、子长县任民政部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39年调入中央党校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任延安赴东北干部队队长，并任黑龙江省五常、双城土改工作队队长。后任中共宾县县委副书记、松江省政府民政厅干部科科长、中共松江省委直属机关党总支书记等职。“三大战役”后，任南下干部大队队长兼党总支书记，率领大批南下干部，随第四野战军来到江西省，曾任中共吉安、宁都地委委员、常委兼民运部长、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有色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53年，调任冶金部长沙有色金属工业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56年，入北京冶金部高级干部学校学习。1958年，学习结业，赴青海省任冶金工业局副局长。1960年，调任中共青海省西宁市委副书记。1965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视察室视察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0年离休。

高腾霞（1914—1939） 何家集镇枣林圪村人。大革命前后入党，在老君殿一带开展宣传活动，任宣传干事。后参加了筹建中共秀延县委的工作。秀延县委成立后，腾霞和县

委一班人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使全县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1936年夏，国民党队伍攻占秀延县，共产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腾霞被调回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任巡视员。1939年，腾霞在安塞一带开展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马明甫

赵晓初

柳迎培 马岔乡师家坪村张家岔人，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会议，就在他家召开。

安维昌 周家岔人。

马文普

李锦林

栾正兴

杨凤台 马蹄沟人，杨凤至之兄。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凤至（1913—1993） 马蹄沟人，1928年6月，经吴生荣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党内名字叫瑜珊。1948年参加工作，曾任葭县、子长县工会主席。

杜修德

刘克恭 苗家坪人，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钟庆荣 双庙湾村人，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兆德 水浇湾盐工，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生芳 庙沟盐工，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栾正才 马蹄沟人，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栾本儒（1903—1947） 马蹄沟栾家渠人，大革命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资助张效良、郭殿强等办“五合馆”，

后脱党，为军统特务，曾任国民党铲共义勇队队长。曾纠集政治土匪组成 14 支队，骚扰陕甘宁边区，刺探情报。1946 年，横山威武堡解放后被抓获，1947 年 4 月被镇压。

张鸿铭 1914 年生，甘肃专用汽车制造厂财务科长。据他回忆，1928 年前后，他在老君殿黑泉沟上学，由惠光明（封家崾人）介绍入团。由教师王史朴组织联络。在黑泉沟、潘家塔组织农协。1929 年在老君殿戏台拐角砸了中华基督教牌子一个，宣传妇女放足，剪辫子，张贴标语。

封士进 樊家塔人。

高德梯

曹瑞华 曹家沟村人。

郑凤桐 郑家圪崂村人。

张福昌

吴志科 义家湾人。

张世明

呼永华 李银家沟村人，1927 年由刘景向、周梦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7 年在村里成立党小组，1928 年成立党支部，发展不少党团员。曾任绥德县委常委。1928 年 7 月，绥德县委迁移到李银家沟，驻地即是他家，刘澜涛、马明方、马文瑞、白明善、赵通儒、周发源、高树玉到他家来过。白明善在他家办过平民学校。

呼永成 呼永华之弟，1907 年生，李银家沟村农民，大革命前后加入党团组织。

呼永仁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周自新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前后加入党团组织。

张宏元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张宏金**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周志明**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周志胜**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文仲实**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文仲清**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文仲元**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姬运昌**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董芝海** 李银家沟村人，大革命后加入党团组织。
- 刘志业** 刘家坪人，大革命前后加入党团组织。
- 马兴图** 大革命前后加入党团组织。
- 裴仰秀** 大革命前后加入党团组织。

还有贺秉璋、牛刚、高步仁、郭殿强、刘长年、徐作章等，这些人是赤色群众，或已经参加革命，或和革命有了联系，不久都成了共产党员。

贺秉璋（1914—2007） 何家集乡营盘村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底任中共秀延县委宣传部长，1935年11月，任安塞县委书记。1936年至1944年，先后在延安、米脂、清涧等县任职。1945年，到冀东任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50年任唐山地委书记。1954年任开滦煤矿党委书记，1955年任煤炭部部长助理，后任副部长。1983年起任煤炭部顾问，1989年，为全国政协委员。

牛刚（1913—1985） 原名光远，马岔乡牛家沟村人。

1927年春，牛刚同另一人到神府寻找革命队伍，不久即被家人寻回，经人说情又入冯家渠小学就读。1932年春，牛刚在合水县找到了刘志丹的红军部队，在骑兵连当了战士，不久又结识了谢子长。1935年春，牛刚任省特务队队长。8月，

省特务队改编为 23 支队，他任支队长，同年 10 月，牛刚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23 支队统编为陕北游击师，牛刚调任新成立的军分区司令，并兼任米西苏维埃军事部长。不久因游击师师长柴俊福调离，政委魏国良叛变，牛刚又任师长兼政委。1936 年春，中央派张秀山等一批干部到神府开展工作，牛刚进行周密的安排，负责护送到目的地。

陕甘宁边区时期，牛刚一直在军队中任职。1943 年后，他分别在关中保安纵队、东北骑兵团、东北双城纵队等军事部门担任职务，后来随大军进关，追歼国民党残部到南方，先后在独立七团、四十七军一六〇师四七八团、湖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中南文化速成中学校务处、第一公安学校物资保证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院务部等单位任职，1964 年离休。

苗玉春 1910 年生，大苗沟人，在苗家坪小学上学时加入过共进社，也是红色群众。

周家崓的周伯勋和万兆春，也是大革命时期的活跃分子和进步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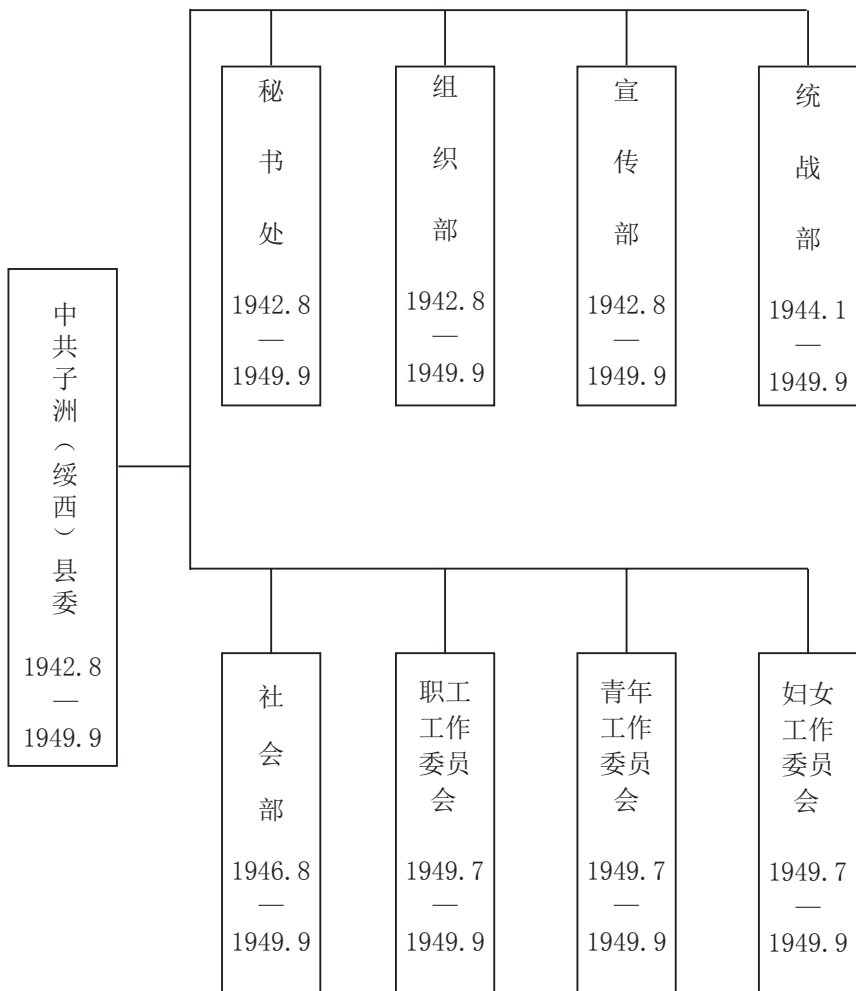
周伯勋（1903—1957） 原名养初，本县周家崓人。1922 年春，入榆林中学，与刘景桂（志丹）同窗，关系甚密，他们一块学习，一块参加进步组织，一块宣传革命。1925 年榆中闹学潮，刘志丹等人遭到井岳秀的搜捕，伯勋同几个好友深夜用绳子床单等将志丹等人吊下城墙。榆中毕业后于 1926 年受聘在绥德职业传习所任教员，同年 4 月由杨明轩、常汉三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 年蒋介石清党时，他脱离国民党，在绥德、榆林等地从事教育事业。1930 年冬投奔杜斌丞，并在杜斌丞身边工作。1932 年，随杜到兰州，经杜斌丞三次

介绍，分别在甘肃镇远任教育科长、庆阳新十一旅任上尉参谋、汉中财政专员署任视察员。1934年，因病归故里，后又在周家崓、横山等地任教。1953年12月，到县人民委员会当文书，1956年又到新成立的周家崓中学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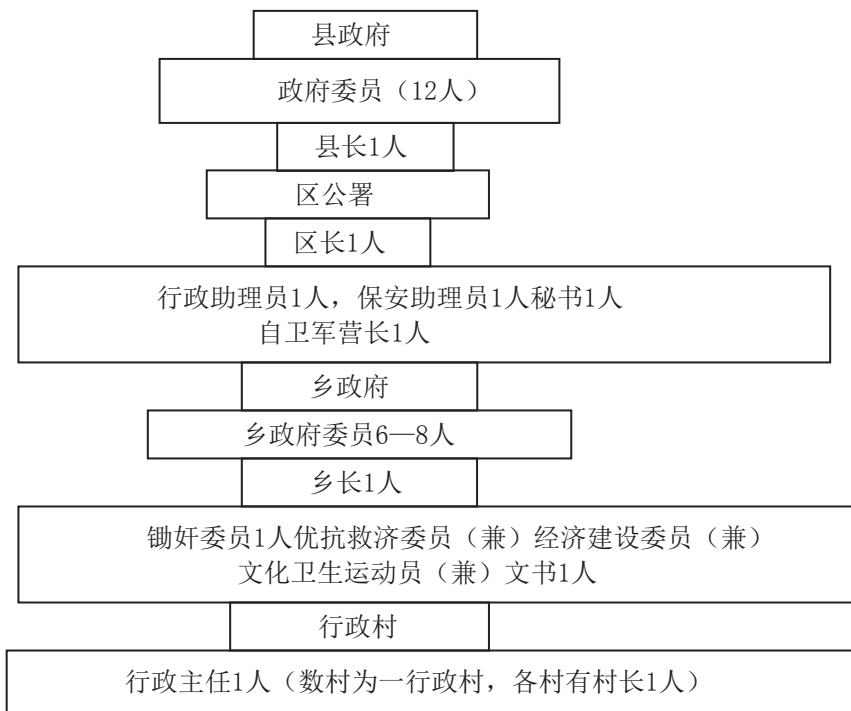
万兆春（1905—1986）周家崓镇人，1926年5月毕业于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后在中山军事学校学习。在国民党军队任职多年，1949年任邓宝珊部第一团中校参谋，1949年5月随部队起义，任伊盟军分区参谋。1955年回子洲参加教育工作。后任陕西省参事室参事，子洲县第一届政协委员。

说明：此文资料来自《子洲县志》《子洲人物志》《中国共产党子洲县组织史资料》（第一卷），子洲县史志办公室存原党史研究室有关资料，编辑采访。由于资料欠缺，部分党员（团员）未能列出出生年月、籍贯和入党时间，个别可能有误。

中共子洲（绥西）县委机构沿革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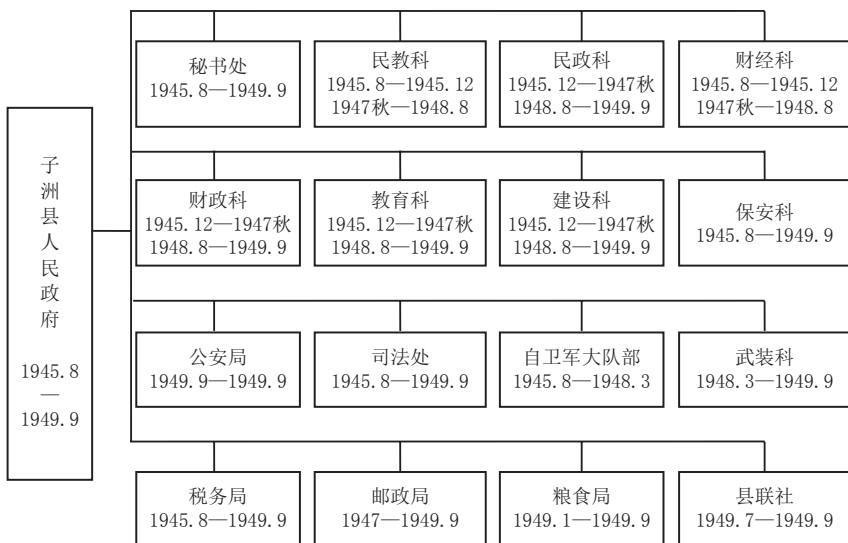


1944年子洲县人民政府机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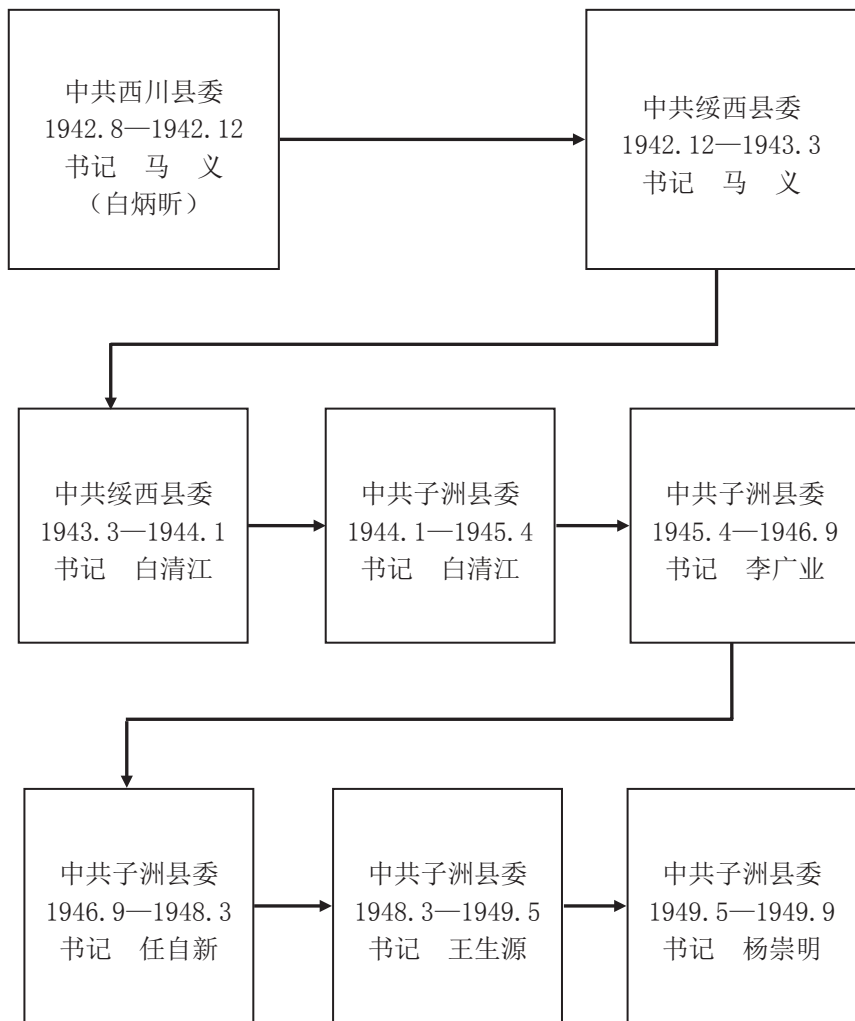


秘书处	一科	二科	三科	司法处	大队部
政务秘书1人	（民政）	（财粮）	（保安）	处长（兼）	大队长（兼）
事务秘书1人	科长1人	科长1人	科长1人	裁判员1人	政委（兼）
文书1人	副科长1人	副科长1人	科员1人	书记员2人	副大队长1人
收发1人	科员1人	科员1人			干事1人
通信员1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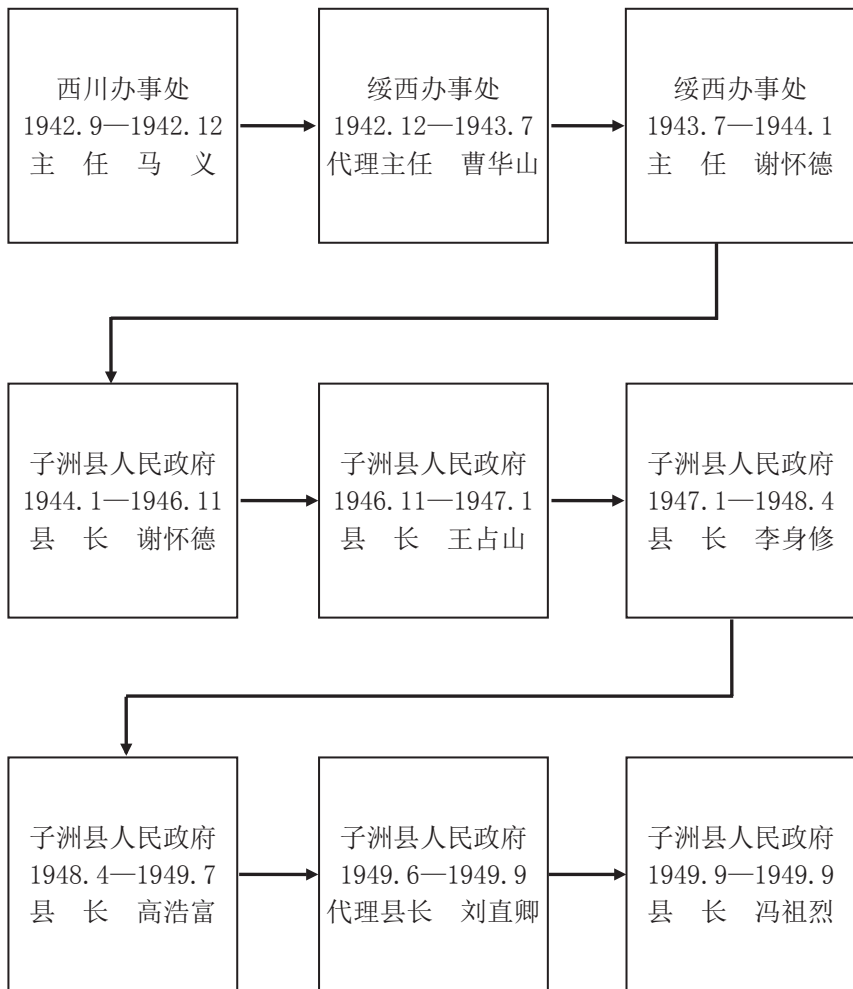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子洲县人民政府 工作机构沿革示意图



中共子洲(西川、绥西)县委书记更迭示意图 (1942.8 ~ 1949.9)



子洲(西川、绥西)县长(主任)更迭示意图 (1942.9 ~ 1949.9)



1945年~1948年子洲县党员情况统计表

年 度		1945	1946	1947	1948
支部个数		69	74	75	55
党员人数		1392	1616	1864	1652
性别	男	1366	1587	1834	1606
	女	26	29	30	46
家 庭 出 身	工人	120	72	75	74
	雇农	91	119	63	40
	贫农	1017	1244	1387	1183
	中农	145	164	258	343
	富农	9	4	60	5
	地主	1	2	16	1
	商人	9	11	5	6
文 化 程 度	文盲	786	836	1079	1054
	稍识字	481	638	674	482
	初小	68	72	44	79
	高小	35	39	39	18
	初中	18	27	24	15
	高中	3	3	3	3
	大专	1	1	1	1
年 龄	25岁以下	237	299	404	356
	26—35岁	681	772	879	976
	36—45岁	390	451	466	232
	46岁以上	84	94	115	88

主要参考资料

《子洲县志》 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子洲县组织史资料》（1926 年冬—1987 年 10 月） 中共子洲县委组织部、中共子洲县委党史研究室、子洲县档案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 月出版

《中共榆林历史》（1919—1949）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榆林地区历史大事记》（1919.5—2000.7） 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出版

《陕甘宁边区大事记》 张俊南、张宪臣、牛玉明编 三秦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出版

《子洲文史资料》 子洲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陕甘宁边区文件汇编》 2004 年 12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绥德历史大事记》 中共绥德县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 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子洲县历史大事记》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编，2008 年内部出版

《旧闻新钞》 子洲史志办公室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出版

《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研究》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2 月出版

《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连载九） 赵通儒 《延安文学》2012 年第三期

《可爱的子洲》 可爱的子洲编委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出版

《李子洲》 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 陕西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

《公木诗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7 月出版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 子洲
县史志办公室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出版

中共子洲县党史研究室有关南丰寨会议、米西苏维埃政
权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存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编后记

《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一卷）由子洲县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此书于2013年底开始收集资料，2014年底完成初稿，并通过县编纂委员会初审，修改完善后，于2015年6月呈送中共榆林市党史研究室复审，市科协党组书记、资深党史研究专家钟自鸣同志应邀审读，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完善。据此，编者修改完成送审稿，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主任王劲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2016年9月呈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终审，经省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汤彦宜同志审读，并进行修改校对。

2017年2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做出审读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一卷）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和中共陕西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史为大背景，准确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子洲的光辉历史，全面反映了子洲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进程。全书政治观点正确，历史脉络清晰，史实准确无误，地域特色突出，可读性强，是一部编写较为成功的县级党史第一卷基本著作。在此基础上，编者第三次修改定稿。最后送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

在编写过程中，中共子洲县委、县人民政府给予大力支持，社会各界人士鼎力相助，在此向所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子洲历史》（第一卷）问世的单位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资料比较少，编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和纰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2017年6月